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癥狀結構



研 究 生：林佳惠

指 導 教 授：黃錦樹先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癥狀結構

研究生：林佳惠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陳明柔

黃錦彬

侯作玲

黃錦彬

指導教授：

系主任(所長)：賴昭蓉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癥狀結構

指導教授：黃錦樹 先生

研究生：林佳惠

## 摘要

本論文共為六章，於首章書寫論題的命名動機與章節說明，第六章為結論。餘下各章則在論述之後，各附一節小結整理各章重點與研究成果。

台灣的殖民地經驗是一道永恆的傷口，最顯明的特徵可以從知識份子不斷正名「台灣」可見，台灣本來就存在，但是因為曾經的殖民地傷痛，導致台灣人民深怕再一次失去，成為某一種政權的附屬，因此台灣正名的運動會如此沸沸揚揚及至今日未曾停歇。

在日據時期，台灣人民是清國奴、二等國民，在國統時期的台灣人無論省籍，也無能談論父兄一輩的歷史現場，進入了無根的、噤聲的、壓抑的年代。而台灣的歷史定位也沒有因為執政黨輪替有更明顯的任何趨勢，在文學的領域，亦然。因此，論爭依然不斷繼續，仔細檢視論爭中的陳述，恍如台灣三〇年代鄉土論爭的不斷重複，才驚覺苦難的台灣土地、台灣人民，始終在歷史中輪迴，那共時的創傷結構。因此，本論文以鄉土文學論戰的重複做為台灣文學史的一種癥狀，並將這種癥狀試圖整理出一種結構的可能。

關鍵詞：鄉土文學論戰、台灣話文、新舊文學論爭、殖民地經驗、民族運動

#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癥狀結構

## 目錄

第一章 未曾結痂的傷口兀自論爭	
第一節 被抑制的殖民地經驗·····	1
第二節 書寫分歧的台灣文學史·····	4
第三節 論題及章節說明·····	7
第二章 論爭前兆：分歧的朝聖之道	
第一節 何以爲論爭前兆·····	12
第二節 台籍青年荆棘的朝聖之道·····	14
第三節 朝聖經驗與文學書寫·····	25
第四節 新、舊文學的分歧·····	34
第五節 小結：正視未能避免文學史的分岔·····	44
第三章 拓殖土地而佔領創傷：二〇年代殖民政權下民族運動中（非） 集體想像「民族」	
第一節 殖民地反抗力量的培養·····	47
第二節 侵亞入歐的殖民帝國·····	48
第三節 殖民地有力者與無力者的角力·····	57
第四節 殖民地的民族運動與分裂·····	66
第五節 小結：無法集體想像的「民族」·····	76

## 第四章 判讀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結構中的焦慮及其象徵意義

引言.....	78
第一節 點燃鄉土文學論戰的焦慮.....	79
第二節 鄉土文學論戰的幾個命題核心.....	87
第三節 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台灣話文論爭與新字問題.....	102
第四節 小結：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自我內耗.....	113

## 第五章 論爭的中結：政治力介入下的文學行動

引言.....	115
第一節 遁逃的政治運動.....	116
第二節 鄉土文學論戰間及之後的文學社團發展.....	121
第三節 決戰體制下的皇民化文學.....	140
第四節 小結：文學與政治力的消長.....	144

## 第六章 結論.....147

## 參考書目 .....154

## 附錄一 .....168

## 附錄二 ..... 175

## 第一章 未曾結痂的傷口兀自論爭

### 第一節 被抑制的殖民地經驗

台灣的殖民地經驗是一道永恆的傷口，最顯明的特徵可以從知識份子不斷正名「台灣」可見。台灣本來就存在，但是因為曾經的殖民地傷痛，導致台灣人民深怕再一次失去主權，而成爲任一種政權的附屬，因此台灣正名的運動如此沸沸揚揚及至今日未曾停歇。

當創傷成爲記憶，論爭就會成了召喚被抑制的記憶癥狀，強制性的重複，就爲了鞏固被威脅危機的認知。台灣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光緒廿一年、明治廿八年）因爲一紙馬關條約被清廷割讓給日本，從此淪爲殖民地處境。直到一九四五年（民國卅四年，昭和廿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昭和天皇下了「停戰詔書」，同意英美中蘇的聯合公告無條件投降爲止，台灣歷經了五十年又四個月的殖民地歲月之後，這一刻始終止了殖民地「污籍」。

殖民初期，台灣人民顯然是不同意清廷與日本的合約，遂於一八九五年五月廿五日成立了維持不久的台灣民主國。<sup>1</sup>接著大大小小的武力抗爭不斷，直到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才又進入所謂非武力抗爭時期，可知殖民者的高壓統治，就是爲了避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儘管武力鎮壓大量的損耗了日本國庫，日本依然不可能放棄成爲殖民主義的「現代」帝國行列。也由於殖民者的高壓統治，使得殖民地人民對於自身處於殖民地的事實成了一種壓抑性的創傷，既無法抗拒這樣的事實，亦無能有任何疏解壓力的管道。絕大多數的人民連基本的生活都有困難，<sup>2</sup>遑論抵拒殖民者！儘管台灣的內部上層階級有出現領導台灣人民爭取權益的現象，但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依然是下層階層爲多，無法在維持生計（儘管是極微薄弱的條件）與全面抵抗中擇一，而這在日據時期的諸多台灣新文學創作亦可見。誠如尾崎秀樹在討論〈決戰下的台灣文學〉裡提到的：

---

<sup>1</sup> 關於台灣民主國成立經過可參吳密察：〈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收於《台大歷史學報》（第八期，1981）頁 83~108。

<sup>2</sup> 如上文所述，日本國庫因爲需要大量支付武力鎮壓台灣，因此「勢得仰重當地稅收，尤其是田賦的收入，以支應其行政開銷。」（31）詳參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2003）

台灣文學的短暫歷史，由於日本 50 年殖民統治的介入，走過了既不同於中國文學歷史，又不同於日本文學歷史的不正常的發展道路。這表明他們的所謂「現代」是在統治民族日本強制推行語言教育（奴化政策）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結果。<sup>3</sup>

這毋寧是相當誠懇地面對歷史的一段表白，尾崎秀樹誠懇地面對日本身為一個殖民者在戰敗之後，所遺留下來的問題絕對不是撤退的方式而已，日本所建構給台灣的同化想像、皇民想像、現代想像，都超乎了日本對台灣預估的影響，對於台灣而言，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有許多台灣人是生長在日本帝國建構的民族認同中，面對日本的戰敗，台灣沒有祖國可以撤退，而是再一次沒有選擇權地面對另一個國家主權的統治，祖國意識早已被迫模糊在歷史中，殖民地歷史是一次難堪的經驗，也注定成為日後創傷的神經叢。

戰後的國民政府特任陳儀為行政長官來台接收，又因為中國內戰等諸多因素，使得台灣並未能與祖國「和解」，中國依然自顧不暇，亦不能提供台灣人民一解脫離殖民地統治的暢快，甚至在國民政府接收後隨即在一九四七年爆發二二八事件，而正疲於中國內戰的國民政府於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頒佈了「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翌年十二月十日全國宣佈戒嚴，台灣人民（無論省籍）也與國民政府有了心結，緊接著國民黨失去在大陸的政權，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率大規模軍民撤退來台，國民政府在中國的失利，加諸台灣的是進入所謂白色恐怖時期，也讓台灣持續處於一種與執政者分離的不信任。直至一九八七年七月才結束長達三十餘年的台灣戒嚴時期，隔年蔣經國過世，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成為第一位台灣出身的總統。

在日據時期，台灣人民是清國奴、二等國民，在國統時期的台灣人無論省籍，也無能談論父兄一輩的歷史現場，進入了無根的、噤聲的、壓抑的年代。解嚴前後的後蔣時期，台灣的經濟奇蹟顯然帶動了整體的社會氣氛，儼然具有迎向新時代的契機，尤其是一九七九年的高雄美麗島事件，使得國民黨政府不

---

<sup>3</sup> 引自尾崎秀樹，陸平舟、間ふさ子共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2004）頁 156。

得不嚴陣以待民間所醞釀的反對勢力。政治情勢得以醞釀出反抗的動力，有很大的部分是因為台灣人民經濟狀況的允許，開始會去思考除了維持生活以外的議題，如「台灣意識」因為「鄉土文學論爭」、「黨外」勢力的結合而成為一個核心的論述，在文學議題的部分則如蕭阿勤所說的致力於台灣文學的「民族化」(nationalize)。<sup>4</sup>

在台獨運動快速推進的 80 年代下半葉，我們也看到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蓬勃發展。……最大的特色是企圖將台灣文化「去中國化」之後再「民族化」。(31)<sup>5</sup>

與中國的歷史經驗差異成了台灣文學民族化的過程中必須凸顯的程序，一直以來被壓抑的殖民地經驗此刻顯然成了最佳的台灣民族苦難象徵，孤兒意象的被重複使用，台灣母親形象的塑造，都是一種民族論述的基本建構。然而，殖民經驗在論爭中被宣揚的同時傷痛也被消費，一如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需要不斷地被重複記憶，再在記憶的過程中添加時代的意義，以提供民族建立更偉大的型構。

到了公元兩千年，民進黨籍的陳水扁以 39.3% 的得票率當選第十任總統，成為第一位民進黨執政的總統，完成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並且以 50.12% 的得票率續任第十一任總統。然而，論爭從來沒有結束過，就像陳水扁先生以總統的身份向台灣人民宣告一般，台灣在其任內不可能更改「中華民國」國號、不可能獨立。顯然，台灣的政治紛爭並沒有隨著政黨輪替有更美好的轉變，口口聲聲喊著族群不分裂的口號，相對地也提醒了人們，族群正在分裂。

台灣的歷史定位沒有因為執政黨的輪替有更明顯的任何趨勢，在文學的領域，亦然。論爭依然在不斷繼續，仔細檢視各派論述，恍如台灣三 0 年代鄉土

---

<sup>4</sup> 參見蕭阿勤：〈1980 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收於《台灣社會研究》第三期（1999）頁 1~51。

<sup>5</sup> 引自蕭阿勤：〈1980 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收於《台灣社會研究》第三期（1999）

論爭的不斷重複，才驚覺苦難的台灣土地、台灣人民，始終在歷史中輪迴，那共時的創傷結構。

## 第二節 書寫分歧的台灣文學史

台灣新文學運動在 30 年代因為黃石輝一篇〈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引起眾多「鄉土文學」的回應與反論，也展開台灣新文學史上第一次嚴重的路線之爭。基於對「文學」的認知不同，衍出「文學」該有的基本任務與定位的爭辯，不僅止於美學價值的論定。因此，這一次的論爭絕對足以成為台灣文學史上一次相當重要的標記。特別是台灣在地的意識被提出來，包括書寫的內容與語言，前者指寫作內容是否該凸顯關懷鄉土，後者則是台灣話文的使用等大方向的問題，本章暫不就「鄉土文學論戰」進行論戰細節的內容討論，而是盡可能客觀地找出產生這一次論爭的前提，不只是史料的回顧，而是提出一個癥兆的檢視過程；力圖尋求一個台灣文學史日後在書寫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血肉模糊的「台灣文學史」本源之爭、路線之爭、意識之爭；回溯台灣文學史的這一次重大論爭，或者可以增加對論爭產生的理解，而體認到文學該有自己的空間，哪怕創作的過程已經進入某種功用的建構，也該就文學作品本身進行討論，避免以詮釋的觀點壟斷文學史的線性書寫。

一部「台灣文學史」該怎麼寫，從哪裡開始寫，從黃得時的〈台灣文學史序說〉中指出「有特色」的台灣文學史開始，企圖撰寫「台灣文學史」的接續者莫不以彰顯「台灣」獨特性為主要訴說的文學史觀。台灣文學的論爭，在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之前，從新舊文學論爭開始，即面對相當複雜的語言運用及「文學」認定殊異的爭辯。當代的「台灣文學史」的書寫，更可能因不能動搖的意識型態，勿寧是一種偽裝的溝通（disguised communication），彼此間的對話存在各自政治意識型態的對立，產生更龐大、集團式的論爭現象。

典型的具有「台灣意識」文學派的說法，強調現實主義傳統的台灣文學，反同化、反反共的主體性。於是把台灣文學的獨特性從日據時期的文化運動結合文學運動、政治運動，作為非武力抗爭的象徵開始，終戰後的國民黨執政時

期，則將台灣人民的遭遇與文學活動與二二八事件直接掛勾，強調台灣人民總是處於一種受壓迫的狀態下，政治氣氛此時的確成爲最佳的作證，接著便是國民黨廢止日文欄等強勢政策，<sup>6</sup>因此有了跨越語言的這一世代。但是事實或許沒有這麼簡單，不是對上述狀況有疑問，而是想考慮到更大的分歧早在台灣新文學展開之初，就產生了這樣的矛盾甚至是對立，不單是政權的轉移與台灣人民的衝突。台灣的文學運動與政治運動似乎永遠都脫不了干係，這和台灣的歷史顯然是有絕對的關係，從未曾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且屢遭統治權的爭奪，也顯現「台灣」諸多戰略考量。而在台灣求生存的人民，尤其是知識份子是如何看待台灣的歷史命運？特別是在日據時期，「台灣」成了被認定的殖民地之後，台灣人民那股想要彰顯「台灣」主體性的迫切需求，才被論述化。而解嚴以來「台灣文學史」的撰寫，似乎更注重「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台灣文學史」，似乎是要劃清台灣與中國任何一點曖昧的牽連，可見做爲台灣知識份子在書寫台灣文學史所欲強調台灣主體，同時也體現了書寫的焦慮。

因而，作爲「台灣意識」及「台灣主體」「獨立」的相對立場而言，不見得就是否認「台灣文學」的「獨特性」，也不見得是爲國民黨政權辯護，甚至是一起質疑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合理性。然而，「台灣文學」和中國之間的「統」、「獨」儼然成了因意識型態的分歧所造成的論述。<sup>7</sup>

簡化地說，「統」派與「獨」派的「台灣文學」史觀皆建立在「台灣文學」是一種民族運動，這裡所謂的「統」、「獨」乃是指論者立場偏向是否將「台灣文學」放入「中國文學史」一脈，論者觀點多不否認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但前者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台灣新文學運動也是受五四影響而來。「獨」則認爲「台灣文學」是台灣的民族文學，不僅是抵拒日本，更是抵拒中國的。如彭瑞金先生則明白指出日據時期以來的台灣文學運動是與文化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的三合一運動，「台灣新文學運動的

---

<sup>6</sup> 多麼像日本殖民時期廢止漢文欄的作法。

<sup>7</sup> 正如蕭阿勤所指出的，台灣文學在本土化典範的過程中，所引起的爭論衝突遠比族群和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的關係密切。參見蕭阿勤：〈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收入《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行政院文建會主辦，2003）頁 195～230。

職務是在扛起民族運動的十字架」、戰後的台灣文學重新建構出台灣的民族意識，「早已拋棄血緣、史緣、地緣那套不合事實的民族論」（按）此處所指該拋棄的民族論是指「中國」。<sup>8</sup>這樣的「獨」派的論述看在「統」派眼中這可是破壞民族情感的「分離主義」！當然這是相當簡化的陳述，本章意不在耙梳意識型態下的「台灣文學史」，或就「統」或「獨」表達立場，而是想提出一個可能，即日據時期的台灣人民透過將「台灣主體」的呈現，凸顯與日本差異的同時，是爲了要擺脫台灣人民被殖民者的壓迫，而「抵拒」的意識萌芽來自於知識的啓蒙，這一條知識啓蒙之路，不但是荆棘的，而且是分歧的，或許「台灣文學史」的諸多論爭不是撰寫者史觀或意識型態所能掌握的。<sup>9</sup>

一如一向被視爲台灣文學本土論述指標的重要人物—葉石濤先生，在其日後對研究台灣文學具有必備教科書之重要性的著作《台灣文學史綱》中，也曾經指出：「台灣的白話文運動便是在大陸五四運動的刺激下開展的。」<sup>10</sup>又或者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中的序提到，「台灣從來沒有創造出獨得的語言和文字」，所以仍「屬漢民族文化的一支流。」<sup>11</sup>或許因爲其時政治氣氛的影響，也可能也只是一個客觀事實的陳述，不需帶任政治想像的因素，但似乎也可以視爲其時台灣文學在邁向本土化過程中的必然折衷說法，客觀地閱讀仍可以發現葉石濤先生依然在行文之中一再強調「台灣意識」的存在是台灣文學必備的條件。如彭瑞金說的，這是統派抓住葉石濤的「小辮子」，<sup>12</sup>但是也正如蕭阿勤所指出葉石濤在建構「文化記憶」上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台灣文學的民族主義儼然是一種集體的文化意義變遷過程。<sup>13</sup>

因爲在鄉土文學論戰不久之前，<sup>14</sup>台灣新文學第一波重要的運動當屬 20 年

<sup>8</sup> 參見彭瑞金：〈台灣民族運動與台灣民族文學〉，收於《台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1995）頁 13~38。

<sup>9</sup> 或可參見李桂芳：〈意識的偵防與歷史的夢魘—從陳映真與陳芳明的論爭說起，並兼論晚近「台灣文學史」的問題〉，《中外文學》第 32 卷第 11 期（2004 年 4 月）頁 13~35。

<sup>10</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頁 21。

<sup>11</sup> 葉石濤：《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台北：遠景，【民】68）頁 9。

<sup>12</sup> 見彭瑞金：〈葉石濤的台灣文學評論和文學史〉中所極力反駁的。收入《中外文學》，第 27 卷，第 6 期。（1998）

<sup>13</sup> 見蕭阿勤：〈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 0 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收入《台灣史研究》，第六卷，第二期（【民】八十八）

<sup>14</sup> 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從二 0 年代才有具體發展的樣貌，也就是如果扣除之前的漢詩傳統，新

代的新文學運動。新文學運動的開展，當以一九二〇年年創刊的《台灣青年》為一重要標的，<sup>15</sup>而新文學的推動和其背後整個台灣的殖民地歷史背景有絕對的關係。由於有著殖民地的歷史條件，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夾雜著台灣人民對政治與文化追求自我的想望，於是新興的台籍知識份子開始大張旗鼓宣揚自己所受所知的新世界，新文學運動也如火如荼進行。但是回顧台灣，台灣文壇久被傳統漢詩佔據，於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動，第一波遇到的阻力便是同時也必須面對台灣舊有的傳統漢詩壇的勢力，新與舊之間也展開了互相對文學認知的挑戰。<sup>16</sup>回首觀看，殖民地台灣追求的僅文學之路也竟是如此艱難，爾後可預見的是台灣知識份子內部朝聖之道的分歧是客觀的事實也是必然之途。

台籍青年在追求新知的同時，其世界觀、文學觀等各種價值觀也於此養成，這樣的經歷可以看成台籍青年的朝聖之道，這批台籍青年經由殖民國日本或血緣祖國中國求取啓蒙之道，當他們尋求向台灣之外的世界取經之後，反觀台灣的內部世界之時，產生路線之爭自然是可以預見的，只是這樣的路線之爭也預告了台灣此後因為意識型態而上演更為凶猛的文學論爭。因此，本論文除了回顧三〇年代時，台灣第一次發生鄉土文學論戰之外，也將藉由整理此論戰的源由與過程加以反思，希望汲取論戰的經驗，進一步釐清日後台灣文學史上何以論戰不斷作為共時結構的歷時性重複。

### 第三節 論題與章節說明

本論文論題「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癥狀結構」，其命題動機正如前文所言，因為台灣苦痛的殖民地歷史經驗，知識份子意識到被殖民者與殖民者的位階差異，而這個位階差異正源自於身份認同。一個人的身份認同組成來自於多方面的自我認識，在多數的情況下，人們不需要尋求認同，除非自我認知與普遍價值產生落差。為了說服自己有存在的價值性，於是會尋求自我認同的機制，藉

---

文學發展的時間也不過數年。

<sup>15</sup> 而台灣第一篇白話小說〈她往何處去〉（此篇以日文書寫，原題〈彼女は何處へ〉）則刊載在《台灣》（第三年第四號～第七號，1922年7月～10月）

<sup>16</sup> 1924年4月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了〈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點燃了台灣文壇新、舊文學的論爭。見《台灣民報》（第二卷第七號，1924年4月21日）

此滿足自我在普遍價值上的失落。

因此，當台灣人民被迫成爲一個殖民地時，必然感受到與殖民統治者的存在價值差異，而這個差異讓殖民地台灣必須依靠尋求自我認同做爲出口。鄉土文學的論戰也在此情形下出現，可以想見殖民地台灣感受到殖民者的歧視待遇，生存於殖民地台灣的人民，必然要尋找到身爲台灣人民的存在價值，以抵抗殖民者的高壓統治。而在論戰的過程中，彼此的歧異性不斷出現，成爲大群落下的小群落。但整體而言，在歷史的定位下，在三〇年代參與鄉土文學論爭者都是台灣人民，他們同樣身在殖民地的處境中，也都是被殖民的一群。

在鄉土被提出之時，也是台灣人尋求對台灣認同的時候，更是企圖團結起台灣在地的人民對抗外來侵入的勢力。殖民者可以輕易地理解是外來政權，由此三〇年代台灣的鄉土概念被提出也可理解。但若是脫離殖民政權逾五十年、六十年，台灣依然離不開尋求自我認同的機制，依然需要依靠尋求鄉土作爲認同的慰藉，其中又因爲尋求的過程中，發生在台灣這個大群落下，各個小群落對鄉土解釋的分歧，而形成一場場論戰，那麼有關「鄉土」的命題將可視爲是台灣史上的一種癥狀（symptom）。

在三〇年代的殖民地台灣，因爲深切感受到殖民者的高壓統治，對於任何民族運動的醞釀都避不了嚴密的監控，而殖民地人民則不放棄以各種形式討論台灣前途的議題。如鄉土文學論戰則可以視之爲把對台灣的自我認同議題放入文學的脈絡中討論。而這樣的議題不止在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發生，也出現在一九七〇年代，這一場論爭的表面看起來像是在討論文學寫作的方向，如文學的表現是否該以台灣現實的社會作爲寫作的對象，成爲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辯論，但實際上牽涉的層面卻遍及對台灣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解讀。一九七七年余光中於《聯合報》發表一篇〈狼來了〉，直指台灣鄉土文學即是「工農兵」文學，這使得文學立場的討論直接與政治立場掛勾，加上台灣與中國政治氣氛的緊張，這一場文學的論爭就顯得更爲敏感。

如果把論戰分別討論，自然有其歷史背景的成因，但是放置在台灣史的脈絡中，對於「鄉土」的議題重複出現論戰，無疑不是台灣內部的一種內耗過程，

這也使得諸多論者把鄉土文學論戰視為台灣文學史上重要一重要命題，而本論文便是在欲探討鄉土文學論戰之所以一再出現的原因下，做一初步的結構整理的可能。但也由於台灣出現鄉土文學論戰的歷史結構過於龐雜，因此，本論文企圖將焦點放在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的爬梳，把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的過程做一結構式的整理。

整理的過程中，不止是分析參與論戰者的言論，而是將可能發生論戰的歷史因素也一併放入論戰的結構中。如將二〇年代的新文學運動時引發的新、舊文學論戰視之為鄉土文學論戰的前兆；而在新文學運動時期與鄉土文學論戰的中間，也將目光鎖定殖民地台灣的民族運動，藉以幫助理解台灣人民何以需要討論「鄉土」此議題。

於此，本論文預計可以將台灣第一次鄉土文學做一歷史結構性的整理，而這對於研究不斷出現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或可提供一種可能，即在重複出現的鄉土文學論戰中，尋找到歷史的成因。儘管每一次的論戰背景都不同，但是也許可以從中發現，論戰必然所造成的傷痕，是因為鄉土的命題始終沒有獲得更多數集合的認同，這也是為何會不斷出現認同的需求，而所有的需求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歷史遠因，那就是台灣更深刻的歷史傷痕：殖民地經驗。

本論文也將於此得到一個結論，即是殖民地經驗是台灣必須正視的一次歷史事件，而這次歷史經驗帶給台灣不止是殖民時期的痛苦，還有更多屬於民族性的問題隱藏其中。在這樣的歷史經驗中，傷痛已經成形，於是尋求對鄉土的認同，成了殖民歷史經驗的表徵。特別是在尋求對鄉土的認同中所產生的歧異性，更可被視為解讀歷史經驗的切入點。在每一次的論戰中解讀歷史事件所造成的共時性傷痛，便可藉由檢視傷口而更包容歷史，也可釐清何以論戰再次成為解釋歷史的癥狀，而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成為癥狀則顯示台灣因歷史經驗所產生的現象與情狀。

現將本論文章節試說明如下。

本論文共計六章，附錄有二。第一章即為本章，題為〈未曾結痂的傷口兀自論爭〉，意為解釋鄉土文學論戰的重複，像似永遠無解的命題。而這個命題源

自台灣殖民地的歷史經驗，這次歷史經驗也造成台灣無法痊癒的傷痛。而本論文將欲從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討論起，作為初步整理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結構的可能，且以「癥狀」(symptom)作為討論鄉土文學論戰在台灣文學史上所呈現的現象與情狀，並是本論文欲支持鄉土文學論戰於台灣文學史上一結構性的重要特徵。

第二章題為〈論爭前兆：分歧的朝聖之道〉，意為界定新文學運動作為鄉土文學論戰前兆的可能。殖民地台灣追求的文學想像竟是如此艱難，爾後分歧的朝聖之道是客觀的事實，也預告了台灣此後因為意識型態而可能上演更為凶猛的文學論爭。而此處意識型態的形成可能源自於個人生命經驗的差異，造成程度不一的文化資產累積，不但把世界放進台灣的視野，也提供了世界觀看台灣的一種角度與方式。

第三章題為〈拓殖土地而佔領創傷：二〇年代殖民政權下民族運動中(非)集體想像「民族」〉，意在探究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文學一直為社會、文化、政治運動所用，如果擺脫文學的包裝，台灣的民族運動是否單一存在？爬梳台灣在二〇年代的新、舊文學論戰後，知識份子也將新世界思潮帶回台灣，其中台灣人民也自覺身為殖民地的悲哀，民族運動也在其中奮力成形。但面對殖民者掌握龐大的國家機器，殖民地自主的民族運動也在自我內耗中，難以持續民族共同體的建構。

第四章題為〈判讀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結構中的焦慮即其象徵意義〉，意為判讀在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鄉土」議題所揭示的象徵意義或許已遠勝鄉土在文學中的意義。黃石輝一篇〈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揭開了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序幕，其象徵何種意義，何以鄉土文學成為台灣文學難解之題，論戰本身到底論戰了什麼？都是本章欲一一細究的部分。是否在社會、文化、政治運動與文學脫勾後，都未能如預期效果？再則殖民統治者不允許如此明目張膽的運動，而回歸到文學的運動？正如本論文論題，此章將直接解析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論述，並以此作為理解台灣史上對於「鄉土」議題中所顯示的廣泛焦慮性。

第五章題為〈論爭的中結：政治力介入下的文學行動〉，意在指出本地知識份子對於「鄉土」各自定義下，龐大的政治力是否更凌駕一切歧異性的可能。在鄉土文學論戰暫告一段落的同時，皇民文學顯學其中，這是一股政治力的壓抑，抑或只是時序上的巧合？至此是否宣告了殖民地台灣的主體認同，尚處於無法自理的狀態？皇民化文學中明示對殖民者的效忠，是戰爭體制下的人性扭曲，同時也掩蓋了殖民地用以區隔對殖民者的認同的鄉土論述。而台灣是否只能持續期待更強勢的政治力介入，以便處理更正確的鄉土認同？或者合理化政治正確中的鄉土論述。

第六章則為〈結論〉，意即歸納本論文整理鄉土文學論戰癥狀結構的初步成果。從日據時代的殖民地台灣討論起，那些關於文學的記憶，累積的是殖民地永恆的傷痕，但是，如果不去直視這個傷痕，傷痕永遠都無法痊癒，像似逃避似的欺騙自己：沒有受傷。於是一再重複關於民族的想像，也是源自於自身的想像，所謂的民族，或許正如「東方」一般，被建構出來，如果有一天，所謂的「台灣民族」真能直視自身的傷痕，是不是願意更懇切一點，面對被歷史選擇的結（後）果？而將心平氣和對待自己，對待所謂的「台灣民族」？如果真的未能實現所謂的民族想像，那麼紛擾將永恆，論爭也將持續，直到政治力的終結，恐怕也將只是表面的結果，關於「台灣民族」仍獨自想像。

## 第二章 論爭前兆：分歧的朝聖之道

### 第一節 何以爲論爭前兆

本章將從日據時期台籍青年的朝聖之道談起，所謂朝聖之道指的是台籍青年對外取經的過程。殖民地青年在殖民統治下，獲得新知的管道相當有限，殖民者爲了有效統治殖民地，對於殖民地社會結構最可能醞釀出對抗實力的一群更是小心控管著，於是這一條向外追求各種見識的管道便以出外遊歷爲是，對身處於殖民的青年而言這是一條朝聖之道，也是一條荊棘之道。

這一條朝聖之道的存在象徵著殖民地青年追求的渴望，想要踏上這一條道路，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朝聖之路也是分歧的。出發的目的是爲了求學、遊歷、運動等，雖然目的地不是統一的，但是卻同樣接觸到世界思潮的湧動，有的吸引了較爲積極的知識份子，反思了台灣殖民地處境。於是在二〇年代台灣遊歷在外的知識份子，開始有了對台灣島內宣傳世界思潮的想法，加上具體的留學生組織行爲，機關報的發行，慢慢地形成一股啓蒙氣氛。

可以想見的因爲朝聖之道的分歧，也會造成不同價值觀等的養成，因此在各種論述的表現上也可發現認知的差異，這是必須先行交代的客觀因素，這些因素也預知了知識份子所接收、認定的知識來源。知識份子將他們的熱情展現在對台灣島內人民的啓蒙運動，繼而夾雜其中台灣新文學運動也於此加緊腳步推出。新文學運動的開展，一般認爲其時久佔台灣文壇的舊文人則首當其衝成爲被拉下台的對象，於是伴隨新文學運動而來的是一新舊文學論戰。

表面上看起來是新、舊的文學創作形式、內容、理論等文學觀念的論爭，事實或者更爲複雜，因爲許多站在新文學運動陣營中搖旗吶喊的先鋒也涉足舊詩創作，須知舊文人佔據文壇的主力作品也是舊詩，而舊詩也是因應新詩而言成了舊詩；而舊詩人中當真無人領教過世界新知？恐怕也不盡然，但是何以兩者竟以新、舊聲嘶力竭？在今日看來，都不只是文學的議題，而新、舊文學論爭的絕對存在，因此本章也將針對台籍青年對外追尋的朝聖之道談起，論及朝聖之道的荊棘與文學書寫的展現，在從中梳理出新、舊文學兩陣營中對文學認知的差異，繼而理解隨之而來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

就時間意識而言，對外朝聖是殖民地台灣找尋出口的第一步，對內展開啓蒙運動是朝聖的重要成果之一，身體力行的新文學創作以揭發殖民地台灣的創傷，是新文學運動的成績，也是整個啓蒙思潮下的一環，將台灣與外在世界接軌的重要時間點。本章欲凸顯新舊文學論爭<sup>17</sup>可以大膽看成是 30 年代鄉土文學論爭的前兆，<sup>18</sup>而不只是歷史背景，因此，30 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或正如施淑先生所言：

一般都認為是台灣文學本土論和台灣主體性意識萌芽的開始，論者大概都認為它斷續潛伏在日據時期及二次大戰後部分台灣作家的意識之中，而後集中和全面地表現於一九七七年開始的持續數年的鄉土文學論戰裡。<sup>19</sup>

整個台灣文學在本土典律生成之前，將鄉土文學的論戰看成了前鋒部隊，揭開了台灣的認同意識論爭。某一個程度上而言，論爭於此成為台灣殖民地創傷經驗的重述，也因為被殖民所以朝聖之路顯得更為荊棘，因為荊棘的朝聖之道，所以在封閉的空間中失去內部大規模交流的可能，於是養成各自獨立的價值觀系統。過去台灣曾為殖民地的歷史是一道創傷經驗，這個經驗埋伏在神經結構中，在檢視創傷經驗的同時，撥開歷史是二度經驗的疼痛，而這個歷史經驗，使得所有的論爭都成了另一道傷口。

每一場論爭的背後，都直指論述者的價值觀、審美觀與面對事物、階層不一的關注，當論爭存在於文學的議題，那必然會是後人書寫文學史的重要材料；文學史的撰寫者，同樣也展現了個人的詮釋觀，如此各自表述的立場則顯示文

---

<sup>17</sup> 對於二 0 年代的新舊文學論爭，黃美娥先生則提出以不同的角度，觀看舊文人在這場論爭中的位置，可參照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2004）。而在本論文的第五章第三節的部分，亦藉由對《三六九小報》的部分討論，觀察傳統文人何以亦支持鄉土文學。

<sup>18</sup> 這樣的說法無非是想要強化，對文學史的理解更應該從史料的表層與他層結構去觀察各種可能性。

<sup>19</sup> 引自施淑：〈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台灣鄉土觀念問題〉，刊載《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二期，頁 77~82。

學史產生的過程有無可避免的歧異性。相同地，台灣文學史上多次就同一議題產生大規模的集體辯論，成為共時性的結構，某種程度上也恰可成立為文學史的癥狀證據。

從日本殖民以來的一百年之內，台灣經歷了政權的轉換，也讓文學的領域成為各家論述必爭之地，甚至還涉及國家暴力的介入，成了「近二十年台灣族群與民族主義的認同政治一部份」<sup>20</sup>。台灣文學之所以會出現不同意識型態的知識份子各自表述，甚至是集團式的對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必須回溯到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假設不曾有過殖民地經驗，台灣始終屬於清朝版圖，也許同樣與中國會經歷相同的革新與革命的衝突，革命之後群起的啓蒙思潮、列強環伺的威脅都將一同成為台灣的歷史經驗。發生在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或者不會是另一道傷痕，然而這終將只是假設。這樣推論與猜測無非是想解釋，台灣的殖民地經驗將導致台灣內部的自我分裂，不管台灣的政權如何落實美其名的民主政治，都改變不了「台灣」的歷史經驗，台灣一天未曾進入歷史進入「定位」，論爭也將永恆持續，意識型態也將各自「左」、「右」。

## 第二節 台籍青年荆棘的朝聖之道

日據台灣的人民因為殖民者的統治需求，沒有辦法享有平等的受教權，「教育」也只是為了配合殖民政權方便統治下的所設置的體制，「普及日語及涵養日本國民智慧」<sup>21</sup>成了教育主旨，「國語傳習所」便作為「台灣教育令」頒佈之前教育台灣人民的基層教育機構。而語言與文字作為溝通與思考的工具之外，尤其使用的頻率將是塑造出認同模式的重要關鍵，政策的導引（無論是暗示性的或者強制性的）學習官方語言都可以說是一種偽裝，引領人民進入統治階級的思考模式，接收統治階層的訊息釋放，進一步成為全面的單向度思考。如此，才可能讓人民天真的以為權力釋放的可能性，而生存在看起來是穩定的社會結

---

<sup>20</sup> 參見蕭阿勤：〈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歷史敘事、策略的本質主義、與國家暴力〉，收入《重建想像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行政院文建會主辦，2003）頁195～230。

<sup>21</sup> 見梧堂生：《台灣統治策》。轉引自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68年）頁11。

構。

也由於台灣做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日本並沒有執行殖民政策的經驗，因此在對台灣的統治政策上，因此在對台灣的統治政策上，經過了九月餘的軍令時期，於一八九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日本政府乃頒佈「六三法」。

軍政雖告終止，日本政府之根本統治原則仍未確立，當時關於台灣統治方針有兩派見解，一派主「急進」，一派主「漸進」。……終於採取特別法制主義，賦予台灣總督特殊立法權，……由日本政府以法律第六十三號頒佈「有關施行於台灣之法令之法律」<sup>22</sup>

其法第一條便指出：

台灣總督得在其管轄內，制定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sup>23</sup>

賦予總督特殊立法權，作為台灣總督統治的權宜之計。雖然第二條也表明「前條之命令，應經台灣總督府評議會之決議，經拓殖大臣奏請勅裁。」<sup>24</sup>但是緊急狀況則不在此限。因為「六三法」所賦予台灣總督權力極大，因此在日本國內也有違憲之虞的激論出現，而於一九〇六年另頒佈換湯不換藥的「三一法」，基本上依然是延續「六三法」的本質。<sup>25</sup>

而就教育政策而言一如其立法過程，同吳文星所言是「無方針及漸進主義殖民統治政策」。<sup>26</sup>

---

<sup>22</sup> 引自郭嘉雄：〈日據時期台灣法制之演變歷程及其性質〉，收入劉寧顏：《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71年）頁1150。

<sup>23</sup> 見「六三法」第一條，詳參郭嘉雄：〈日據時期台灣法制之演變歷程及其性質〉，收入劉寧顏：《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71年）頁1143~1163。

<sup>24</sup> 「六三法」第二條。詳參郭嘉雄：〈日據時期台灣法制之演變歷程及其性質〉收入劉寧顏：《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71年）頁1143~1163。

<sup>25</sup> 「六三法」本應於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年）自動失效，但日本政府一再設法延長，繼後的「三一法」亦然，直至一九二二年始進入「法三號」勅令立法時期。詳參郭嘉雄：〈日據時期台灣法制之演變歷程及其性質〉收入劉寧顏：《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71年）頁1143~1163。

<sup>26</sup> 「無方針主義」原為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於1903年11月6日學事諮詢會中提出。

雖然同化為此一時期教育的根本目的，惟在漸進主義及差別待遇政策下，並未積極地推展。例如公學校之設置及學童之入學並非強制義務。<sup>27</sup>

一八九八年「台灣公學校令」公布後，總督府將各地「國語傳習所」改為「公學校」，為的是進一步實施同化台灣人民的政策。對於日人學童則另設「小學校」，也顯現日本實行同化政策的同時，也以殖民者的姿態宣告，被殖民的台灣人始終不等同於日本人，這是殖民者在統治教育上所展現的強勢。殖民者需要開化的人民，包括學會簡單的日語，以便利於統治政策的執行，但卻不需要接受太大量的知識啓蒙等。<sup>28</sup>如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指出「印刷語言」的意識型態與政治的重要性，<sup>29</sup>殖民地台灣需要的不是「閱讀階級」，而是理解統治階級的語言繼而成為不需要發言的「從屬階級」。

台灣人民在接受殖民地初等教育的同時，成了殖民政權馴服的對象，教育體制只是殖民統治的便利工具，除了為了普及日語初等教育外，就只有「培養低級技術人員的實業教育」的必須，<sup>30</sup>一如學習官方語言的基礎技藝。

在這樣的前提下，對知識有需求、對身為殖民地有自覺的台灣青年，如何邁向朝聖之路？於是有能力可以離開台灣的人開始向外拓展，便有機會接觸到世界思潮的湧動，當這一群見識到「外在世界」的台灣人回過頭來看台灣，內心的衝擊自不可言喻。下文將針對這一批離開台灣在外地遊歷（以中、日為主）的青年作為討論對象（可能成為台灣社會領導階層的一批），如何利用書寫作為

---

見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68年）。頁7。

<sup>27</sup> 引自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68年）。頁13。

<sup>28</sup> 後藤新平：「關於教育方針，雖然現在仍在研究中，但公學校的設置是有其目的的，即是國語（日語）的普及。」參見李園會：《日據時期台灣之初等教育》（高雄：復文，【民】72）頁17。

<sup>29</sup> 這即是安德森所強調所謂官方語言的決定權只來自於統治階級，當統治者的意念被大量印刷便成為散佈的「概念」，時機一到，再變成了一個模式。參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台北：時報，1999）頁79～94。

<sup>30</sup> 參見李園會：《日據時期台灣之初等教育》（高雄：復文，【民】72）。頁17。

知識傳播的工具。其內涵多少對中國與日本的矛盾情感，也因為語言與文字的使用不同，在文學的展現又是一層論爭所在，卻也透露出「台灣文學史」在此已然分歧；而這個分歧的現象是台灣的歷史命運所造成的必然，因為「台灣」尚無法為自己定位之下，連「文學史」都在意識型態的書寫中各自詮釋。

日據時期的台灣武力抗日運動以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為一分界點，以武力抵抗日本的運動絕望的同時，整個世界<sup>31</sup>有著「民族自決」的思潮湧動著，或直接或間接也衝擊著台灣知識份子。

「世界新思潮」可說是影響日據時代台灣知識份子思想風格，也就是他們的世界觀和認識架構形成的最主要因素。……（25）

……而西方思潮的引進，也提供了日據時代台灣知識分子重新思考台灣問題、以及與殖民者相抗衡的一個參考點，對日據時代的台灣社會文化產生具體的影響。（26）<sup>32</sup>

直接感受到這一股世界氛圍的便是遊歷在外的台灣青年，這一批知識份子不滿足於對台灣（日本掌控下的）所能供給的一切。如前文所提，連最基本的教育機制都只是用以宣導殖民統治的工具；殖民體制下的人民在面對殖民者強勢地統治權之下，<sup>33</sup>抵抗是一味壓抑下的預期動作，出外遊歷可以說是尋求一種「出口」的可能。因此，儘管無法以武力與強大、有系統的殖民軍隊相抗衡，

<sup>31</sup> 諸如 1917 年俄國爆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列寧發表「政權回歸蘇維埃」的《四月提綱》，同年「十月革命」俄國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進入尾聲，同時美國總統威爾遜在 14 條和平條約中宣揚民族自決的原則；也因為「民族自決」的概念被宣揚，1919 年一樣是被日本殖民的朝鮮於是發動「三一運動」，爭取民族獨立；同年在中國掀起的是「五四運動」，是繼推翻清朝之後，進而強調中國需要的國家尊嚴，不能在強國私相授受的條約所犧牲，其後更是以啓蒙之姿要一舉推翻傳統禮教等價值觀念。

<sup>32</sup> 引自陳明柔先生：《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思想風格及其文學表現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1）

<sup>33</sup> 一如陳明柔先生所言：「日本國內實行近代化建設時，極為重視的西學之引進與學習，於其殖民政策中卻未見任何具體的策略配合，亦即日本政府於其愚民政策主導下，非但無意於西方精神文明及新思潮的引入台灣，甚且刻意抑制。」見陳明柔：《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思想風格及其文學表現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1）。頁 26。

但並不放棄其他各種追求與殖民者「相提並論」的可能。<sup>34</sup>於是，日據時期的台灣在結束了大規模的抗日運動後，<sup>35</sup>也進入了所謂的「非武力抗爭時期」。也就是說，在無法拒絕台灣併入日本版圖下，選擇以武力抵抗也失敗後，只能再追求任何一種平等對待的可能。於是，日據時期的台灣在結束了大規模的抗日運動後，也進入了所謂的「非武力抗爭時期」。而以日本統治台灣的方式而言，初期也因為疲於鎮壓台灣各地的武裝抗日運動，根本無經營台灣的政策可言。直到兒玉源太郎與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聯手展開一連串政策統治，如著名的「生物學統治」，即根據不同的環境而採取不同的手段適應。顯示所謂的「非武力抗爭時期」主要是指殖民地人民進入了一種缺乏武力後援的疲態。一定程度上，殖民統治者也消耗了許多資源，只是殖民者始終不願意放棄統治權，而殖民地人民也因為一直無能掌握武力優勢與殖民政權持久抗衡，但殖民地經驗畢竟不是一種平等狀態，具有自覺能力的殖民地人民便選擇持續的軟性抗爭，如之後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也就是說，在進入「非武力抗爭時期」後，第一步所要採取的動作便是劃分與殖民者的差異，為的是要提醒殖民地人民，自身處於殖民地的處境。

日據時期台灣非武裝政治運動是台灣史的一個新里程碑。這項運動在內涵上具有近代政治運動的特質——以爭取政治權利為運動的首要目標，在精神上則固守民族情操，因此可說是屬於近代民族運動的脈流。<sup>36</sup>

在進入了「非武力抗爭時期」之後，台灣新興的領導階層也開始推行台灣人民意識自覺的行動，大致上可以一九一八年十月的「聲應會」為一起點。而

---

<sup>34</sup> 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明治四十一年，留日學生已有六十名之多，至大正十一年更遽增為二千四百餘名。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24。譯文詳見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民】77）頁 42。

<sup>35</sup> 即前文所述以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為大規模武裝的最後高潮。

<sup>36</sup> 引自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晚報，【民】78）頁 9。

「聲應會」成立的原因，從以下的敘述可看出端倪：

東京台灣留學生為中心的台籍知識份子潮流風氣的改變，勢必促使他們與屬於同一民族和風俗習慣相同的旅日中國留學生及知識份子接近，且跟境遇相同的朝鮮人合同。這樣，到了大正八年底，中國方面中華青年會幹部馬伯援、吳有容、劉木琳，台灣人方面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及蔡惠如等人之間，以親睦為名目的團體組織之議告成，於是，以「聲應會」的名稱，成立了結社組織。<sup>37</sup>

「聲應會」的成立，代表著台灣青年在接觸到中國與朝鮮等知識份子後，一股反思日本高壓統治力量的結合，但也由於這是一個組織不緊密的團體，很快就自動解散，但是卻也是另一波台灣青年結社的開始。<sup>38</sup>如隨後成立的「新民會」（1920年，由蔡惠如發起，林獻堂擔任會長）並發刊《台灣青年》雜誌，也帶動了日後以文字為啓蒙工具的一系台灣文學作品<sup>39</sup>。

瞧！國際聯盟的成立，民族自決的尊重、男女同權的實現、勞資協調的運動等，無一不是這個大覺醒的賞賜。台灣的青年！高砂的健兒！我人還可靜默著不奮起嗎？<sup>40</sup>

<sup>37</sup> 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24。譯文引自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民】77）頁43。

<sup>38</sup> 大正八年林獻堂、蔡惠如集結台灣在東京的留學生，組織了「啓發會」，後更名為「新民會」，爾後新民會中成員中的學生又另組織「台灣青年會」，其他尚有「南盟會」、「留東同鄉會」等。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23~67。

<sup>39</sup> 新民會章程的第一章第二條即宣稱：「本會專以考究台灣所有應予革新之事項，圖謀文化之提高為目的。」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25。譯文見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民】77）頁45。

<sup>40</sup> 〈台灣青年創刊號的卷頭辭〉，原載於《台灣青年》創刊號（1920年7月16日）中譯文原載於《台灣民報》67號（1925年8月26日）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台北：明潭【民】68）頁1。

從《台灣青年》的發刊辭看得出台灣人民在接收到世界思潮的同時，反觀殖民地台灣的處境，沒有軍隊與日本做最直接的反抗，只好以啓蒙台灣民眾這種非武力的模式抵拒殖民者愚民政策宣導。也可以發現，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運動，文學工具性價值遠高於文學藝術性，直接與政治目的有一定程度的牽連；而這個牽連又因為台灣處於一種被殖民的體制下所預期的結構，也就是說台灣青年在追求或接收新知的同時，所面對的不只是自身涵養的鍛鍊，而是牽扯著反觀殖民地台灣的複雜情緒。

一方面台灣青年在面對與自身有血緣關係的中國青年，以及處境相同的朝鮮青年時，爲了因應自身存在的必要，會有一種群體式的結構產生，以便以一種有別於面對殖民統治者的次一等級的身份出現。爲了向中國及朝鮮甚至是日本當地青年有平等的學習機會，團體的組織成了一种群體提升的力量，而「啓蒙」成了這一批青年的重責大任。展現在過程，除了團體的組織外，刊物的發行成了某一種形式的存在證明，而這些刊物的發行與流通，恰揭示了台灣青年在殖民統治下朝聖的荆棘之道。

簡單來說，台籍青年在向外尋求出口的同時，面對的是一個開放且廣大的空間，在無從預知的情況下，理所當然會向與自身相類似的族群靠近。除了日本之外，中國和朝鮮是最容易被視爲學習與比較的對象。因此，台籍青年遊歷日本與中國的經驗，便成爲他們帶回台灣的「經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也顯現取經之後的各自詮釋，爾後在台灣引起的新舊文學論爭，雖然可以看成台灣傳統與新引進的學識認知之爭，也不能忽略其內部結構的複雜性。

以留學中國的張我軍爲例，1921年抵中國，1924年進入北京師範大學夜間部補習班學習，<sup>41</sup>並開始投文於《台灣民報》，僅1924年一年間便發表了〈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灣文學界〉、〈爲台灣文學界一哭〉、〈請合力拆下這座破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等諸篇對台灣新文學運動影響甚大的文章，砲火且一次比一次猛烈，從中也可以看出《台灣民報》的發刊的確是當時的知識份子共鳴的園地。

---

<sup>41</sup> 參見〈張我軍年表〉，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512~513。

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sup>42</sup>中便再次提到關於「民族自決」以及「改造社會」等概念，《台灣青年》的創刊開始，知識份子便不斷鼓吹著接收世界思潮的重要性，從陳炳的〈文學與職務〉、甘文芳的〈現實社會與文學〉、陳端明的〈日用文鼓吹文〉等篇章，可以得知對於同文同種中國的白話文運動，這些台籍青年是有意複製這樣的作法，將之移植到台灣。

然今之中國，豁然覺醒，久用白話文，以期文言一致。而我台之文人墨士，豈可袖手傍觀，使萬眾有意難伸乎！<sup>43</sup>

我今年六月有到過中國的地方，看過了這個白話文普及的狀況，一般得著便利很大，更加確實感覺有普及的必要。……（台灣）就地理上而論很接近中國，而以國的區劃上卻是屬日本的，兩個地方的文化都可以容易移入我們的社會上。<sup>44</sup>

遊歷在外的台籍青年接收到中國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認同了從語言文字下手改造社會的概念，另一方面也見識到日本現代化成功的例子。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脫亞入歐」的意念貫徹，日本全面現代化的結果使得文明中國喪失了領導地位。<sup>45</sup>自古中國睥睨鄰國而稱蠻、夷、狄等，面對西方諸強也以消極的鎖國政策避之，未曾預料一日竟戰敗日本，甚至需要割地賠款，這樣的恥辱讓全中國有徹底革新的需求。但清光緒維新的失敗，也讓知識份子對朝廷

---

<sup>42</sup> 引自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2~4。

<sup>43</sup> 引自陳端明：〈日用文鼓吹論〉，原載於《台灣青年》（三卷六號，1921年12月15日，被禁發行），重刊於《台灣青年》（四卷一號，1922年1月20日），後收入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台北：明潭【民】68）。頁3~5。

<sup>44</sup> 引自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原載於《台灣》（四年一號，1923年1月1日），後收入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台北：明潭【民】68）。頁6~19。

<sup>45</sup> 在時間的歷程上，亞洲確實比歐洲更晚見識到現代化的魅力，而日本的脫亞之說，一方面是爲了迎頭趕上先進代表的歐洲行列，另一方面恐怕也是爲了要擺脫中國的影響，那些自唐朝以來的文明輸入，事實證明，急遽現代化的結果，讓日本接連在軍事上戰勝俄國與中國，但一如孫歌所說的，所謂「脫亞論」也讓日本到底屬於亞洲否成爲一個議題。參見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收於氏著，《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2001）

革新政策產生不耐，甚至用革命來訴求更可能達到革新的效果。

革命之後的中國，需要一種新秩序、新價值來領導新的中國，1915年的《青年雜誌》（後改爲《新青年》）象徵著彼一代青年重造中國的熱情與大任，而新文化運動鎖定舊有的禮教、文化等價值觀，加以抨擊、清除，以陳獨秀、胡適爲首的文學革命重寫了中國文學史，素被稱之爲小道的白話小說也翻轉了在文學史上的價值。<sup>46</sup>這當中不能排除，文字用以傳播新思想的效率考慮，文字成了一種知識傳達工具，越是白話越能在大眾間流傳，但除了用白話文書寫政治等改革思想外，在文學創上，也興起了以白話作文、作詩、小說的文學革命。只是文學用以描寫、諷刺現實社會，爲促進社會改革功用的說法，畢竟不同於文字只是宣傳工具，文學作品還是存有作者自身的感懷，那怕只是隱晦的。

整體而言，中國的五四運動所帶來的影響是全面性的，在文學的表現上也是被要求與其他學科並進的「現代」，「現代」一詞指的是線性時間接續的現在對比著已經過往的前段時間意識，<sup>47</sup>處於一種當下的、不至於過時的，因此會成爲一種代表著「新」的意義。而這個時間的進程，讓處於急需追求「現代化」的中國而言，「現代」有一種必須迎頭趕上的時間壓力，而「現代性」放在對近代中國的理解中，李歐梵認爲那就是一種「更新」的、一種行動的：

……「新」這個詞幾乎伴隨著旨在使中國擺脫以往的繃銜、成爲一個「現代」的自由民族而發動的每一場社會和知識運動。因此，在中國，「現代性」不僅含有一種對於當代的偏愛之情，而且還有一種向西方尋求「新」、尋求「新奇」這樣的前瞻性。<sup>48</sup>

---

<sup>46</sup> 黃錦樹先生認爲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是其體系化的白話基本工程，並且調動了文類價值次第的顛覆。參見黃錦樹：〈文之餘？論現代文學系統中之現代散文，其歷史類型及與周邊文類互動，及相應的詩語言問題〉，《中外文學》第32卷·第7期，2003年12月。

<sup>47</sup> 「現代」是一種時間意識，但是「現代性」的解釋就比較複雜，如福柯（Michel Foucault）便不認爲「現代性」是一種時間觀念，而是一種「態度」，一種決定行事作風的自由意志，與現實連結的思想態度與行爲模式。「現代性」之所以成爲一個各家定義有所差異的術語，必須回到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啓蒙歷程，其時的「現代」社會對於「人」重新思考的過程展現。詳參陳嘉明等：《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北京：人民，2001）

<sup>48</sup> 引自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聯，2000）頁236。

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份子扛起富強中國的重責大任，對各學科無不以吸取西方諸強強大、進化的印象對中國進行廣大範圍的革新，成了所謂「現代性的追求」，以「現代性」來凸顯所欲追求的「新」力量，且在引進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與中國固有文明、傳統價值的衝突與矛盾，這樣的一個解釋脈絡中，顯見「現代化」是中國的一個重要轉折，並深刻影響著中國近代史。<sup>49</sup>

當下在中國遊歷的台灣青年如張我軍、黃朝琴等人，在見識到五四運動對中國的影響後，也是有意識地想將這樣的運動移植回台灣，除了在《台灣民報》大量轉載胡適、魯迅等新文學作家作品外，台籍青年也在論述中彰顯他們所受到的影響。

由外國回來的留學生和其他青年志士政客，看中國這樣守舊不合現代的生活，遂起了社會上各種思想的革命，其中文學的革命如白話文這一種是最顯著的，也最打動人心，比像南北的戰爭更是激烈了。

50

我們今日欲說文學革命，非從胡適的「八不主義」說起不可。所謂「八不主義」是什麼？（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學；（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學；（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學；（七）不摹仿古人；（八）不必俗話俗字。<sup>51</sup>

上文引自黃呈聰與張我軍的論述，從中瞭解這一部分台籍青年接觸到中國

<sup>49</sup> 王德威甚至指出，中國的現代性追求或可推溯至晚清，其表現諸如大量創作的譴責小說，或「以意逆志」的翻譯小說。「也從來沒有一個時期的作者共同投注如此龐大的精力與好奇心，以圖揭發社會各階層的醜態；更沒有一個時期的作品在形式上是如此的拮据扭曲、生澀多變」（71）參見王德威：《小說中國》（北京：三聯，1998）

<sup>50</sup> 引自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原載於《台灣》（四年一號，1923年1月1日），後收入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台北：明潭【民】68）。頁6~19。

<sup>51</sup> 引自張我軍：〈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15~21。

五四運動後的態度，除了感受到五四運動對中國社會的衝擊外，也體認到文學革命的使命，不但引介中國新文學作品到台灣，甚至是身體力行的創作。如同五四在中國形成激烈的運動一般，陳獨秀認為個人化的西方思考系統有助於破除傳統的桎梏，於是對舊有的中國窮追猛打，務必拋棄傳統的價值觀等。為了將新引進的知識系統快速傳播，選擇一個主動攻擊的對立面當是最容易吸引人的方式，於是台灣的新文學運動首先便以掀起新舊文學論爭作為序幕。<sup>52</sup>

一方面新文學運動以論述挑戰台灣舊有文壇勢力，一方面也引介中國新文學作品到台灣，而且也投入新文學的創作，藉以帶動全面新文學創作的風氣。本來中國的新文學作品便具有同文同種更易接受、明白的優勢，看起來五四運動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絕對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同時也不能忽略比中國更成功、更快速進入「現代」的日本所帶給台灣的影響。原因是殖民政權早在殖民統治之始，便展開「國語教育」，實行殖民統制的宣導；因此，台籍青年對於日本文化的接收具有一定效率，一方面有殖民地國（日）語基礎的優勢，居住在台灣青年，在閱讀上取得日文書籍似乎比中文較為容易；另外一方面，以留學的人數比例而言，留日的青年也較中國為多。這也就是為何又有其時台灣文壇究竟受何者影響較大的爭論產生。

如楊雲萍即認為日據時期的台灣詩人與小說家皆由日文來接受世界文學，台灣新文學運動，就其個人體認，受日本影響較大，受五四運動影響較小。<sup>53</sup>事實上，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狀況，似乎也不能依照留學或遊歷的經驗（人數的多寡），去取決台籍青年所受影響的大小。就張我軍而言，他引進了「八不主義」的確和他在中國留學的經驗有確切的關連，乃至後來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旗手，然而，在張我軍諸多論著中，也不乏對日本文壇的掌握，甚至也可見其推廣日文的用心。<sup>54</sup>另外如台灣新文學之父一賴和其一一生皆在殖民地統治中渡

---

<sup>52</sup> 另外，為了擠（急）進現代的行列，如同福澤諭吉由「東洋連帶論」的主張轉為〈脫亞論〉的主張亦看出為了追求現代的緊迫性。參見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2001）

<sup>53</sup> 參見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民】89）頁33。

<sup>54</sup> 在張我軍全集中整理了張我軍討論日文的相關論述，如〈為什麼要研究日文〉、〈日本文學介紹與翻譯〉（演講）等，見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442～507。

過，接受殖民體制下的教育，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卻堅持至今為人津津樂道的只用漢文創作。雖然沒有長期停留於中國，但極有可能是一九一九年渡海前往廈門博愛醫院行醫，也見到中國五四運動在中國所造成巨大的迴響有關。<sup>55</sup>因此，大致上可以推論出台籍青年面對殖民地的處境是有自省的能力，並且願意擔任傳播的中介將見聞引導至島內民眾。至於受何者影響較大，或者不該成為唯一的論述焦點，因為無論何人、何時、何地，都很難推論出其知識系譜的養成，但可以藉由論述或創作的表現，體驗出台籍青年當下看待世界的境況，佐以對當下的客觀認知。

或者可以理解的是，日據時期的台籍青年，接收世界思潮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台灣民報》等的發刊雖然是一個知識份子交流見解的管道，但也並非是一種普及的狀態，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下也凸顯了台籍青年朝聖的艱難；當可從文本中去解讀這樣焦慮，也可以去嘗試理解，為什麼在當時即有知識份子去區分自己所受的影響，究竟是源自中國或是日本。作為被殖民的台灣，在馬關條約之後的台灣成了遺棄的對象，在殖民帝國極盡所能展現其現代化的成果之後，中國與日本兩者的圖像也在台灣人心中埋下錯綜複雜的歷史情結。

### 第三節 朝聖經驗與文學書寫

從日據時期的新文學創作看來，文學作品普遍呈現一種「新」的氣息。單就形式而言，小說、新詩等文類是新文學運動之前未曾有過的，這些文類的創作之始，就是一種更新、替換的轉變。<sup>56</sup>而從內容看來，普遍是一種揭露殖民地台灣人民所遭受不平等的待遇等諸多現實人生的主題，<sup>57</sup>或諷刺、或激勵等表現方式，這也是為何論者提及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品，多以「反帝、反封建」概括。

在新文學運動之前的是新舊文學論爭，之所以會有新舊文學論爭，是由於

<sup>55</sup> 參見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與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民】82）

<sup>56</sup> 對舊詩社的抨擊顯然是提倡新文學運動下，首要集中火力的攻擊對象。

<sup>57</sup> 參見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蘊含的思想內容〉將日據時期小說內容劃分為：批評舊社會的陰暗面、諷刺台灣人民之性格、譴責日本殖民統治、關懷婚姻愛情之自主、有關皇民文學的撰寫等。收於氏著：《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民】84）

台籍青年接受世界思潮洗禮後，反思台灣文壇沈浸在一片吟哦的舊詩氣氛之中，不僅是外在統治勢力的封閉，似乎內部的思想也呈現自困之姿。於是陳炳的〈文學與職務〉首先點出文學需要肩負傳播文明的責任，之後在《台灣青年》、《台灣》等刊的相關文學論述，主要可分為文學的內容與使用的語言（即白話文）兩方面，文學內容是主張要促進社會進化的功用說，而為了加強這一目的的效率，也就是閱讀的普遍率，使用的語言以日常語言為是，即前文所提台籍知識份子欲系統式的引進五四文化運動的模式，促進台灣人民的吸收新知，以達啓發蒙昧之效。爾後張我軍更是直接點名舊詩社、舊文人，讓新舊文學正面交戰。

這一批文學青年不只是理論上的陳述，身體力行的是台灣新文學創作。《台灣青年》的創刊恰是顯現台灣青年對世界新知的需求，以及銜接上世界思潮的象徵。接續的《台灣》更刊登了台灣新文學史上的第一篇（日文）小說，即署名追風的〈她要往何處去〉，其他尚有署名無知的〈神秘的自制島〉、柳裳君的〈犬羊禍〉等。爾後《台灣民報》更是大量轉載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品，而台灣的部分也見到如張我軍、賴和、楊雲萍等具有更純熟的文學創作技巧的新文學作品出現。

隨著一九二六年賴和第一篇小說〈鬥鬧熱〉（《台灣民報》八十六號，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的發表，也進入了葉石濤所謂的台灣新文學「成熟期」，<sup>58</sup>一直到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爆發前，這其間的文學作品無論量與質在文學發展史上都該有一定程度的地位，此處討論新文學創作初期張我軍等人作品，一是可以做為台灣新文學的創作是否膺服新文學運動理論發展的檢視；另外則可以觀察台灣新文學運動在進入蓬勃發展的壯觀期之前，文學創作者的創作風格樹立，與其他作者間的差距，進一步觀察鄉土文學論戰引發後的文學條件限定、

---

<sup>58</sup> 葉石濤將台灣新文學發展分為三期：起點設定在一九二〇年《台灣青年》創刊號的誕生，第一期截至一九二五年賴和的第一篇散文〈無題〉為止，稱之為「搖籃期」；第二期是一九二六年賴和的〈鬥鬧熱〉至一九三七年總督府全面禁用漢文、七七事變發生為止的「成熟期」；接著第三期是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的「戰爭期」。本節討論的不是以葉氏所劃的分期作為討論對象，而是試圖在台灣新文學運動期間找出發展的脈絡，藉以對照文學青年的朝聖歷程與文學書寫經驗，討論暫止於鄉土文學論戰之前。

期許，是否大規模更動了文學創作者對文學的堅持或至此建構了台灣文學的「傳統」。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不但與台灣舊有文壇產生對文學價值認定的激辯，也進一步揭示台灣新文學運動包涵了這批青年不同的取經管道，與對文學創作的期待差異，是如何開展了台灣新文學運動，與建構出台灣新文學以來「台灣文學」傳統價值。

試見張我軍的小說作品：

在北京的留學生，學費的多少正與讀書的多少成個反比例……

但北京有伊在，我實在萬分不願回去的！……試問兩性之愛何時無之，何處無之？我以為戀愛之重要，世上無出乎其右的。<sup>59</sup>

你這受祖父之蔭和社會制度之蔭，享受著萬惡的遺產的東西！……

啊！萬惡的家族制度！在掛殺個人的家族制度！然而我不養他們，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叫誰去養呢？<sup>60</sup>

從小說的內容看來，張我軍所描述的是在北京的所見所聞，當然也包含了政局與時事，尤其是社會主義觀念的萌芽，在其作品中也可見此潮流，另外就是在北京的台灣留學生生活，也是描寫的對象。比較需要討論的是，張我軍作品中個人色彩的濃厚，或可視之為受五四影響的另一重要特徵。<sup>61</sup>

個人主義是引自西方文明的產物，在張我軍的作品中，無論是詩作或上述所引的小說作品，都顯現出一種個人主義的色彩，並且無論在論述或小說、詩作等作品中，都可見其強烈主張戀愛至上的陳述，<sup>62</sup>李歐梵認為，五四時期詩

<sup>59</sup> 引自張我軍：〈買彩票〉，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62～271。

<sup>60</sup> 引自張我軍：〈誘惑〉，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84～293。

<sup>61</sup> 綜觀張我軍的文學創作，確實是有意識接收五四以來對文學所賦予的期許，張我軍總共發表了三篇小說，分別是：《買彩票》（《台灣民報》123～125 號，1926 年 9～10 月）、《白太太的哀史》（《台灣民報》150～155 號，1927 年 3～5 月）、《誘惑》（《台灣民報》255～258 號，1929 年 4 月）

<sup>62</sup> 引自張我軍：〈至上最高道德——戀愛〉，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

人情感的爆發是很強烈的，其指出：

謳歌愛情是 20 年代的一個普遍現象，……，五四運動不僅導致了文學革命與知識革命，而且推動了情感革命。

……愛情已經成為新道德的整體象徵，成為被視為外在束縛的傳統禮教的自在的替代品。作為整體解放的總趨勢，愛情成了自由的別名，在這個意義上，只有通過愛，只有通過釋放自己的激情與能量，個人才能真正成為完整的人，自由的人。愛情也被視為一種挑戰的舉動，一種真誠的行為，一種拋棄虛偽社會中一切人為禁錮的大膽叛逆……<sup>63</sup>

留學於北京的張我軍將其留學經驗中所見所聞融於其文學創作中，在當時的台灣文壇是一種「新」的氣息，強調個人的覺醒，抵抗如傳統氏族的群體結構，繼而改變陳腐的舊社會。但必須注意的是，當時的中國亟欲求富強之道，而舊有的傳統被視為阻撓中國進步的桎梏。所以摒棄舊有中國的一切是求新、求變的首要任務，而台灣除了舊有的思想觀念包袱外，還是一個殖民地，這是中國與台灣最大差異之處！因此台灣的新文學運動，除了闡述當代思潮外，還必須向人民提醒台灣仍處於一個被殖民的狀態：這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政權理所當然可以以統治之名行壓迫之實。

於是在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作品裡，總是貫穿著這樣的一個主題：即殖民者等同於法律。而巡查便是法的執行者，甚至因為是殖民者的緣故，所謂的「法」只是殖民統治者隨心想做便成立的規定，不順遂的話，極可能被賞一頓「青草膏的滋味」。台灣人的尊嚴被踐踏餘地，甚至連一個基本人的稱謂都喪失，只以「汝」叫喚。試見賴和作品：

---

頁 111~116。

<sup>63</sup> 引自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聯，2000）。頁 98~99。

官之所以為官只在保持他的威嚴。

……這是這幾日來對於「行商人取締的峻嚴，一動手就是倒擔頭翻；或是民家門口，早上慢一點掃除，就被以度量衡規矩的保障，折斷幾家店鋪的『稱仔』。」<sup>64</sup>

張我軍和賴和兩者皆曾在《台灣民報》發表作品，想當然爾也透過《台灣民報》而與其他的新青年有所交流，兩位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皆是身體力行的創作。但從其作品中也可常看見兩者所關懷的對象不同，張我軍所訴求的是我手寫我口的文化改革，是強調新文學理論的實踐階段，而對賴和而言，新文學創作是一種創作方法與形式，賴和更在乎的是藉由作品來揭發日本殖民統治的兇惡，例如警察制度的凶險，注重的是作品內容所欲呈現的現實關懷。如陳明柔先生所指出：

是以台灣知識分子在面對台灣前途的問題時，首先需要克服的便是法律上的箝制與不平等，同時由於世界民主思潮的洗禮，知識分子開始意識到權利/義務的對等性，因之，在他們啟蒙群眾時即有意識地將「法」的觀念傳布給民眾。<sup>65</sup>

由這一批台灣新文學發軔之初的文學作品細細閱讀，便可發現此期的台籍青年其共通點是對接收世界思潮的接收，繼而有意識性地引進台灣，啟發台灣人民是具有相當的熱情與責任感，文學作品成了一種媒介，內容包含了這些青年認識的世界，及對文學鑑賞與創作的品味，在語言文字等外部形式的運用、思想蘊含的傳遞，都可以說是對文學的要求。而文學作品更呈現了，殖民地人民對殖民帝國與血緣祖國之間，一種隱晦的距離，無論是外部的語言文字等使用或思考的工具，或是內在精神層次上的身份或文化現象等心理上的認同，兩

<sup>64</sup> 引自賴和：〈不如意的過年〉，載於《台灣民報》一八九號，（1928年1月1日）

<sup>65</sup> 引自陳明柔先生：《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思想風格及其文學表現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1）頁89。

者之間顯然一如現實的地理，都是有距離的。另一位作家的作品或更能說明這一種現實環境的困頓，讓台籍青年無所依歸的例子，即 27 歲時到東京尋求發展的翁鬧。

翁鬧作品的異質性一如施淑先生所稱的「惡魔主義」(Diabolism)，<sup>66</sup>在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作品確實是獨樹一幟。師承於日本明治維新後引自法、俄自然主義派的書寫，翁鬧「為進出日本文壇」、「在東京苦修流浪」<sup>67</sup>，自然也在作品中展現出自然主義式的「無解決」的平面描寫。

他突然想起了一個奇妙的念頭：北海道和台灣，究竟那個地方比較遠？他記得在地圖上北海道比較近，但他發覺在內心這兩個地方都同樣遠。

住在那裏的玉枝和喜美子似乎跟自己遙遙相隔。

既然如此，我不回台灣，也不到北海道。<sup>68</sup>

翁鬧說的是北海道與台灣，雖然不是那麼精確的比照日本與中國，但卻指出另一個問題，即台灣何在？人在日本的小說主人公，雖說因為感情的因素而困擾著何處去，但這也是象徵著，台灣人找不到一個歸屬的失落與內在的焦慮。如同張我軍的戀愛至上論，翁鬧也選擇遁入自我的戀愛想像中。比起張我軍，翁鬧的寫作是文學創作中較為靠近只求文學的純粹展現，少了身體力行創作新文學的示範作用，一來也是因為在翁鬧創作的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也臻為成熟，再則翁鬧是有著為了進出日本文壇的創作自覺，如張恆豪指出的：

翁鬧對於人類內心世界探索的興味遠甚於外在現實世界的觀察，小說充滿了現代主義的敏銳感覺、心理分析和象徵手法。<sup>69</sup>

<sup>66</sup> 參見施淑編：《日據時代小說選》，(台北：前衛，1992) 頁 20。

<sup>67</sup> 劉捷語，引自張恆豪：〈幻影之人——翁鬧集序〉，收於《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衛，1991) 頁 14。

<sup>68</sup> 引自翁鬧：〈殘雪〉，原載《台灣文藝》第二卷第八、九合刊號，(1935 年 8 月 1 日) 收於《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衛，1991) 頁 75。

無能解決的心理描寫，是關於台灣或者是翁鬧自身都有著無法、無力解決的困頓，而選擇潛入文學創作的美學想像。或者另一個同為殖民地作家，朝鮮作家張赫宙的自白可以佐以解釋殖民地作家苦悶：

用朝鮮語範圍實在狹小，而用日語，翻譯成外語的機會也多，所以，  
無論如何也要進入日本文壇。<sup>70</sup>

從上引文可見同樣身為殖民地作家，為了尋找一個疏解苦悶的出口，依循著殖民帝國所提供僅有的管道，遁入美學修成的自我鍛鍊，似乎成了翁鬧、張赫宙（後改名為野口赫宙，1932年獲《改造》獎）等殖民地作家生命唯一的出口。

另外在台灣的知识份子，無論新、舊在身份認同與傳統價值上也開始產生認定與判斷上的困難，顯現了殖民地人民內部根本的衝突。這也可用以理解，何以台灣新文學運動展開時，夾雜著喧囂的新、舊文學論爭。傳統的文學價值、舊詩社的存在，甚至是書房的設立，都象徵著台灣的舊文人緊抓住傳統舊中國的辮子，而昧於中國的改朝換代。當中國傳統的價值在中國也被顛覆之際，而台灣的舊文人守著的也不是登廟堂大旗的國粹、國學，而是一種閉塞在內部組織的吟風弄月，以一種畸形的存在之姿渾然未覺自己已經是唯一的遺民了。是否在台灣新知識份子喊出除掉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時，這批舊文人才驚覺變天？<sup>71</sup>如同黃朝琴〈漢文改革論〉中所言：

言文不一致的漢學，中國已經著手改良了，像這種文話兩樣的寫法，  
日後欲叫那地方的人給他保存呢？我替他答道，可以送到台灣去給

---

<sup>69</sup> 引自張恆豪：〈幻影之人——翁鬧集序〉，收於《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台北：前衛，1991），頁14。

<sup>70</sup> 引自尾崎秀樹、陸平舟、間ふさ子共譯：《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2004）頁4。

<sup>71</sup> 雖然一定也有願意隨世推移的傳統文人，但是因為傳統詩社成了新文學運動首要開刀的對象，因此，特別凸顯了舊文人與新興知識份子間的對抗張力。

他們保管罷！<sup>72</sup>

在陳虛谷〈榮歸〉中，便把這一種新舊台灣人的矛盾呈現出來。老秀才把年輕的兒子送到日本接受新式教育，卻必須面對自身堅守著的傳統在自己手上斷裂的結果，像似親自向殖民帝國妥協，以求得年輕的一代與殖民帝國善意的回應般。

秀才長歎了一聲，索性把電報擲在桌上。他恨自己滿腹詩書，無力解決這個當下急切的問題。他不能詛咒朝代的變遷，詩書的不值錢了。他並看不起了受新教育的青年。<sup>73</sup>

也因為是殖民地的原因，失去傳統價值依靠的新舊知識份子，在選擇性的認同中，無論對中國或日本都是各自想像，或重疊或分歧，但都有一種忍不住對「現代」的嚮往。也由於這樣的嚮往，展開了殖民地人民「朝聖」之路。

「到底高文是何官銜？」

「就是高等文官，可以做郡守和知事【縣長】。」大的兒子答。

「這比得起清朝的秀才嗎？」

「不止咯！差不多是舉人、進士咧！」<sup>74</sup>

台灣的舊文人一心想進京趕考取得功名，這樣傳統的價值不因爲改爲日本統治就放棄這樣的價值觀念，<sup>75</sup>一種依循過往的認知而存在的模式，也正印證了殖民帝國所釋放的權力，只是爲了更鞏固自身位於的統治金字塔的頂端。

---

<sup>72</sup> 引自黃朝琴：〈漢文改革論〉，原載《台灣》（四年二號，1923年2月1日），後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台北：明潭【民】68）。頁20~35。

<sup>73</sup> 引自陳虛谷：〈榮歸〉，原載《台灣新民報》（三二二、三二三號，1930年7月16日、26日），後收於《陳虛谷、張慶堂、林越峰合集》（台北：前衛，1991）頁51。

<sup>74</sup> 引自陳虛谷：〈榮歸〉，原載《台灣新民報》（三二二、三二三號，1930年7月16日、26日），後收於《陳虛谷、張慶堂、林越峰合集》（台北：前衛，1991）頁52。

<sup>75</sup> 當然這也顯示出新興的知識份子看待傳統文人的目光。

日本化的朝鮮人、台灣人、或是緬甸人通往母國之路都被完全封閉起來。他們也許能完美地說或讀日語，但他們永遠不會管轄「日本」本洲的那個縣，或者甚至被派駐到出生地以外之處。<sup>76</sup>

殖民地內部人民對殖民帝國的拒斥，卻因為殖民帝國在展現「現代化」的優勢中，開始對「現代化」產生迷思似的信仰，無論其追求之道是由殖民帝國或是其他國家。而藉由殖民帝國而尋求進入「現代」行列的殖民地人民，可循著帝國所提供的少數管道，安分守己地遵守殖民政權規定的遊戲規則，也獲得較為安穩的生活保障，絕不觸碰更為敏感的身份認同。

因此，若是將日據時期的台灣知識份子作一簡單的劃分，可得新與舊之間的兩個世代：接受傳統漢文化的舊文人、及追求新知的新知識份子。但其中在所謂傳統的舊知識份子中卻不能一味歸為拒絕追求新知的一群。本文亦一再強調即使同屬於新文學運動陣營，其追求的現代也可能因為管道的不同，而影響了知識份子在情感上個人的歸屬傾向，導致民族意識認同的差異。同樣地，舊世代的傳統人群中，當然也會出現彼此分屬不同立場不一的群體。

而在新與舊的世代最簡單的區隔，便是傳統文人多半日本殖民之前或之初自身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便以養成；所謂新興的知識份子則是成長在殖民統治的青年。而新知識份子這一群，又可區分為接受殖民體制的徵召，進入殖民者的統治系統，尋求自我利益的空間如〈榮歸〉裡的例子；另外則是拒絕進入殖民體制的青年，此群體多半因為接受世界新知的洗禮後，對殖民體制有所認知並覺醒的一群。如同楊守愚〈決裂〉中知識份子以參加農民組合的行動，展現對殖民政權的抗爭，放棄進入殖民體制之中。

「那裏？你從東京回來的當時，不是還很有些人仕要備用你嗎？如

---

<sup>76</sup> 引自安德森（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1999）頁 107。

果你是甘心修善的話，現在怕不也是市役所的一員書記了嗎？還怕什麼沒有錢賺，一個月至少四十塊，但誰又叫你跑到流氓組合去呢？」<sup>77</sup>

但因為殖民地人民對抗爭殖民抑或在殖民體制內生存的認知不同，也產生內部分裂的可能。

農民的這抵抗運動雖然主要敵人為日本殖民者，但構成台灣文化協會的主要成員大多為地主或資產階級，所以次要敵人乃是文化協會上層成員。<sup>78</sup>

殖民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權，會釋放少許的權力（益），殖民地人民為了爭奪這少許的利益，而尋求向殖民者輸送忠誠的管道，讓殖民地的人民形成權益的矛盾，殖民體制下的運動在知識份子眼中像是無法避免的積砂始終未能成塔的無力。<sup>79</sup>

#### 第四節 新、舊文學的分歧

回到文學書寫的主體，何以同是殖民地台灣知識青年，在對外尋求出口的同時，回頭以自身力行的創作竟個異其趣？而且台灣文壇在三〇年代展開了第一次鄉土文學論爭，這是對新文學該賦有附加價值進行大規模的論戰，因此下文將針對新文學運動理論的建構，進行鄉土文學論戰之前的新文學運動文學理論解析，或可由此看見新文學陣營中對「文學」認知的差異，更確知台灣新文學書寫的內部分歧，在文學史上較為客觀的位置。

二〇年代的台灣在台灣青年知識份子的引領下，無論是在文化或者民族運

---

<sup>77</sup> 引自楊守愚：〈決裂〉，原載《台灣新民報》（三九六～三九九號，1933年1月1日、9日、16日、23日），後收於《楊守愚集》（台北：前衛，1991）頁226。

<sup>78</sup> 引自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99）頁37。

<sup>79</sup> 在小說的表現上，即有柳裳君的〈犬羊禍〉為首例等諷刺小說。

動上，漸漸都有了與以往不同的氣氛，尤其文壇逐漸呈現一股新的氣息，除了留學於應慶大學的陳炯在《台灣青年》發表了〈文學與職務〉，便強調「文學者，不可不以啓發文化，振興民族爲其職務也」，提出文學的功用，並且主張文學的語言應該要以白話文爲主的方向外，其他如甘文芳的〈現實社會與文學〉（收於《台灣青年》三卷三號）、陳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論〉（《台灣青年》三卷六號）等，也一同揭開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序幕。而「台灣新文學運動旗手」的張我軍，如本章第二節所述掀起了台灣新文學運動另一波論戰高潮。

爲了進一步認知新文學陣營的文學認知理路，以及對其時文壇的建言，根據《台灣青年》等原始刊物<sup>80</sup>及梁明雄先生《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sup>81</sup>所列舉白話文運動的論述篇章，佐以李南衡先生彙編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 文獻資料選集》<sup>82</sup>試整理出幾篇重要論述作成下表。由此更可清楚台灣經由遊歷在外的知識青年，開始著文發表於《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等刊物上，諸多對於台灣文化運動等呼籲，亦可看見新舊文學在白話文運動伊始的分歧點，主要仍以漢文的使用爲討論重點，也因爲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使得台灣青年更進一步意識到殖民地台灣的資訊落後等問題。

表格 1

發表人	文章篇名	發表處	論述重點
陳炯	文學與職務	《台灣青年》創刊號	從文學的興廢可知民族盛衰，期言文一致，表作者思想感情，以促文明革新
甘文芳	實社會と文學（現實社會與文學）	《台灣青年》第三卷第三號	強調有文學表現生活的責任，敦促社會的進化功能
陳端明	日用文鼓吹	《台灣青年》第三卷	鼓吹日用文，以達作文實用

<sup>80</sup> 參見東方書局出版，婁子匡「景印中國期刊五十種」，列 12、13、14 種的《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29 種《台灣新文學雜誌叢刊》。

<sup>81</sup> 參見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民】85）頁 43～90。

<sup>82</sup> 參見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台北：明潭【民】68）

	論	第六號（被禁）《台灣青年》第四卷第一號（重刊）	性
黃呈聰	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	《台灣》第四年第一號	暢中國與台灣的歷史文化淵源，以其白話文的普及經驗，期言文一致作普及民眾智識的急先鋒
黃朝琴	漢文改革論	《台灣》第四年第一號	談中國新體白話文促文化前途，台灣亦應言文一致
許秀湖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台灣民報》第一卷第四號	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尤其是陳獨秀其胡適等文學革命主張
施文杞	對於台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	《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四號	轉載《民國日報》中「的」字的用法及分化法表
張我軍	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	《台灣民報》第二卷第七號	往日的文明以宣告破產，文學的價值在於改造社會，並對舊文人開砲
蘇維霖	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略述	《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十號	介紹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張梗	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	《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十七號～第二十三號	提出舊小說改革的迫切性，提倡台灣小說的創作
前非	台灣民報怎麼樣不用文	《台灣民報》第二卷第二十二號	說明白話比文言的好處，使得人人可以閱讀

	言文呢？		
張我軍	糟糕的台灣 文學界	《台灣民報》第二卷 第二十四號	文學亦要以世界為目標，勿 以舊詩沽名釣譽
一郎（張 我軍）	為台灣文學 界一哭	《台灣民報》第二卷 第二十六號	回應連橫對新文學陣營的 反擊
張我軍	請合力拆下 這座敗草穢 中的破舊殿 堂	《台灣民報》第三卷 第一號	台灣舊文學是中國舊文學 的孽種，引論胡適「八不主 義」
張我軍	絕無僅有的 擊砵吟的意 義	《台灣民報》第三卷 第二號	直指擊砵吟是詩界的妖魔
張我軍	接破悶葫蘆	《台灣民報》第三卷 第三號	反擊悶葫蘆生〈新文學的之 商榷〉，重申新文學是改革 後的中國文學
張我軍	復鄭軍我書	《台灣民報》第三卷 第六號	復鄭軍我〈致張我軍一郎 書〉，白話文是所謂「國語 的文學」，不僅是北京話
張我軍	文學革命運 動以來	《台灣民報》第三卷 第六號～十號	簡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 文學〉，簡介文學革命的經 過
張我軍	詩體的解放	《台灣民報》第三卷 第七號～九號	詩體的本質是情感與節奏
張我軍	新文學運動 的意義	《台灣民報》六十七 號	新文學運動的要點有二，一 是白話文學的建設，二是台 灣語言的改造

上述篇章中多以「言文一致」為中心論述，以見識到中國白話文運動的經驗提倡台灣也該有這樣的運動，從提倡白話文、言文一致等中心觀念可以看出，這時期（二〇年代）遊歷在外的台灣青年具體地將見聞轉介於台灣島內的企圖心。

時至一九二四年，蔣渭水、蔡培火等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袖，以違反治安警察法遭逮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遭到挫敗，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中提到：

除少數幾位極少數的人，一息奄奄的還在那裏請願議會設置之外，……諸君怎的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應用於社會，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台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裏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糞臭。）想出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sup>83</sup>

砲火猛烈的張我軍第一篇文章就直指久據文壇的舊文人，絲毫不留情面。從文章中可以明白顯示，新文學陣營的主張者，多數見識了中國或日本的改革與維新，尤其是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更是改革民族弊病的重要手段，藉由普及知識的第一步，強化大眾對新知的接受，成了這批新興知識份子所肩負的重要任務。而「科學」、「民主」等近代文明的產物成了文化運動所內涵的訴求，這跟亞洲區的國家面對近代歐洲文明的態度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台灣新興知識份子群集體式的發文著述，再由中國五四運動中學習傳播的經驗，討論文字的普及等議題。

談論到文字的議題，以及其傳播方式，勢必聯想到文字使用的基本面，除了日常生活的文字書寫，諸如書信等外，而文學創作當是更高一階需要面對文

---

<sup>83</sup> 引自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2~4。

字的應用層面。

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南北美洲的獨立運動一旦成為印刷出版的主題，就變成了「概念」，「模式」，還有名符其實的「藍圖」了。<sup>84</sup>

其時台灣文壇因為日本總督府的刻意拉攏詩社林立，佔據了台灣文字傳播的管道與可能，離開台灣的新興知識份子，進入了世界現代化的思潮，要想取得發聲的管道勢必另闢蹊徑，於是《台灣青年》的發刊也選擇在東京，避免台灣總督府的取締，另一方面也在刊物上引介世界思潮，並且企圖打垮陳舊的文壇勢力，希望取而代之。用安德森的話來說，就是以印刷語言的方式傳播「概念」，一旦概念的形成，即進入了此思考模式，也更進一步讓殖民地人民有體認到世界思潮的可能。

張我軍一出手便點名舊詩人作為攻擊的對象，繼而引發的新舊文學論爭，雖然未必是深諳文壇勢力轉移的取代之道，但是可以看出舊詩壇所執守的古字咬文是與新文學主張相違背，因此成了新文學首要挑戰的第一對象，於是張我軍的新詩創作更是作為新文學運動最具體的表現。

從《張我軍全集》中所搜羅的新詩作品中加以檢視，張我軍的詩作可以說是幾乎都是個人情感的抒懷，這一點絕對符合其本身對於文學創作應具有真實感情創作的標準。既然創作的基調統一，那以下將前文提及張我軍對文學創作的論述作出條列式的整理後，大致上可再從形式與內容兩大方面入手。

形式的部分是張我軍對創作態度的要求，這一部分是指張我軍認為創作是需要發自個人最真實的感情，藝術技巧的呈現不重要，但卻可以與創作的內容相輔相成，而非專注於技巧的玩弄，強作吟哦之詞。

分析張我軍的詩作，其個人的影子屢屢現身於詩作中，的確是讓讀者在閱讀之時，可以強烈感受到詩人是以樸實的文字在陳述其真摯的情感。而在創作

---

<sup>84</sup> 引自安德森（Anderson），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1999）頁 89。

技巧的部分，可以由張我軍在〈詩體的解放〉中提到的「自然的節奏」為切入點：

反對新詩的人都說新詩沒有韻律。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形式的韻律之外還有自然的韻律——內在律。反正內在律方才是真正的韻律呢<sup>85</sup>！

從節奏的部分觀察張我軍的詩作，張我軍確實是相當成功地營造出詩作所呈現的韻律，是看以下詩作：

……  
一個 T 島的青年  
在戀他的故鄉！ …… (A)<sup>86</sup>  
在想他的愛人！ …… (B)  
他的故鄉在千里之外， …… (C)  
他常在更深夜靜之後， …… (D)  
對著月亮兒興嘆！  
…… (〈沉寂〉<sup>87</sup>)

……  
你是我僅有的知己！  
你是我永遠的伴侶！  
…… (〈對月狂歌〉<sup>88</sup>)

<sup>85</sup> 引自張我軍：〈詩體的解放〉，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46。

<sup>86</sup> 以下句型以英文字母 A、B 等標示，皆為引者所附加。

<sup>87</sup> 引自張我軍：〈沉寂〉，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30。

<sup>88</sup> 引自張我軍：〈對月狂歌〉，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31。

……

想起我兩的前途，

想起我兩為難的前途！

……（〈為難的前途〉<sup>89</sup>）

利用重複的疊句加強詩的節奏，如〈沉寂〉中 A 句與 B 句故鄉與愛人的對應，C 句與 D 句千里與夜深的「外」與「後」對應，由於疊句的使用，使得詩人的情緒渲染更強烈，這在其他作品裡也可以看見，如〈對月狂歌〉、〈為難的前途〉中亦是如此。

而在〈遊中央公園雜詩〉<sup>90</sup>中，則是將句子的重複擴大為整段的句式重複：是看其二、三、四段的句式：

二

草兒煩悶著/似乎在問我/前回那位少女/別來好嗎

三

月姊冷笑著/似乎在問我/前回那位少女/沒有伴你來嗎

四

蟲蛙們圍繞著我/熱心地奏起他們的夜曲/似乎在催我/重理舊日的夢

（〈游中央公園雜詩〉）

這樣的創作表現儼然成了張我軍慣用的技巧，利用疊句的模式還可以在〈我願〉<sup>91</sup>以及〈弱者的悲鳴中〉<sup>92</sup>反覆出現。足見這樣疊句的反覆與段落的重複，是張我軍個人詩作風格的一個特徵，也可以看見新詩在初創時期，意象的經營並未如晚近成熟時期的晦澀。其次是創作內容的掌握，也就是張我軍對於創作

<sup>89</sup> 引自張我軍：〈為難的前途〉，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45。

<sup>90</sup> 引自張我軍：〈游中央公園雜詩〉，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36~7。

<sup>91</sup> 引自張我軍：〈我願〉，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43~4。

<sup>92</sup> 引自張我軍：〈弱者的悲鳴〉，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55。

欲表達的中心思想所在。即就其詩作的題材內容作分類，由於張我軍強調創作是要具有真實情感的展現，因此其詩作也多數繞著張我軍個人真實的生命經驗敘述。故《張我軍全集》所收錄的詩作中，仍是以張我軍與其夫人羅心鄉女士的戀情為主要描寫的對象為多。

描述戀情中相思的苦悶與甜蜜的詩作諸如〈沉寂〉、〈對月狂歌〉、〈無情的雨〉<sup>93</sup>、〈游中央公園雜詩〉、〈煩悶〉<sup>94</sup>、〈我願〉、〈亂都之戀〉<sup>95</sup>、〈歌德又來勾引我苦惱〉<sup>96</sup>等詩作。

一

不願和你分別/終又難免這一別/自生以來，不知經歷了/多少的生離  
和分別/但何曾有過這麼依戀/這麼聯席的離別

二

亂哄哄的北京/依舊給漫天的灰塵籠罩著/我大清早就拿著行李/衝著  
雜踏的喧囂/冒著迷濛的灰霧/獨向將載我走的車中去

.....

七

火車漸行漸遠了/蒼鬱的北京也望不見了/啊！北京我的愛人！/此去  
萬里長途/這途中的寂寞和辛苦/叫我將向誰訴

八

你知道嗎？我的愛！/我把你的小影兒揣在懷中/正如和你並坐而抱  
擁/一站站車停時/我都把你拿在掌中/默默地向你訴說/我的離情悽  
楚！

.....

(〈亂都之戀〉)

<sup>93</sup> 引自張我軍：〈無情的雨〉，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32~5。

<sup>94</sup> 引自張我軍：〈煩悶〉，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38~9。

<sup>95</sup> 引自張我軍：〈亂都之戀〉，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46~251。

<sup>96</sup> 引自張我軍：〈歌德又來勾引我苦惱〉，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52~3。

除了描述戀情的詩作之外，張我軍詩作的另一鮮明的主題便是關於前途的關切，這一部分的詩包括了〈秋風又起了〉<sup>97</sup>、〈前途〉<sup>98</sup>、〈弱者的悲鳴〉<sup>99</sup>等諸作。

.....

三

去年的初冬/在陰沉沉的鷺江江上/一只船送了母親/回到故鄉去/一  
只船載著我/向了流浪了旅程

.....

五

如今呢？/身兒病/心兒也病/又一無所成/唉！何處是我的前程？

.....

（〈秋風又起

了〉）

詩中充斥著對前程無助的疑問，似乎也透露出當時知識份子對於現實環境的焦慮，在面臨整個大時代轉型的關鍵中，殖民地台灣的知識份子，對於茫茫未知的自身或家國前途，更是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苦悶。

尤其是當張我軍接觸了幾乎是處於相同困境的中國當代知識份子，彼此對家國的想望與期待，恰是成為當時的中國與台灣特有的時代精神標誌。因此張我軍在接收了五四追求現代精神思潮的洗禮，其創作理所當然地也展現了豐富的現代意涵。

由此可知張我軍新詩創作中的現代意識，的確是具有相當明顯的個人主義傾向，而這樣愛情至上論又是其個人主義展現的標誌，這便是張我軍詩作中現代意識意涵的一個面向。特別是，以新詩這樣的形式面貌，本身就是以一種新形式對抗舊文化形式的抵拒，可以說是一種現代意識的徹底實踐。

---

<sup>97</sup> 引自張我軍：〈秋風又起了〉，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40~1。

<sup>98</sup> 引自張我軍：〈前途〉，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42。

<sup>99</sup> 引自張我軍：〈弱者的悲鳴〉，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2000）頁 255。

## 第五節 小結：正視未能避免文學史的分岔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從前文所述可得這麼一個概觀，即台灣新文學運動是在台籍知識份子手上積極推動。推動的起因是台灣的殖民地歷史經驗，導致當時取得各方先進資訊不易，而培養了一批有能力出外遊歷的台籍青年之後，自然也將見聞傳播回台灣，亦開始懂得去思考台灣殖民地的困境。日後，於是在外的台灣青年便組織了「聲應會」、「新民會」等團體，並且發刊《台灣青年》等刊物作為啓蒙台灣人民的管道之一。

而以台灣身為殖民地之故，所有的文化運動免不了會與抵抗日本殖民政權意識放在一起討論。更因為台灣當地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告一段落，於是有進入了所謂「非武裝抗日」時期的說法，這個連結應該是可以被理解。因為有了《台灣》、《台灣民報》等機關刊物，也成了這批向外取經的台籍青年抒發己見的重要園地，包括了文化運動及文學運動的重要文章。

歸結台灣新文學作家的寫作經歷，大致上或可得到這樣的一個訊息，即殖民地的知識青年在尋求知識資源的艱難，於是在諸多作品中也可以見到。作者的寫作對象都半是以自身的經歷為主要的描寫對象，也因為經歷的過程有所不同，作品主要傳達的目的與意義也有所差異。如張我軍與賴和雖同樣為台灣新文學開創時期的指標性作家，但是因為彼此經立的差異，所書寫的作品則適時表現了他們的視野，以及他們所較為關注的議題。因此，出現第一批寫作台灣新文學作品的作家，無不以自身的遊歷、見聞作為一傳輸的書寫對象，透過作者眼睛的媒介，在台灣的人民也同樣看見離開台灣的世界，或者台灣的各個角落也呈現同樣悲慘的命運。

這一批新青年想將自身在外遊歷所吸收的新知，藉由寫作傳達出去。如追風〈她要往何處去〉，作者以留學日本的學生的自由戀愛反抗在台灣媒妁之言，而在前文已述的張我軍作品亦是如此。這一批知識青年接收了新思潮之後，反觀台灣舊有的習俗與觀念，更顯得台灣的封閉，於是作品中也宣達出這樣的訊息：即台灣不能再自我封閉、保留封建的社會制度。

而在向外發展的過程，也深刻地感受到台灣的孤立性。這些台籍青年想要靠著自己的力量進入文壇，無論是向中國或日本獲得認同的機會相對顯得渺茫，較為積極的則是持續寫作，期許自己的筆或可以實踐自身的理念，或進行知識的宣傳，以作為一啓發蒙昧的知識份子，再則即在身處殖民地地上表示認同的焦慮，與無所適從，或以遁入純文學的空間耗時進行美學的經營。

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就書寫的語言使用而言，不外乎日文與中文兩種。而中文的寫作又可分為相承中國白話文運動以來的推動的白話文寫作，如張我軍、無知等，另一部份的中文寫作則是夾雜了台灣話文的使用，即以中文寫作的同時，也以漢字表音出台灣當地所使用的閩南語，如賴和、楊守愚等，以日文寫作者則有翁鬧、楊逵等。<sup>100</sup>

從語言的使用與堅持，不難發現這也是台灣新文學運動論爭的原因之一，以至鄉土文學的論爭都在在說明了台灣文學的內部撕裂的現象。

日據時期台灣小說作者，由於每位作者之出身、氣質、性格、世界觀都不雷同，因此思想、意識型態自然各異其趣了……<sup>101</sup>

許俊雅先生於此處也點出了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創作諸像紛呈之因，也許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另一層身份認同的焦慮，在書寫與思考之間所使用的語言，恰展現出自我內在存有的「概念」。而這個「概念」所象徵的意義是殖民地的人民所接收資訊的管道，已經進入了殖民帝國的國家體系之下，或者保有不同文同種的民族區隔。這也說明了殖民地人民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上，無論是否自覺都會面臨抉擇上的疑問，到底是要保有漢人的文化血統？抑或以血換血成

<sup>100</sup> 相信這和殖民統治時間的長短有絕對的關係，也就是殖民統治的時間長短，決定了台灣人民口頭與書寫的語言。如賴和作品發表於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初期，即二〇年代中、後期，姑且不論賴和終生以漢文寫作的堅持，在新文學運動發展之初，台灣作家尚未出現流利日文的使用者，而至三〇年代中、後期，則有大量且可觀的台人日文作品出現，甚至出現呂赫若這等優秀日文使用者的專業作家。可見期間殖民地因為殖民者統治的時間，而產生殖民地語言使用的世代差異。

<sup>101</sup> 參見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民】84）頁329。

爲天皇的子民？<sup>102</sup>

而在殖民地政府全面「皇民化」之前，台灣在一九三一年接續「鄉土文學」論戰的「台灣話文」論爭也讓台灣內部早就存在語言使用的分歧。如賴和停止創作的的原因便在於困擾於語言的使用。<sup>103</sup>那麼這個語言的討論就不止於殖民者的官方語言，那是台灣內部的語言使用的論爭；雖然賴和並未如同張我軍大張旗鼓地表明，有意識移植中國白話文至台灣，而是融以在地的台灣話文的漢文寫作，但因為台灣內部對語言使用的立場差異，導致在「皇民化」之前就有創作者噤聲，這場台灣話文論爭的發生是否也宣告了這一時代所需要跨越的語言問題恐怕是比戰後「跨越語言一代」還要寬且深。

無論是對民族的疑惑、對語言使用的困擾，早在分歧的「台灣文學史」書寫之前。因此，要解決台灣文學史書寫的分歧，或者該從文本中徹底檢視日據時期的知識份子們所追求的朝聖之道，或可理解當日的論爭何以不斷重複於今日，甚是更爲凶猛。也得以正視台灣文學的分歧，而非以意識型態的神主牌左右台灣文學主體性的建構。因為書寫文學史的過程，在某一個程度上是檢視殖民地台灣歷史的創傷，也因為這個歷史經驗，使得所有的論爭成了一道道傷口，隨著時間的推衍，傷口仍然未曾癒合。即時至今日文學史各自表（撰）述的立場，則將是無可避免文學史自內部分裂的癥狀，這將預告即使是動用國家機器介入論述也無能揭示文學創作的藝術檢選原則，暴力徒然形成，文學則將更爲隱晦。

---

<sup>102</sup> 摻入語言的問題之後，將會使得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論爭更爲具體，只是要考慮的是，當時的寫作者所選擇的語言是否出於自我想像的認同，抑或者是經過殖民教育的移植，從強迫變成習慣，甚至是唯一的技能？如同安德森所言，「沒有任何其他事物能夠像語言一樣有效地在情感上將我們和死者聯繫起來。」見安德森，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1999）頁 157。只是習慣了日語的台灣人，閱讀著和台灣慣有習俗不同的日本傳統，而觀看中國的一切，基本的如文字，竟是陌生的了，那究竟是如何的一種身份處境的尷尬？

<sup>103</sup> 參見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民】82）

### 第三章 拓殖土地而佔領創傷：二〇年代殖民政權下民族運動中 （非）集體想像「民族」

#### 第一節 殖民地反抗力量的培養

殖民地經驗是台灣歷史悲傷的印記，隨著印記的銘刻，台灣的主體在亟欲被「正名」的各種運動下，都是一種隱匿傷痛或者是消去印記的必要措施。在現今的政治角力進入台灣「正名」的板塊前，「正名」的客觀說法是爲了提示存在，而存在的提示源自於主體的被抑制。

尤其當政治勢力以絕對的執政權覆蓋原有的存在體，社會的架構也因此進入轉變，而這個轉變是爲了符合執政強勢的要求，於是做權力的重新分發。原有的勢力族群在被瓜分掉利益時，自然會形成另一組抗衡的組織，這種抗衡無論是殖民者強勢的統治或者民主政治的權力輪替，都會產生的集團效應。如日據初期成立的「台灣共和國」，及大小的武裝抗爭都是最顯明的例子，爲了抗拒外來勢力破壞原本已穩固的社會架構，至於後期的議會設置等請願運動，則是更集中式的上層階級集團運作。如葉榮鐘的第三文學論，顯然是此狀況下進一步思考後得到的靈感。

台灣的新文學運動更是上層階級的次一級的運作形式，藉由台灣新文學的運動，累積台灣民眾作爲一種對殖民體制認知的「印象覺醒」。在台灣在地與帝國殖民的抗衡認知上，這一批不管是新興的知識階層或者是在殖民體制下既得利益者（即殖民政權藉由釋放少許權益給殖民地民眾的有產階級，作爲更爲鞏固自身勢力的交換者），相對於殖民者的外來勢力，在地民眾應當更認同同樣爲在地的上層階級集團。儘管一九二七年的文協分裂就是凸顯這一集團因內部利益衝突而裂解的結果，但是回到對抗殖民勢力的培養，塑造台灣在地的自我認同，應該是凝結被強大殖民武力壓制下的唯一可能。

在台灣新文學推展的同時，台灣本地人士的政治運動也一併運作著，這都可看成上述累積台灣民眾全面「印象覺醒」的能量。也就是，在金字塔頂端的殖民者是被次級的台灣本地菁英亟欲連結更廣大底層的台灣民眾抵抗的對象，所謂「印象覺醒」則是顧慮到底層的民眾究竟有多少餘力去閱讀知識份子的主

張，不管是文學上的或是政治上的，因為在維持基本的生活都可能產生嚴重困難的民眾，又如何有餘力從高達九成以上的文盲中晉升「閱讀階級」？更遑論要從閱讀當中產生更大的反抗意識。但是當運動成爲一種氣氛，而且底層的民眾更是被絕對壓迫的一群，藉由文化運動的推展，這些底層民眾對抗上層階級的敏感度可能更是絕對的。儘管行動上或許不如上層階級的組織化，但是可以說在身爲殖民地民眾的自覺上是漸漸拓展爲橫的結合全面性的效果，而且也成了結合次級階層本土菁英的縱的聯合對抗頂層殖民者的力量。

## 第二節 侵亞入歐的殖民帝國

在一九一五年爆發西來庵事件之後，台灣就沒有更具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因此一九一五年可以說是武裝抗日的年代座標；日本領有台灣之後，爲了應付大大小小不斷的抗日行動，在軍事支出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在日本國內甚至有主張將台灣賤賣他國的意見。這其實也顯現出，作爲一個晉身現代國家行列的日本，還沒有辦法扮演好一個以具有各方先進文明優勢的殖民帝國。作爲一個亟欲「脫亞入歐」的現代國家，最佳的證明是向亞洲尤其是中國的侵略，並且在一八九五年對中國（清朝）和一九零五對俄國的戰勝中得到戰爭的甜頭，以致於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成了一次世界大戰中與其欲齊頭並進的各大殖民國互別苗頭的企圖。

相對於日本的明治維新的中國清朝末年也亟欲振作，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的戊戌變法可以說是清朝維新的最後機會，然而百日的光景也可以說是短暫的回光返照罷了。而明治維新的成功也揭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層面，即日本天皇勢力的穩固，相對使得日本在進入現代化的進程中，即使遭遇到阻礙也不至於全盤失敗，造成整個國家的失序。

在一個國家和社會內部是否存在一個較為穩定的、長期得以延續的菁英群體，以及這個群體與其他非菁英群體之間的關係狀態，是結

構與制度層面中應該引起注意的因素。<sup>104</sup>

菁英階級的確深刻影響著一個社會的結構穩定，上述情形是指在日本近代維新的過程中，武士這個階級所選擇的位置。相對於日本，中國清朝的維新不但要面對舊有價值與現代價值的衝突，更大的挑戰是光緒皇帝與象徵舊有保守勢力的權力鬥爭，儘管有康有為、梁啟超等受過西式教育新興知識階層對變法維新的企圖，也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但是過不了政治鬥爭的殘酷，也讓整個中國後來的命運改變。

等不及官方主導維新變革的結果時，隨著一八九四年「興中會」的成立孫文領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口號下，展開了中國的革命行動，這時候的「族群」意識已經被提出來作為階級結構改變的重要元素。而「當大眾的和革命的民族主義取代王朝制度帝國的民族主義而成為主流之際，正在轉型的帝國傳統與一種世界主義的（康有為、梁啟超）和國際主義的（孫文、毛澤東）取向的結合，構成了近代中國民族建設的最為重要的特徵。」<sup>105</sup> 隨著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的成立，舊有價值於此是一次重大結構變更，於是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所提倡的君主立憲這時反倒成了「保皇派」？但若是簡化為「尊皇攘夷」論那顯然成為汪暉所說的「缺乏國際面向」，或許這一批同時受過中西教育的知識份子更能察覺革命所帶給中國的災難吧。

要成為一個民族，國家所屬成員就必須積極地要求這種共同屬性，或者作為一種願望至少要被意識到。換言之，一定集團的成員，作為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特定民族，意識到相互之間的共同特性，並多少具有要求守護一體性的願望，只有這樣，才能說這裡有「民族」的存在。……民族意識只要它是自覺性的，早晚它就凝聚成政治上的一體意識。所謂近代的民族國家，無疑就是這種意義上的民族意

<sup>104</sup> 引自李文：《武士階級與日本的近代化》（石家莊：河北人民，2003）頁 357。

<sup>105</sup> 參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北京：三聯，2004）頁 736。

識。……民族主義恰恰是近代國家作為近代國家而存立所不可區少的精神推動力量。<sup>106</sup>

中國在民族意識群體勢力的炒作下，清朝政府的執政權再次受到檢驗，殘酷一點的說，中國清朝屢屢失去維新的機會，更可能是失去政權的主要原因。如果寬容的以結果論，清朝在康、雍、乾的國力或許可以度過現代化的陣痛期，但是在中國天子之前所有的現代文明都不能與天威有所抵觸之下，而有天主教堂成了「天后宮」的佚史，對於英國「交使通商」的要求也轉為鎖國政策了。時至道光朝，清朝國力已不再足以自我封閉的所國政策抵擋列強的索求，吃上鴉片戰爭的大敗仗，又無能在《南京條約》中學取教訓，才在光緒朝面臨了維新與內部集團的權力架空的窘境。

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與歐洲締結的各項條約不僅是對中國的主權和權力的侵犯，而且還是對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及其規範的無情打擊。<sup>107</sup>

而發生在亞洲的各處戰爭無疑不是殖民帝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大戰，亞洲成為必爭之地的戰場，中國甚至必須被兩個以上的他國作為利益分割的籌碼，而毫無置喙的餘地。其實以亞洲國家之列要進入西方的現代化行列，勢必要面對轉型的陣痛期，尤其是從封建社會要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所要面臨的價值觀、世界觀的秩序重建。如果沒有一個權力核心穩定世局，那便會成為自我與外在的嚴重抵觸，或者也讓固有權力階級面對改變有所疑慮，或者是源自於中國的士族對清帝（依然是非我族類作崇？）沒有日本幕藩對天皇的信任？還是對於中國不再是天下的普遍性價值的動搖，使得士族在國家意識重構的同時，發覺自身失去安定社會的核心價值，在傳統與現代中難以取得平衡？

<sup>106</sup> 引自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聯，2000）頁 268~269。

<sup>107</sup> 引自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北京：三聯，2004）頁 704。

……即使面對最為殘暴的君主，貴族通常也不會淪落為沒有起碼尊嚴的奴才，而君主通常也不會肆無忌憚地對貴族為所欲為。貴族與其他階層間嚴明界限的保持本身就是對諸階級特有活動空間的一種規定。<sup>108</sup>

又或者該這麼解釋，在幕府與諸藩勢力對抗之下，天皇成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神主牌，間接成了穩定日本的力量，甚至在大政奉還的默契中加速日本近代化的過程。而中國的知識份子則在甲午一敗之後才喚醒四千餘年大夢，始有康有為上書變法，然而光緒帝「上制於西后，下壅於大臣，不能有其權，不能行其志」，<sup>109</sup>相較於有下層武士擁護的明治維新，戊戌維新中彼此政治角力更是箝制了維新的推動，光緒成了執政的傀儡，無能應付接踵而至的政治鬥爭。而多數的士族並不是維新運動的主力，尤其經由科舉拔選之後的既得利益者，更無法贊同近代國家如選舉等體制的形成，使得中國維新成了唱高調的理想主義。

相反地日本天皇被賦予了「一君萬民」的期待，明治維新的成功乃聚集了低階武士與廣大平民的信仰；事實上受到革新最大衝擊的便是「士族」階層，隨著奉祿制度的撤廢也失去了封建制度的特權，在天皇政府以武力鎮壓、征討之下，進一步鞏固了日本近代國家體制的形成，形成以天皇為父、人民為子血緣共同體的國家體制。

士族是國家文武官僚群唯一的供給源。新軍的建設（徵兵制）、新教育政策（學制）的展開都靠士族來推行；農民暴動的鎮壓、士族叛亂的鎮壓也都依靠士族之力……同時，多多少少也是伴隨剝奪士族的特權而完成的。……（士族）蛻變、犧牲，以作為國家存在與完

---

<sup>108</sup> 引自李文：《武士階級與日本的近代化》（石家莊：河北人民，2003）頁357。

<sup>109</sup> 參見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台北：中華，【民】54）

成機能所不可或缺的元素……<sup>110</sup>

國家體制的轉變與形成絕對需要度過非常時期，如封建制度既得利益者的犧牲、幕府與諸藩的流血鬥爭等，因此從德川幕府到明治維新亦非一蹴可及的狀況下；鑑於中國鴉片戰爭的失敗，面臨美軍培里（Mathew C. Perry）在 1853 年帶著「致日皇書」進入三浦半島的「黑船」，要求日本開關通商，面臨美方的船堅砲利，幕府也深怕拒絕開關會導致戰爭，不得已只好簽訂〈日美親善條約〉給予最惠國待遇，結束二百餘年來的鎖國政策。

此時日本國內爲了抵抗列強長驅直入的叩關也開始醞釀一股尊王攘夷的勢力，<sup>111</sup>其間歷經了「安政大獄」、<sup>112</sup>二次「長州戰役」<sup>113</sup>等政變事件，1867 年長州藩、薩摩藩與安藝藩形成倒幕同盟，並得到朝廷討幕密旨，一方土佐藩則是向幕府提出〈關於奉還大政的建議書〉，德川幕府知道情勢不利，爲了避免與倒幕同盟正面交戰，始上奏「大政奉還」。<sup>114</sup>

因此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是因爲外來列強勢力的壓迫，導致國內危機意識

---

<sup>110</sup> 引自原口清，李永熾譯：《日本近代國家之形成》（台北：水牛，【民】75）頁 242。

<sup>111</sup> 與「尊王攘夷」相對立的另一股勢力的是「公武合體」，即幕府爲了避免自身勢力的削減，採取主張公（朝廷）武（幕府）彼此合作，藉由天皇的權威以號令諸藩，薩摩藩也因為與長州藩之間彼此不信任，先是與幕府合作繼而轉向倒幕，此期可說是近代日本國家形成前諸多政治勢力角力的重要過程。參見趙建民、劉予葦：《日本通史》（上海：復旦大學，1989）

<sup>112</sup> 所謂「安政大獄」指的是 1853 年培里率黑船叩關日本之後，德川幕府首席老中阿部正弘除了向朝廷稟報外，亦徵詢諸侯意見，幕府此舉無異招來諸侯的干政，且幕府內部也因將軍立嗣問題，產生革新的一橋派與守舊的紀州派內鬥，1858 年井伊直弼擁立德川慶福爲將軍，並於翌年將賴三樹三郎、吉田松陰、橋本左內等「尊王攘夷」派等五十餘人予以處死、禁錮或流放，時值安政年間，故稱「安政大獄」。參見林明德：《日本史》（台北：三民，2003）、鄭樑生：《日本史：現代化的東方文明國家》（台北：三民，2004）

<sup>113</sup> 1863 年長州藩因推動尊王攘夷運動，藉由控制下關海峽而砲轟經過的美、法、荷的船隻，各國亦予以反擊，同時薩摩藩亦在鹿兒島向英軍開戰，在攘夷派與倒幕的夾擊下，聯合長州藩的三條實美等公卿則被不願倒幕的朝廷逐於長州。1864 年長州藩以要求革新之名，進軍京都發動「禁門之變」，失敗之後幕府趁機反擊，長州藩乃受幕府及英、美、法、荷四國砲擊，實力大傷且向幕府屈服。幕府於是二次征討長州，但實力已不如前，且諸藩意識到彼此是唇齒相依的裙帶關係，深怕下一個被滅的即是自己，而英國見縫插針慫恿長州藩、薩摩藩接受近代化的武器與船艦等，二藩乃轉攘夷爲倒幕，幕府此役可謂徹底失敗，也是導向滅亡之途。參見趙建民、劉予葦：《日本通史》（上海：復旦大學，1989）、林明德：《日本史》（台北：三民，2003）、鄭樑生：《日本史：現代化的東方文明國家》（台北：三民，2004）

<sup>114</sup> 天皇政府的成立並不意味著德川慶喜完全的退出執政，1868 年德川慶喜則以清君側的名義欲征討薩摩藩，而倒幕的諸藩亦以武力對抗欲捲土重來的幕府，展開一場激戰，史稱「戊辰戰爭」。幕府至此大勢已去，投機的大名則紛紛「勤王」。而德川幕府只得交出江戶城，保存德川家族命脈。參見趙建民、劉予葦：《日本通史》（上海：復旦大學，1989）

的產生，必須產生一個絕對的領導中心，加上國內幕府與諸藩的矛盾，天皇成了各股勢力不願彼此臣服的合作對象。在攘夷意志的貫徹之下，尊王成了鞏固權力的核心，於是幕府的勢力與天皇的權威日漸形成此消彼長的狀況，一步步掌握執政的契機，更在一次次的內亂中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合理性，並確立了日本近代君主立憲制度，成功執行了明治維新運動。

尤其出兵朝鮮迫使簽訂〈日朝修好條規〉，使得原本與朝鮮同為中國臣屬之國的日本，變成與中國站在對等狀態的可能，繼而聲稱琉球為其藩屬終止對清朝朝貢等政治操作下，可說是達到宣揚國威的成效，並且進一步壓抑住日本國內的反動聲浪，食髓知味下擴大了日後對外出兵的企圖。

弭平內戰以及出兵他國、擺脫列強侵略危機、頒行《大日本帝國憲法》等，使種種伴隨維新運動而來的政策或政治操作，使得日本走向富強、近代帝國的行列，也一再確認了日本天皇獨尊的地位。而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可以從諸多方面來觀察，從戰敗後的日軍戰俘幾乎不曾毀謗天皇的跡象來看，日本人對天皇絕對不只是單純的信任，或者是軍國主義崇敬的領袖般。從西方人類學家的角度觀察，潘乃德（R. Benedict）認為可以從日本人對天皇態度間發現，日本人的反物質主義傾向，如戰爭期間並不主動、積極救援傷兵，且被灌輸「死亡乃是精神的勝利」，其最極端的發展就是不降服政策。「在北緬甸戰役中，受俘者與戰亡者的比例為 1:120。」<sup>115</sup>由此可見日本人對天皇的忠誠，不僅止於表面的服從，而是由內而外的忠誠與信仰。

雖然日本近代推行了西化措施，它仍然是個貴族社會。人們在每次招呼、每次接觸中，都必須表現出相關社會距離的種類及程度。……支配這些行為的有詳細的規則和慣例；人們不但要知道該向誰鞠躬，還需要知道行禮時彎身的程度如何。<sup>116</sup>

<sup>115</sup> 參見潘乃德（Benedic, R.），黃道琳譯：《菊花與劍：日本民族的文化模式》（台北：桂冠，2002）頁 34。

<sup>116</sup> 引自潘乃德（Benedic, R.），黃道琳譯：《菊花與劍：日本民族的文化模式》（台北：桂冠，2002）頁 42。

而日本的多層社會階級制度正說明了，最底層的人民如何服從於封建領主的勢力，又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絕對地效忠天皇，從賤民到天皇都有各自必須遵守的階級位置，這樣的秩序解釋了日本人在出兵他國的同時何以「大東亞共榮圈」的姿態解放各國忽視侵略的本質。

「大東亞共榮圈」不僅摧毀了孫文當年提出的「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的夢想，而且也撕碎了日本知識份子的連帶幻覺。儘管這時的亞細亞主義調子最響，但是，它已經不再是一種理念和思想，而僅僅是一種意識型態叫囂，因為它無法面對和處理侵略亞洲鄰國的事實。<sup>117</sup>

以中國面對列強強掠行爲的弱勢位置來看，改變自身面對西方的眼光是必須的，勢必不能再以文明古國的老大心態故步自封，在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則不得被迫面對自我的存在定位。誠如汪暉所言，「中國不再是天下，而是『列國』中的一國，這是康有爲對民族—國家時代的概括……隨著帝國成爲世界資本主義的邊緣區域，儒學『萬世法』同時淪爲一種不合時宜的『地方性知識』。」<sup>118</sup>於是徹底地顛覆傳統價值的核心成了解決困境的快刀，卻忽略了重新建立價值觀的可行性與困難度那勢必是另一波權力轉移的鬥爭內耗。而對台灣這個「地方」而言，淪落爲被割讓的殖民地有什麼力量向中國或日本拒絕，就算中國因爲甲午戰爭而引起士大夫的危機意識，那也是因爲深怕中國不再是中國，台灣依然是那個蕞爾小島的「地方」。

反觀日本，雖然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期的日本還沒有準備好當一個殖民帝國，但卻已經展現了現代化的初步成果，這無疑大大鼓勵了日本對現代化的信

---

<sup>117</sup> 引自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收錄於《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2001）頁42～43。

<sup>118</sup> 參見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北京：三聯，2004）頁741。

仰。因此，戰爭是爲了要幫助整個亞洲提升，經由戰爭建立起日本統馭的國際組織，取代中國在亞洲長據的地位。

中日衝突始於日本對朝鮮的侵略和中國做為宗主國對朝鮮的行使保護權的衝突，從而戰爭的失敗不僅打擊了中國本身，而且也破壞了原有的朝貢體系網絡。……對於清朝而言，戰爭本身是維持朝貢體系的必要步驟。……中日戰爭（的結果）是整個朝貢體系的象徵性能否繼續維持的問題。<sup>119</sup>

殖民地的取得雖然具有此層象徵性的意義，相對的在殖民地管理上首先面對的就是龐大的軍事支出。單是一八九六年台灣軍費支出額就佔了當時日本國家預算的十分之一以上，<sup>120</sup>這對日本政府不啻是一項非常沈重的負荷，加上台灣前三任總督亦皆是軍人出身，來台工作還是以武力鎮壓、接收台灣爲主。因此，一八九八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後，<sup>121</sup>與其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聯手提出解決台灣財政的策略，首先便是要使台灣財政獨立，降低日本本國的負擔。尤其是日本國內已經出現主張以一億元的價格出售台灣給外國或中國的聲音。

122

於是，從一八九七年度開始，設置台灣特別會計制度，軍費規劃日本（一般會計）本國負擔，同時則銳意經營特別會計的獨立；結果，成績顯著，到了一九〇四年度即毋須國庫補助金。<sup>123</sup>

<sup>119</sup> 引自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北京：三聯，2004）頁705。

<sup>120</sup> 參見森久男，洪尊元譯：〈台灣總督府糖業保護政策之發展〉，收入黃富三、曹永和：《台灣史論叢·第一輯》（台北：眾文，【69】）

<sup>121</sup> 日本派駐殖民地台灣的總督前七任皆爲現役軍事將領，直至一九一九年田健治郎始爲文官總督。

<sup>122</sup> 參見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2003）頁8。

<sup>123</sup> 引自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2003）頁161。

兒玉、後藤乃是以土地調查、專賣、公債等政策發展台灣財政，主要為實施節約行政開銷、鴉片等公賣<sup>124</sup>加上公債並開發交通事業，如興建鐵路等用以振興台灣產業等台灣財政政策也造成台灣產業的高度發達，也就是矢內原忠雄說的「台灣資本主義化」。而「台灣資本主義的問題，不外乎台灣人的資本主義的階級化問題。」因為根據矢內原忠雄的說法是「當時的日本還不是高度發展階段的獨佔資本主義國，即還未具備作為金融資本主義國之帝國主義實行者的實質。」

在中日戰爭當時，日本雖然已有近代經濟機構的型態，但金本位制度尚未實行，資本亦欠充足，故其殖民地的發展，是靠政府著意的計畫及深厚的保護與鼓勵，逐漸推行。當時英德各國的殖民地獲得，是獨佔資本的積極活動，是依「特許殖民會社」（這是資本家的活動）的型態，引導政府、發動政府的；以與日本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sup>125</sup>

為了讓日本晉身帝國行列，台灣這塊殖民地成了一種必須要的象徵。如果說台灣的現代是因為時為殖民地之故，而被迫成為向殖民母國的利益輸送者，是在一種促進經濟利益下而進入所謂遲到的現代，那麼整個亞洲在未有一個與歐洲相對應進入現代的歷程上也可以說是遲到的了。相較於歐洲所歷經的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等大事件，亞洲相對的是表面的平靜，甚至似乎從未思考過作為世界的一部份，亞洲究竟在什麼位置？而日本是代表著「亞洲一體」的一份子，擺脫中國率先成為亞洲的領導？還是根本就毋須要在意亞洲，如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

---

<sup>124</sup> 其他如樟腦的公賣，使得台灣人民可以獲得利益的產業也被剝奪，而公賣事業卻乘了總督府歲入的最大來源。「此等歲入形式上雖為『官營事業收入』，但鴉片收入卻是變相的『輸入稅』，樟腦收入是變相的『輸出稅』……合計原本的『關歲』，在甲午戰爭至日俄戰爭這一段期間，約十分之四的財源，乃得自外國貿易」參見森久男，洪尊元譯：〈台灣總督府糖業保護政策之發展〉，收入黃富三、曹永和：《台灣史論叢·第一輯》（台北：眾文，【69】）

<sup>125</sup> 引自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2003）頁9。

在面對西方殖民帝國開始把手深入亞洲的時候，錯失與之齊頭並進機會的亞洲被迫門戶大開，尤其是中國根本完全無法應付西方列強的窘況，提供了長久以來鄰近的臣屬國激烈的思考。尤其由「脫亞入歐」所引發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命題，更使得擁有殖民地台灣成了日本晉升帝國的必然之道，而不再只是「被輕蔑的帝國」。

### 第三節 殖民地有力者與無力者的角力

爲了讓日本保有晉身現代帝國行列的意義，和繼續南侵的戰略地位，擺脫台灣龐大的財政負擔是當務之急，於是在日本統治之下，爲了從台灣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總督府極盡可能進行所謂「資本主義化」。雖然帳面上看起來，台灣社會邁向資本主義的結果是增加的大量的歲收，但並不表示專制的經濟政策整體改善台灣人民的生活。

「殖民地，被統治者在經濟上不由分說地被捲入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之中」，<sup>126</sup>於是政治上的從屬使得進入全球資本體系的殖民地，反而生活在更爲壓迫的經濟壓力之下，而且由於歲入的來源來自官有財產及專賣事業的收入，對人民而言，並不是因爲收入增多而繳交稅收，反而在土地調查之後，繳交更多的地稅，更多時候是小租戶向大租戶贖地所必要付出的代價。

台灣地稅，自 1896 年之 75 萬元，經土地調查，改訂科則後增收至 290 餘萬元，約增三倍以上，1919 年重訂稅率，增收至 510 萬元，較前期約增 70%，1935 年二度變更稅率，增收至 1250 萬元，較前期約增 60%。<sup>127</sup>

多數延續自清朝封建時期便具有的地主身份，或具有貢生以上科名等台籍仕紳。在馬關條約第五條中註明，中、日兩國換文之後的兩年之內，台人可以

---

<sup>126</sup> 參見駒込武：〈臺灣的「殖民地近代性」〉，收入於若林正文、吳密察：《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2004）頁 161~170。

<sup>127</sup> 引自黃通、張宗漢、李昌權編著：《日據時代之台灣財政》（台北：聯經，【民】76）頁 28。

自由選擇去留的規定下，內渡者不在少數。但在在台資產或者轉移條件困難牽制之下，加上其時殖民統治者也希望倚重台籍仕紳的領導，穩定殖民地的社會秩序，而有成立如「台灣揚文會」網羅台籍仕紳等組織，或給予公賣事業的批售權、或給予地方「有力人士」參與政治的空間，如街庄區長等基層行政工作的交付，台籍仕紳保有了其經濟條件的穩固，和上層統治者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曖昧。但也由於對於殖民政權的不信任或持觀望的態度，這個時期的菁英階層的也產生了流動的現象。

各地出面向日軍表示順從的大多是留台的士紳，雖然其均是貢生以下的士紳，惟顯示地方領導權仍掌握在士紳手中。不過，無可否認的，由於原居主要領導地位的上層士紳已相繼內渡或退隱，因此每產生由次級領導人的下層士紳接替領導權的現象。<sup>128</sup>

主要的上層階級移往大陸後，次一級的領導上移，無論如何，沒有能力內渡者大多數仍是平民百姓，隨著日治經濟的壟斷與壓榨政策實施下，成為殖民社會最底層的階級。在土地調查之後，台灣地主仍保有他們的土地，但是持有的水田卻呈現零散化的情形，<sup>129</sup>而「製糖會社的一再設法擴張所有地，故隨資本主義的發展，一面是土地集中與農民無產化的程度日益加甚，同時是耕地支配權愈被擁有優越資本粒的日本資本家所侵蝕。」<sup>130</sup>

農民不僅要面對最上層的殖民統治，還要接受地主的剝削，因此地主把稅賦轉嫁給小租戶的農民，則農民幾乎沒有反抗的空間，也就愈趨近無產化。殖民政府為了穩定殖民地的社會結構，也就容許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租耕關係，甚至在農民付不出租穀時以公權力介入，以查封農民的財產作為抵租之用。

像是楊守愚在〈凶年不免死亡〉中所描述的，農民向地主贖地耕作，租穀

---

<sup>128</sup> 引自吳文星：《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民】81）頁50。

<sup>129</sup> 參見柯志明：〈米糖體制的危機與本地階級結構的再整編〉，收入於《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2003）頁161～220。

<sup>130</sup> 參見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2003）頁30。

卻不可能因為凶年而減租，付不出租穀不但無法繼續耕種，還要面臨僅剩的「破爛傢私」被查封的命運，向地主求饒只是換得更多的嘲弄罷了。

「惡狠狠地叱道：『凶年！哼！凶年！年凶了，你們知道要找我減租，試問！年豐了，又有誰肯昇租給我呢？人家說：賺的賺去食，損的損會社。就是你們這一班的人。你也該知道，我們有了租，官廳裏是要稅金的……你還有一絲天良？！』」<sup>131</sup>

地主不但不會同情佃戶，甚至還教訓起佃戶「沒天良」，佃戶也只能在小說家「凶年不免死亡」的諷刺中安靜地死去，活著的人尚且無法大聲哭泣，繼續在不公義的世界尋求生存的機會。這種地主聯合官廳欺壓農民的事實，在諸多日治時期小說家對台灣農民的描述中是很常見的，而在賴和的〈一桿稱仔〉、〈豐作〉等小說中也描寫出農民悲慘的境遇，〈一桿稱仔〉的主人公秦得參的父親曾經贖得幾畝田地耕作，秦父死了之後地主爲了「多得幾斗租穀，就轉贖給別人」，「業主們若自己有利益，那管到農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會社贖去了」。<sup>132</sup>又由於日本砂糖消費量爲四百萬擔，其生產額卻僅有八十萬擔，領有殖民地台灣之後便積極實行獎勵種植甘蔗，除了在一九〇〇年成立第一家台灣製糖株式會社，<sup>133</sup>總督府並且擔保製糖會社的投資報酬率，提供投資資本五年 6% 的利息貼補，<sup>134</sup>在小說〈豐作〉中便是表達了農民被製糖會社強制插蔗，<sup>135</sup>賣力農作也換得豐

<sup>131</sup> 引自楊守愚：〈凶年不免死亡〉，《台灣民報》（二五七～二五九號，1929年4月21日、28、5月5日）。本文所引《台灣民報》皆爲婁子匡景印中國期刊五十種之復刻本（台北：東方書局，1973），下同則不再另註，僅註明《台灣民報》期數及日期。

<sup>132</sup> 參見賴和：〈一桿稱仔〉，《台灣民報》第九十二、九十三號，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二十一日。

<sup>133</sup> 參見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2003）頁 243。

<sup>134</sup> 參見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2003）頁 68。

<sup>135</sup> 「從殖民地的經濟角度講，有關初級農產品專業化生產的另一個重要後果是：在許多殖民地內，那些用於出口的新品經濟作物常常取代了以滿足當地消費爲主要目的的糧食和其他作物的生產，從而影響到當地人們的實際生活水準。」參見高岱、鄭家馨：《殖民主義史·總論卷》（北京：北京大學，2003）頁 238～239。這也可說明了何以台灣會出現「米糖相剋」的現象，「糖業的利潤建立在米作部門的相對落後以及不利的交易條件上。」參見參見柯志明：〈米糖

收，但農民卻一點利益也無法獲得。

添福兄聽著會社新定的採伐規則，也真不平，但是他卻還自信他的蔗種去好，農會的技手、會社的技師，都講他會得到獎勵金，假使被會社怎樣扣除，當然不會扣至十八萬以下，所以……大家要去包圍會社的時，他也不敢去參加，他恐驚因這層事，叛逆會社，得獎勵金的資格會被取消……<sup>136</sup>

但是添福兄並沒有因為不惹事就可以得到獎勵的待遇，<sup>137</sup>儘管規定已經不符合公平原則，會社竟然還在磅臺上動手腳，三個成年人的重量竟然只被稱二十七斤，而蔗農們的甘蔗更不可能達到獎勵的標準了，拿了會社收購的蔗金，還去租金、米店賒帳、肥料等費用，所謂的豐作也只是會社的豐收罷了，蔗農不但沒有得到工錢，還要負債。又如蔡秋桐〈新興的悲哀〉中亦對此有所著墨，拓殖會社的土地過手給在本地人社長後，在宣示釋出土地引人上門收購後，但卻反而與日本大人的勾結，使墾地者吃了大虧。

「T鄉是將來S會社第四工場建設有力的候補地，拓殖會社獻身的，願將自己的所有地，分讓給一般農民，組織自作農組合【合作社】」……T鄉的全耕地，大部分是拓殖會社的所有地，T鄉的農民，當然也是拓殖會社的佃人了。……大老這一行同志來到，就卜地於T鄉東方K組合監視所附近，睽來拓殖會社一大塊土地……「……一切的一切，唉，上當了，無一不是資本家的騙局……」<sup>138</sup>

---

相剋》，收入《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2003）頁160。

<sup>136</sup> 引自賴和：〈豐作〉，《台灣新民報》第三九六、三九七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九日。

<sup>137</sup> 製糖會社是由預告價格、滑準貼補金（sliding scale price）、生產獎勵金三者組合成向蔗農收購甘蔗的價格，貼補金和生產獎勵金可以督促蔗農耕作，但也可以輕易取消，降低會社收購成本。參見柯志明：〈糖業資本與台灣農民〉，收入《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2003）頁83~127。

<sup>138</sup> 引自蔡秋桐：〈新興的悲哀〉，《台灣新民報》第三八七、三八八、三八九號，一九三一年十月廿四日、卅一日、十一月七日。

賤地的林大老因為資本家和大人的勾結，使土地的新興計畫成了一樁騙局，也可見某部分的資本家為了維持自己的家力會選擇與統治勢力作若干的妥協、結盟，而沒有辦法向上層者做利益疏通者，只能做一個利益輸送下的犧牲者。而被犧牲者階層更是多達台灣人口比例的七成以上，詳見下表統計。

表格一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台灣人與日本人的職業分佈表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警察局沿革誌》<sup>139</sup>）

項目（職業）	本島人（台灣人）		內地人（日本人）	
	人數（千人單位）	%	人數（千人單位）	%
農業	1191.6	71.7	4.4	4.9
水產業	26.8	1.6	1.6	1.8
礦業	18.3	1.1	0.4	0.5
工業	125.8	7.6	14.7	16.0
商業	150.9	9.1	18.1	20.0
交通業	48.6	2.9	9.0	10.0
公務自由業	37.4	2.3	37.6	41.5
幫傭	8.0	0.5	1.5	1.7
其他	59.9	3.2	2.9	3.2

從職業分佈統治來觀察，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民儘管是處於進入資本社會的階段，但絕大多數的人民依然是農工階級，因為所謂的經濟現代化更是加強了台灣農工飽受資本家的剝削。也因此使已失去武裝抗日條件的台灣人民加以急遽投入非武裝抗日的行動，這股聯合廣大底層的平民力量在台籍菁英領導的組織中，開始選擇聚集的團體，因為階級的不同，以致於在非武裝抗日運動中，

<sup>139</sup> 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1202～1203。

會有橫的連結與縱的連結的分別。

就葉榮鐘等所主張，非武裝抗日的三大主力分別是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台灣文化協會以及《台灣青年》雜誌。<sup>140</sup>發刊於一九二〇年的《台灣青年》月刊是三運動中年代最早，為台籍東京留學生組織「新民會」為啓蒙民眾所刊行的機關刊物，出刊十八期之後更名為《台灣》，再更名為《台灣民報》以「平易的漢文、滿載民眾的智識、宗旨不外欲啓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氣、以謀台灣的幸福、求東洋的和平」<sup>141</sup>為訴求，對於聯絡當時知識分子、啓蒙民眾，《台灣青年》等系列刊物確實起了作用。但由於初期《台灣青年》及後來的更改刊名為《台灣》或半月刊的《台灣民報》，其發行地點皆為東京，<sup>142</sup>無論是理論上或實際上恐怕是未曾廣泛地讓台灣一般民眾接收到此資訊的傳遞。如蔡培火所言：

無奈民報的記事，是對島內取材，所以不能像台灣青年及台灣兩誌在東京編輯，每號都要在島內編成原稿，然後送到東京印刷，受過內務省檢閱，方可送歸台灣，得其通告才能發交讀者，統算來往運送及兩重檢閱的時日，最繁捷也須三週以上讀者才看得著報……<sup>143</sup>

從《台灣民報》起初無法在台灣發行但允許在東京發行的政策看來，殖民地台灣是絕對無法享有與日本本國國民一樣的權力，直到一九二七年被允許移回台灣發行的《台灣民報》才算是直接對台灣普遍性民眾發佈訊息的功能，即葉榮鐘等諸位定義為所謂的「宣傳戰」。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是由六三法撤廢運動蛻變而來，於一九二一年一月

---

<sup>140</sup> 參見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陳逢源、林柏壽：《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民】79）頁281。

<sup>141</sup> 慈舟：〈發刊詞〉，《台灣民報》創刊號，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頁1。

<sup>142</sup> 這也顯示殖民母國國內的統治因為現代帝國的建立而呈現現代進步的意識，包容以及接受各種先進的資訊，呈現民主的氛圍，另一方面卻高壓統治殖民地，顯出兩相矛盾。日本國內與殖民地截然不同的作風尚有日本的進步人士在六三法提出時，也幾乎是同一時間提出反對的例子。

<sup>143</sup> 引自蔡培火：〈民報島內發刊所感〉，《台灣民報》一六七號，昭和二年八月一日。

卅日「由林獻堂領銜，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一百七十八人署名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sup>144</sup>開始了長達十四年十五回的請願運動。

就台灣的外部關係而言，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三一年，日本對台灣關係的重點已經從政治控制轉為發展經濟。原因有二。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帝國主義的政治聲譽已經下降；其二，日本戰前對台投資的經濟效益正逐漸提高。戰後，日本產生了眾多政黨，選民隊伍迅速擴大。這在無形中影響了在日台灣學生的思想意識。在宗主國進步日本人的鼓勵下，台灣精英主張，應將日本人的參政權擴大到台灣，或者允許台灣人參加日本議會，或者實行台灣自治。<sup>145</sup>

在外留學的台籍青年見識到世界思潮的湧動，成為台灣新興的知識階層，在日本的留學生自發組織「聲應會」、「啓發會」、「新民會」等團體互相支應，也與大陸、朝鮮等的留學生互通信息。見到日本本國是立憲政治，感受到與島內不一樣的政治氣氛，讓這批新興的知識青年累積了新的能量。一九一八年林獻堂赴日與留學生聚會，初步就台灣處境提出各自的看法。一九二〇年，林獻堂再度與新民會幹部聚會討論運動的路線，蔡培火其間提出自治的不可行，而建議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替代，得到林獻堂的支持。<sup>146</sup>同時期台灣島內之事青年蔣渭水亦與林獻堂正式認識，獲知林獻堂欲往東京發起台灣議會請願活動，而尋求林獻堂的支持組織一島內菁英團體。

大正十年七月，蔣渭水訪問林獻堂，就其組織事宜有所商討，續後，

<sup>144</sup> 參見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系，【民】78）頁35～36。

<sup>145</sup> 引自 E.A. Winckler, S.Greenhalgh，張苾蕪譯：《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台北：人間，1994）頁79～80。

<sup>146</sup> 一如「同化主義」一般，有人願意相信同化可達到與日人的平等待遇，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見，認為不該被同化。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亦然，反對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者認為應該堅持撤廢六三法。

又與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專攻科吳海水（台南）及由該校畢業後，在台北紅十字醫院工作的林麗明（彰化）會合，以曾與林獻堂商量過的事項為基礎，關於創立手續有所磋商，並起草台灣文化協會趣意及會則案。<sup>147</sup>

見蔣渭水自己的說法亦是。

自獻堂氏歸台，在台北開了歡迎會以後，新交的同志，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林瑞西……諸氏，屢次慫恿我出來組織團體……由是考案出來的就是文化協會了。

我診斷得台灣人所患的病，是智識的營養不良症……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sup>148</sup>

爲了避開總督府的查緝，文化協會一開始就定位爲文化團體，並向警務局長保證絕無政治運動情事，<sup>149</sup>但創立會員即有一〇三二名之盛況，且會員多爲醫師、地主、記者、學生等中上階層人士，對於文化活動的推動自然更顯助力。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的進行同時，文化協會也在島內舉辦各種活動響應，如以巡迴各地的講演會亦宣導議會設置、民族自決等主題，其他活動則有發行會報、成立讀報社、電影播放隊等。

經由文化協會的各種運動，普遍的農工階層一方面受到殖民統治者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壓榨，一方面也接觸到文協運動的啓蒙，逐漸醞釀出一股集結的反抗意識，殖民統治者亦意識到此點，無不想盡各種對策對付文化協會。此時以辜顯榮爲首等有力者人士成立之「台灣公益會」，無疑是在作爲「文化協會及台

---

<sup>147</sup> 原文爲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138。譯文引自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民】77）頁 250。

<sup>148</sup> 引自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台灣民報》第六十七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sup>149</sup> 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139。

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對立的龐大勢力」<sup>150</sup>下成立。顯然，作為太平紳士的辜顯榮等人，面對時局的變動總會有最敏銳的判斷，向執政者輸誠是最有利的一著。<sup>151</sup>辜顯榮等有力人士並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廿七日舉辦有力者大會，向社會昭告「鑑於時局之重大及本島之將來，所謂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實非本島輿論。」

152

相對於公益會的有力者大會不甘示弱的文化協會派則於同年七月三日於台北、台中、台南三地同時召開無力者大會，並發表〈決議書〉：

#### 無力者大會決議

吾人為了擁護吾人之自由及權力，期撲滅偽造輿論、蹂躪正義之自稱全島有力者大會之怪物。

#### 右決議

大正十三年七月三日

全島無力者大會<sup>153</sup>

此番有力者大會與無力者大會宣告了殖民地台灣中、上階層的意志、意向分離的現象，有力者確實有力，而無力者是不是真的無力，恐怕是反諷的意味更需要被強調。也就是說林獻堂等或基於家族事業現實考量、民族運動理想實現、現代法治社會憧憬……等諸多各人不同的複雜成因，選擇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體制中，欲尋求一個較為合理的、享有與日人同等的憲法保障，始走上台灣

---

<sup>150</sup> 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180。

<sup>151</sup> 有一說則是公益會召開大會實際上是挽留內田總督的運作，先是台灣議會設置的請願運動引起日本國內注意，而此運動在台灣島內又遭檢舉而引發治警事件，加上日本國內加藤新內閣就任，是否撤換總督則成了最敏感的政治議題。參見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陳逢源、林柏壽：《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報系，【民】79）308～316。

<sup>152</sup> 此為辜顯榮率公益會主要幹部林熊徵、吳昌才、李延禧等人於《台灣日日新報》報社集合，商討出刊登於各報的〈聲明〉。全文詳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180。

<sup>153</sup> 引自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181。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路；此刻同為上層階級的辜顯榮則以不作亂世民為主要考量。

發跡於日軍領台並受勳「台北保良局長」處處與殖民統治者鼻息相通，當然持續其政治敏銳度，與林獻堂等是不同立場的上層階級。然而林獻堂尋求體制內的運動，對於民族運動的激進者則相對保守，且有妥協的可能性，這也是日後台灣民族運動呈現各種路線之爭的重要元素。因為「『民族』最重要的義涵，是它在政治上所彰顯的意義」<sup>154</sup>，做為全體公民集合的「民族」從事運動的同時，所面臨的是承認或否決一個完整運作的政權體系，作為是否足以切割以便重新建立以民族為最大辨識度的集體認同。然而中產階級投身於民族運動中，最大的考驗是民族的概念是否可以凌駕一切之上，包括在政治體系中所擁有的各種資產，那勢必會因為運動而承擔主動重新分配、調整的風險，而滿足於一個稱之為「民族」情感的想像社群。

台灣在日治之前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做為古老中國的邊陲，是冒險、偏安的地方，沒有見識過近代國家體制的運作，更不可能有「民族」的概念。隨著中國的戰敗，經由科舉進入中心的管道封閉之後，也改以期待新式教育，封建的地主、土豪也學著進入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不變地是繼續壓榨更多只能從事第一線生產的勞動者。這預告了一個社群想像嚴重分歧，甚至隱藏在政治操作的各自虛構中，無可避免的重覆內耗，沒有「共同體」的可能，但卻塑造出一種民族主義的雛形，以致成為日後循環式辯證無果的原型。

#### 第四節 殖民地的民族運動與分裂

在非武裝抗日的運動中，成立於一九二一年的文化協會力量可以說是較具系統性地、廣泛地影響當時的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一時在台北靜修女中開創立大會，會員人數達一千卅二名，會中推舉林獻堂為總理，指名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創立之初所吸收的會員也多是「有力者」，即所謂的閱讀階層，具有或已經成為領導階層的菁英層。其中較具有可

---

<sup>154</sup> 參見霍布斯邦，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1997）

塑性者仍屬青年階層的學生群，行動力較不為政治現實牽制，成長於日治安定期的「乙未新生代」。<sup>155</sup>

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局沿革誌》所統計的學生會員為例，文化協會創立之初即加入便達二百七十九名之多，又以台北師範學校學生有一三六名居冠。<sup>156</sup>見下表：

表格二 文協初成立學生會員數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警察局沿革誌》）

校名	人數
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學生	四十九名
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後為高等農林學校）學生	三十名
台北師範學校學生	一三六名
台北工業學校學生	三名
台中商業學校學生	六十一名

這一批青年學生無疑是文化協會運動的先鋒者，以學生的活動能力判斷，這一批學生是具有開拓文協啓蒙運動影響的最著者。如與其他學生團體的結盟、合作，而且海外留學生也因為島內的學生結盟也有了互通聲息的管道。隨著一九二一年文化協會的成立，也舉辦各種講演、戲劇等文化活動，與台灣人民做最近的接觸與互動，達到啓蒙民眾的作用。

回顧文化協會的成立，距離一九一五年戰亡者不計其數的「西來庵事件」已經六年之久，這對一八九五年來被殖民的台灣民眾而言，不啻是一種傷痛且恐怖的經驗，也因此，台灣的武裝抗日行動，多以此事件為界。武裝抗日的行

<sup>155</sup> 參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民】92）

<sup>156</sup> 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170。

動結束，活躍於二〇年代的台籍青年，顯然成為具有領導台灣條件的新興菁英階層，可被認為是非武裝抗日活動轉向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若由其可接受新式教育條件觀察，多數出身多為中、上階層家庭，並且延續其父兄對科舉的認識，經由受教育進入統治者的政治（官僚）體系，或至少保有自身的競爭能力不至於使整個家族勢力沒落。

也因為體認到新式教育的重要性，面對殖民統治者所提供的教育機構有限，台籍仕紳多半會將子弟送至他地留學，甚至就集合仕紳的力量發起興建學校的訴求。據矢內原忠雄的說法，早在一九一三年之時，辜顯榮等人請設台人中學校的重大事件，可以視為台灣民族運動的第一聲，<sup>157</sup>此種說法不乏贊同者，<sup>158</sup>並將一九一四年成立的「台灣同化會」一併納入初期的台灣民族運動的先聲。就台中中學的設立是否具有台灣民族運動的象徵意義，學者周婉窈提出不同的看法，其認為台中中學的創立「目標單一，側重教育機構的建設，而且多數捐資的士紳（如辜顯榮、顏雲年、楊吉臣）顯然並無要求政治改革的存心。」<sup>159</sup>「不能視為具有民族意識之近代運動的起源。」<sup>159</sup>兩者其實是提供了實質效用與起源動機兩種思考面向。

因為，如果是就抵抗的自覺性而言，「台灣同化會」打著追求善遇台人的口號，充其量是自由主義者板垣微弱的人道關懷抑或統治者的兩面手法？況且是以「日」同化「台」，根本就是以自我的優越感作崇，本身並不可能具有所謂殖民地的「抵抗」意識，那就很難令人贊同「台灣同化會」可以被視為台灣民族運動的一環了。

殖民地或許能因同化主義的真確實行而享有立憲政治的平等待遇，  
但就殖民地的主體意識而言，喪失歷史文化將是一種切膚之痛……  
同化主義在現實上所遭逢的難題是，它並不能為台灣人民爭取實質

<sup>157</sup> 參見矢內原忠雄，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2003）頁213。

<sup>158</sup> 如吳三連、蔡培火等人合著的《台灣民族運動史》也以板垣退助倡設的「台灣同化會」和台中中學的創立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濫觴，參見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陳逢源、林柏壽：《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報系，【民】79）

<sup>159</sup> 參見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系，【民】78）頁10。

的政治利益。<sup>160</sup>

就實質效果而言，台灣人民的確很難從中獲得真正的利益，追求所謂的同化同時，必須放棄的是自身主體意識同化於他者，確實很難令人認同。但是就結果論而言，「台灣同化會」的發起，也算是正視了台、日的根本差異，無論是風俗、語言等文化上的殊異，殖民統治者也未曾將台灣人視為本國人般實以同等待遇，而「台灣同化會」也突顯出台、日的無以同化。但台灣總督府連微弱的人道關懷都沒有，也不可能放任板垣在殖民地台灣拉抬出其個人或其同志另一波的政治聲望，更不可能同意「台灣同化會」集結組織存在台灣，因為任何一種殖民地的集社組織對統治者的統治權威來說無疑是一種隱憂，更諷刺地是所謂的「同化」理論上根本就與賦予台灣總督特殊立法權的六三法互相抵觸，「台灣同化會」的存在就更凸顯了日本人統治台灣人的矛盾性，總督府隨即在一九一五年二月廿三日取締同化會，以「有害公安」<sup>161</sup>命令告解散該會。同年八月發生「西來庵事件」，被逮捕判決死刑者逾三百餘人。

一九一三年辜顯榮等仕紳鑑於台灣缺乏中等教育機關，莘莘學子負笈東都者逐日增加，「夫以髫齡之年，一旦離鄉遠景，棲身於萬里外，徵特學資不易，亦復疑慮叢生」<sup>162</sup>於是聚集林烈堂、林獻堂、林熊徵、蔡蓮舫等台籍仕紳的力量籌措資金，意欲建設台人中學。

另外，台灣人中學的設立確實顯現出殖民統治者也必須正視台籍仕紳的影響力，殖民統治者是需要倚重殖民當地的有力社群來作為穩定社會結構的一種力量。因此在殖民初期一八九六年十月，總督府便發佈〈台灣紳章條規〉，用以「頒授紳章給具有科舉功名、有學問、資產或名望之台人」，並將此等「台人社會菁英悉數納入基層行政和治安組織中，建構台灣社會新領導階層，亦即日人

<sup>160</sup> 引自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系，【民】78）頁42～43。

<sup>161</sup> 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22～23。

<sup>162</sup> 見「台中一中創立紀念碑」。

所稱的『上流社會』。<sup>163</sup>以致此等仕紳提出興建台灣人中學校的要求之時，一來鑑於台籍仕紳的影響力，另外也想藉此「確保地主資產階級之協力」，<sup>164</sup>再則深怕在所謂「無方針」教育政策之下，反而增長了留學風潮，對此引起的「後果」則是無法預測的。

因此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始首肯了設立台人中學校的要求，「一方面籠絡人心，一方面也藉高等普通教育，創造出一批台灣仕紳子弟，做為在台灣從事殖民統治的助力，即在被殖民者內部培養出協力者。」<sup>165</sup>而台中中學校的校舍則由仕紳興建之後捐獻給總督府，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就在統治者與台籍仕紳各有盤算的狀況下興建。

就結果論而言，台灣公立台中中學校的畢業生的出升學、就業等選擇，可以繼續深造者多半是出身世家，而被允許進入中學校就讀的台籍生多半來自家中經濟狀況小康以上。因此，依然是可以就學生本身的背景加以觀察，因為受教育與否取決於經濟條件的前提下，台中中學畢業生出身於世家者也多半承襲了父兄的社會地位，進入菁英領導階層，光就入學的學生背景資料來解讀，台中中學是否培養了原本低階層的子弟成功晉升「上流社會」就無法肯定了。

但若以文化協會的運作來看，一九二二年發生在台北師範學校第一次的騷擾事件，被逮捕的四十五名學生多數為文化協會成員，可見文化協會在社會的影響力，而學生更是積極參與文協的各項活動，發生騷擾事件的抵抗不能說不是文化協會所積極培養出來的反抗意識。從日警所逮捕的大動作來看，日警對於文化協會的影響力也提高警覺。

一九二四年台北師範學校再度爆發學校與學生的衝突，因為畢業旅行的地

---

<sup>163</sup> 詳見吳文星：〈日具初期社會領導階層之肆應予變動〉，收入《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台北：正中，【民】81）頁11～94。

<sup>164</sup> 若林正丈認為總督府和台灣社會「有資產、有名望」人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交換關係，即「在遂行對山地原住民族的征服戰爭之際，台灣有力人士提供資金、人力動員的協助，而總督府提供的交換條件是對其教育要求的讓步。」參見若林正丈，許佩賢譯：〈試論如何建立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的研究——戰後日本研究成果的一個反思〉，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273～284。

<sup>165</sup> 參見吳密察：〈從日本殖民地教育學制看台北帝國大學的設立〉，收入《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鄉，【民】80）頁149～175。

點質疑，學校打算給予台籍學生許吉退學處分，文化協會則指派蔣渭水等幹部積極介入，發動集體罷課學潮。最後學校接受了被退學學生家長的陳情書，並允諾調查事發真相及體諒未歸校學生等四點承諾下，這次運動暫告結束，但事後學校仍以強硬的手段退學了卅幾名學生。<sup>166</sup>由於此次事件重大影響了社會的觀感，各學校也開始對文協的學生會員緊迫盯人，要求學生退出文協，而文協妥協式的將原本的學生會員予以刪除，於此也看出青年學生參與運動的活躍度。恰符合霍布斯邦對民族主義新興的過程中，認為受過教育的階層是此刻中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強大支持者的說法。

少數菁英可以利用外國語言活動；而一旦受過教育的幹部變得足夠多時，民族語言就會自行產生影響。因此，當開始用民族語言出版教科書、報紙，或進行某些官方活動時，都代表著民族發展邁出了關鍵一步。<sup>167</sup>

於是舉辦會報、講演、行動劇等具體的活動的文協，加上留學海外的台籍青年及其《台灣青年》雜誌，成了邁向台灣民族運動象徵性的關鍵一步。但也因為文化協會的成員多屬菁英階層，活動力夠、自主性高，且與世界資訊相連結，自然在文協內部容易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加上成員本身有地主、醫生、記者等不同職業的領域，對於民族運動自然有其接受程度的差別。雖然成立之初確實是依靠林獻堂等人的「有力」才得以順利成立，但也因為此派人士的有力，所顧及的層面較為多重。即若林正丈所言的是一種殖民政府與有力人士的交換機制，「而他們的子弟由於在新式教育機構中受教育而擁有新的文化資產，當他們再度被捲入這種政治交換機制時，其交換內容當然也和他們父親那一世代的交換品有所不同。」<sup>168</sup>然而，這一派有力人士的保守看在民族運動激進派

<sup>166</sup> 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171～173。

<sup>167</sup> 引自霍布斯邦，王章輝等譯：《革命的年代：1789—1848》（台北：麥田，1997）頁 198～199。

<sup>168</sup> 參見若林正丈，許佩賢譯：〈試論如何建立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的研究——戰後日本研究成

的眼裡愈顯得需要經由鬥爭而躍居領導階層，不可能遏止激進社會主義派的崛起，文協無可避免走向分裂一途。

當時共產主義的邪說<sup>169</sup>已開始流行，中共、日共以及國際共產組織的影響，漸次在文協內部滋長起來，尤其是反映在文協幹部蔣渭水維護下的「無產青年」一派的思想行動最為鮮明。<sup>170</sup>

在蔣渭水的默許下，日共山川派系的連溫卿順勢培養自己的影響力，與蔡培火要求在體制內尋求改善的保守派形成文協內部左右兩派勢力。而蔣渭水則是所謂的「全民主義」派，此時文協內部思想傾向可參照下表：

表格三 文協分裂（1927）前思想派別<sup>171</sup>

思想派別	代表人物	思想傾向
社會主義	連溫卿、王敏川	結合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
全民主義	蔣渭水	結合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推行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	蔡培火	本身為資產階級，主張合法路線的自決

左、右派衝突始於一九二六年文協章程修改案的提案，蔣渭水、蔡培火、連溫卿分別提案，蔡、蔣兩案合併為本部案，連不滿遂進行運作，動員尚未入會的無產青年加入文協。一九二七年召開臨時理事會，表決結果蔡培火提案被否決，文協新章程則以連案為底本、蔣案加以修正，連派遂進一步在選舉中央

---

果的一個反思》，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273～284。

<sup>169</sup> 前人著述或許因為當下政治氣氛的不允許，共產主義一律必須被視為邪惡的表徵，這在新版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中已不復見，改以「世界思潮駸駸日進，中國、日本的共產主義以及國際共產組織的影響，漸次在文協內部滋長起來」修飾「邪說」。新版參見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晨星，2000）頁 382。

<sup>170</sup> 引自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陳逢源、林柏壽：《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報系，【民】79）頁 337。

<sup>171</sup> 內容詳述參見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台北：前衛，1989）頁 43。

委員的結果中大獲全勝，林獻堂以年老力衰且將出國考察而辭中央委員，雖經慰留但仍表明不選新制之委員長一職。而蔣渭水也因為提案「總理制」與連溫卿「委員長制」發生意見衝突，亦辭去文協中央委員，且因為蔣介石的清共而於《台灣民報》發表〈共產主義向左去，三民主義對右來〉<sup>172</sup>一文，讓蔣渭水重新修正了其對共產主義的看法，此時文協則完全轉由連溫卿所掌控，舊幹部也因此陸續退出，文協遂從一「民族主義啓蒙文化團體」變成一「無產階級文化啓蒙團體」。<sup>173</sup>

分裂後的文協亦激進地欲跟隨國際共產組織的腳步，以階級鬥爭為最高指導原則，不惜做任何犧牲達到鬥爭的訴求，如與勞動人民黨的結合，尋求日本、朝鮮無產階級的聯盟等，但也因此讓原本是支持文協的中產階級產生猶豫，文協的運動也不如前順利。而且講演的內容也從以前的文化講演轉變為政治思想的宣傳，原本為文協所用的《台灣民報》也轉換成文協舊幹部所另組的台灣民眾黨經營。

分裂之後的新文協內部也存在王敏川等「上大派」與連溫卿「非上大派」（「山川派」）的對立，先前未發生衝突是因為兩者結盟對舊幹部進行鬥爭，隨著舊幹部的離去，新文協內部的矛盾也逐漸顯現。尤其山川均在日本的沒落，使得在台灣的連溫卿也遭到清算一途，連成了左派社會民主主義，是分裂主義者，是陣營中的敵人。<sup>174</sup>將連溫卿除名之後的文協完全由王敏川等主導，自此文協成了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在黨的領導下成為台灣共產黨的無產市民、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大眾團體，密議支持台灣共產黨的決議，成為台灣共產黨的一翼，以遂行台灣革命的目標。」<sup>175</sup>時至一九三一年年底，文化協會也自然消失於歷史中。

---

<sup>172</sup> 詳見蔣渭水：〈共產主義向左去，三民主義對右來〉，《台灣民報》一六〇號，昭和二年六月五日。

<sup>173</sup> 詳參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137～217、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晨星，2000）頁382～392。

<sup>174</sup> 詳參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253。

<sup>175</sup> 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268。

從文協的分裂到衰退，可看出台灣民族運動的原型，即在階級鬥爭中自我損耗實力，無以團結的內部構不成抵抗的核心成為民族運動，而這個內部本身就是分歧的各自表述。一個有組織的運動需要依靠中產階級投入的財力、物力，而中產階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階級的矛盾，以致於上層統治階級聯合次級的中產階級，成為穩定社會結構的最大力量，而普遍的無產階級卻毫無能力與之抗衡。民族運動需要透過縱的聯合與橫的連結，才可能凝聚足以抵抗統治者的實力，但是民族運動的核心需要一個共同的意志才足以被建構，足以形成一個集團，進而成為一個必然的「國家」。

台灣人若採取階級爭鬥，則台灣人自身必要分裂，分裂為有產對無產——則互相殘殺，骨肉相爭，勢力分散，故當局容易統治，若採取○○運動呢？

則台灣人各階級勢力集中，可得增大力量……現在台灣主張階級爭鬥的人們，以為將來台灣無產階級政黨與日本無產政黨互相聯合，台灣派遣無產議員到日本參加帝國議會，這樣做法是內地延長——同化政策——這無視民族的特殊事情，在這觀點上，左派倒變做右派了。<sup>176</sup>

從事民族運動的蔣渭水先是主張台灣人民各階級的聯合，即縱的聯合，然而文協的分裂宣告無產階級鬥爭橫的連結，不容台籍中產階級的存在，視之為統治者的幫兇。至此，台灣民族運動縱、橫共同戰線結盟破局，儘管蔣渭水不斷提出團結的呼籲，但是還是不能挽回文協由台共接手，持續進行階級鬥爭的局面。而脫離文協的蔡培火也持續在《台灣民報》上發表言論，持續對新文協的鬥爭做出攻擊。

---

<sup>176</sup> 引自《台灣民報》第一百五十七號，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五日。原載未刊作者，但收於《蔣渭水全集》（台北：海峽，1998）

從來一個有聲有息的台灣文化協會，弄到像現在四分五裂，是為什麼緣故呢？第一就是一部的野心家，自己無力組織新團體，強將這個奉仕的團體要變做抗爭的團體，利用這個，自居為農工運動的總指揮，是無視文協年來的立場和使命。第二就是組織法的衝突……不幸以一部分人的組織法，強將要打猛虎的組織法，靠著騷擾的蠻勇，在臨時總會強行決議。這兩點就是文協分裂的直接動機。<sup>177</sup>

對於一個殖民地而言，階級是不是真的能夠產生嚴重的貧富落差，造成階級的對立？於是也有另一種聲音的出現，即應將全體的台灣人民視為無產階級，以打倒帝國主義為主要目標，但是文協的分裂造成台灣內部領導階層的路線分離，是如何也無法攜手合作的思想分歧。如霍布斯邦所言，「資產階級」是不容易被定義的，又資產階級「分為以財產所有權為基礎的有產階級和藉由較高教育而取得中產階級身分的教養階級；而中產階級則看不起小資產階級。」<sup>178</sup>在階級的區分下，文協內部成員的被切割也是必然的預期。

接收資產階級協助而成立發展的文化協會，也培養出無產階級的教養青年，而無產階級首要鬥爭的對象就是資產階級，文協在這樣的結構下，要團結一致對抗統治階層相對顯得困難。何況整個殖民地台灣有七成以上是勞動的農工階層，其中有多少人願意信仰無產階級革命是一個難題，又有多少比例的人願意接受殖民統治的體制，而辛苦地生存甚至往資產階級移走，這都是需要考量的問題，而不受限於作為抵抗殖民政權的民族運動。

在政治運動中，許多時候會遇到個人利益的牽扯，甚至涉及團體的運作方式，因為身家背景與思想養成的管道殊異，價值觀的差異即造成理想性地或實務性的差別，而互相指責為空想或墮落了。就文協這批領導人而言，連溫卿的立場對蔣渭水來說是過左了，而蔣渭水在蔡培火的眼中同樣也左傾，但在連溫卿的眼中，蔣渭水顯然是過於保守了。思想的分化是台灣民族運動未能成功的

<sup>177</sup> 引自蔡培火：〈台灣社會改造管見〉（一）《台灣民報》第一百八十一號，昭和二年（1927年）十一月六日。

<sup>178</sup> 參見霍布斯邦，賈士蘅譯：《帝國的年代：1875-1914》（台北：麥田，1997）頁246。

一大主因，但若就民族運動的典型而言，台灣是否真能成爲一支民族，恐怕還需要更多時間觀察，尤其是以一個現代國家的成形條件來判定，除了政治議題的主權外，國家人民的認同性也是一大問題，而這個問題卻無解，但可以確定的是因爲殖民地經驗緣故，使得台灣是否是一支民族成爲一個問題。

爾後衍生的是政治考量的國家主權更爲複雜的問題，日後的各種論爭無疑不是因爲殖民地經驗所引發出各自交錯也各自否定的傷痕檢視，並且持續重複，伴隨而來的是台灣人民對台灣這塊土地情感與血緣的各種投射與懷疑。但卻依然無法正視殖民地經驗的傷痕，反之，絕對政治的考量使人民意識走向純粹的無意識，或許即可形成「各自想像的共同體」。

## 第五節 小結：無法集體想像的「民族」

台灣的民族運動究竟如何成型？或者說是否足以成行？回溯或許是最接近的原型，觀察到民族運動被賦予的是更多的政治意涵，更多衝突的立場也正顯現了彼此重疊的可能性。所謂的有力者面對更有力者，都顯得無能無力。誰又是真正的無力者？

抵拒殖民政權的初始，是因爲殘有血緣祖國的天下爲中國的驕傲，不甘爲異族（倭寇）統治，而以「永遠服膺大清國之下」的「地虎」自居的短命台灣民主國，作爲聚集想像的依靠，而非建立一個實質政權，做爲台灣獨立的民族運動；顯然不足以成爲全體台灣人的共識，而無法捍衛單一而不可分的國土。或者在日本天年下的台灣可享有完成現代化的成果，而不至於記憶遺民的世襲，比五十年的過渡期再長一點，是不是台灣人就完整隸屬於天皇的子民，成功以血換血取得新的驕傲，民族運動就只是中國歷代改朝之初的必要之搖旗吶喊？但五十年的時間皇民化世代也成功存在。

帝國主義最有力的文化遺產，是它爲各類少數菁英所興辦的西式教育。因爲，少數因此具有讀寫能力的幸運者，可進而發現一條升遷捷徑，亦即充當教士、教師、官僚或辦公室工作人員等白領階級。

在某些地區，他們也可能出任新統治者的士兵或警察，他們穿著統治者的服飾，並接受他們對時間、地點和處理家務的歧異想法。當然，這些人都是具有行動潛力的少數菁英，這便是為什麼這個甚至以人類的一生壽命來衡量也是相當短暫的殖民主義時代，卻會留下如此長遠影響的原因。<sup>179</sup>

「台灣」作為一個民族而言卻顯得失去該有的邏輯性，如國家體制的持續建構，尚無法因為共同的歷史、文化結合成一個完整的認同，卻要在近代國家體制形成的趨勢下，被迫面對此一問題。若是一個群體而言，是否足以成爲一個國家，似乎又有待論證，否則極容易淪爲民粹主義的禁臠，所謂的認同也只能作為昭告天下的政治正確。有力者與無力者是相對的，做爲殖民地人民，無產階級相對於有力的中產階級是無力的，而無論中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相對於殖民統治者何嘗有力？放到世界的版圖，日本若非無力也不需積極學習歐洲帝國主義的有力，進而入歐洲之列，而欲以拯救之姿解放無力的亞洲，營造大東亞共榮圈了。而今的有力則成了政治正確者，不正確的人就必須接受各種民粹主義下所張羅的大帽子，那更是無力。

民族運動的終結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然而對於台灣的民族運動而言卻依然是一個「抵達之謎」。

---

<sup>179</sup> 引自霍布斯邦，賈士蘅譯：《帝國的年代：1875-1914》（台北：麥田，1997）頁 111。

## 第四章 判讀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結構中的焦慮及其象徵意義

自二〇年代新文學運動伊始，可預知的是對於文學的認定與判讀除了已經既存的審美觀成爲主要影響因素外，意識型態也將包裹於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之中。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時序上銜接了新文學運動，論戰的內容比新文學運動掀起的新、舊文學論爭砲火猛烈有過之。新文學運動整體上是以新文學的形式對抗舊有的文壇勢力，移植了中國五四白話文學運動，對舊詩展開不留情面的攻擊。一則受到中國白話文學運動的直接影響，客觀上而言，是殖民地新興知識份子的殖民地自我覺醒，迫不急待要將世界思潮引進台灣；另外一層是不能排除新興勢力對固有勢力的挑戰，是建立自我價值的直接作法，而且成了殖民地台灣新文學價值的濫觴。

而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則在新文學形式確定成爲台灣文學重要形式之後，進一步就新文學確切的形式進行論辯。諸如被界定有別於舊文學的新文學書寫語言該以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sup>180</sup>等作爲媒介、描述的內容該以台灣在地人、事、物爲描寫對象的細部問題討論、辯爭。論戰表面上看似是對文學價值的判斷，但論戰本身確實揭示了一種對殖民地宗主國的疑惑，文化與血脈之間的統一性是否提示著該趨近扮演遺棄角色的中國、或凸顯作爲一塊被遺棄的土地需要自身肩負起弱小民族自決的命運，抑或向引入資本主義的現代帝國徹底臣服以求絕對的進化？都可以在鄉土的論辯中看見殖民地人民隨著被殖民的創傷而陷入無所認同的焦慮。

台灣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是最早一次凸顯「主體」差異，也是顯示了這種集團式的對抗概念，彷彿游勝冠所言是「台灣本土論」的起源，然而究竟鄉土何在？是不是鄉土文學早已以政治正確地存在台灣？台灣的本土究竟欲以何等的姿態凌駕其他價值之上？早在三〇年代，尚無法在政治勢力上圈定自己

---

<sup>180</sup> 以今日對台灣族群觀察的目光而言，所謂台灣話文應當包含各個族群所慣用的語言，包括俗稱「台灣話」的河洛話、客語及原住民各族部落所使用的語言，然而在三〇年代的台灣所指稱的「台灣話文」則偏向以河洛語爲是。

存在領地的台灣，已經在所謂的「本土」內部產生撕裂性的論戰，不僅是文學而已，那隱藏的意識之爭也悄悄在其中扮演關鍵一擊。本章將由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的鄉土文學論戰中耙梳論爭中對文學與鄉土的各種思辯，藉以探討何以鄉土文學一再重複出現於台灣文學命題的論爭中，提出一種存在論爭重複循環的結構意義，並繼而思索台灣文學走出鄉土文學論戰宿命的可能。

## 第一節 點燃鄉土文學論戰的焦慮

一九三〇黃石輝一篇〈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1930, 8/12~9/1《伍人報》)揭開了台灣文學史上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的序幕。顯然三〇年代的台灣知識份子已經開始去思索，關於殖民地台灣的出路。如果從文學上著手啓蒙的任務，那麼該進一步去確立文學的意義與價值，「鄉土，作為一種思想類型，它的第一個涵意是被殖民歷史的審視」<sup>181</sup>於此，又一次閱讀眾所周知的一段名言：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sup>182</sup>

之所以徵引這段名言，乃因這段名言點出了台灣鄉土文學日後對文學表現的價值，而且也建立了所謂「鄉土文學」的審美框架。從新文學運動以來，首先被列為攻擊對象的是舊文學的舊知識份子，一來舊文人長期吟哦風月使文學成了重要的閒暇趣味，讓新興的知識份子認定文學該是具有啓蒙任務的價值觀

<sup>181</sup> 參見林載爵：〈本土之前的鄉土：一談一種思想的可能性的中控〉，《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1998)

<sup>182</sup> 引自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伍人報》第九~十一號，一九三〇年八月十六日~九月一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6。

抵觸。二來舊文人與殖民者之間互相聯對的曖昧，也引起新興知識份子的不滿，於是新文學運動一舉要把長期佔據文壇的舊文人推翻，重新取得發言的位置。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論述集中於新文學價值的建立，<sup>183</sup>時至三〇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群的內部分裂，使得對族群與鄉土認同的焦慮浮上台面。

除此之外，台灣知識份子階層開始的路線之爭，因為在進入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之前，二〇年代的台灣出現的一批新興知識份子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洗禮、見識到世界湧動的進步思潮，連帶反思對殖民地台灣的反思，開始推行的新文學運動等無非是自我期許式的肩負起啓蒙任務，文化刊物、組織相繼發行的刊行與成立都代表著此一進步意識的起源。但當 1927 年象徵殖民地進步意義的文化協會分裂，不但顯現出台灣內部自知識份子階層對族群的認同焦慮，亦宣告路線整合的失敗，中間路線的不可行與矛盾。

文協自去年十月分裂以來，新幹部不是主張階級鬥爭便是排斥民族運動，學著第三國際的戰術，對民族運動者，加以毀謗中傷，將台灣全民的解放運動的共同戰線，弄到紛紛亂亂，致使台灣民眾的勢力分散，解放運動的前進為之停頓。<sup>184</sup>

對於文協左派勢力的壯大，進而使得蔡培火等右派全面退出文協，表示蔣渭水的合作路線是過於樂觀的，儘管蔣渭水在民眾黨成立之後依然發文呼籲民眾黨、文協、農組應該要合作，並為指出「台灣人中，固然也有少數的有產階級，然而在政治上都是一樣地沒得政權」<sup>185</sup>企圖為右派的資產階級緩頰對立氣氛，但運動分裂的態勢已明，雙方勢必無法屈居被領導的位置。

焦慮源自於對事物、現象的不確定。當台灣被割讓予日本，時為中國領土

<sup>183</sup> 由於本論文第二章已論及新舊文學論爭，此處則不再贅言，但因本論文將新舊文學論爭視為鄉土文學論戰的前兆，因此稍加說明。

<sup>184</sup> 引自蔣渭水：〈文協的新宣言：不談階級鬥爭，提倡民族運動〉，《台灣民報》第一百八十一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

<sup>185</sup> 參見蔣渭水：〈須要統一共同戰線：民眾黨、文協、農組的合作如何？〉，《台灣民報》第一百九十二號，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部份的台灣無以表示拒絕，台灣民主國的成立無論實際的軍事抵抗或者主權持有的政治操作顯然不敵日本帝國現代進化中的強勢與有效性，而接續的民兵武力抗爭少了政治主權的強化與管理，亦無以為繼；於是非武裝運動的文化組織群起展開，新興的殖民地菁英欲以啓蒙運動率領殖民地人民以文明的進化抗拒殖民帝國，藉以陳述殖民地的進化成果以及做不能以蠻制蠻的政治訴求。於是《台灣青年》等一系刊物發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亦隨之運作等非武裝抗日行動號稱台灣民族運動發軔，在在顯示對於殖民地台灣未來前途的未知，啓蒙運動下的台灣菁英體認到自決的必要性，而溯及知識背景的養成差異。「統一」勢必不可能出現讓台灣的左、右和解，基於階級制度的存在也無法經由自我批判達到縱的聯合，從鄉土文學的論戰中可以窺見知識份子對自我認同的辯解，並且經由對鄉土的認定收攏分裂的社群。因此，鄉土文學的提倡成了一種檢視的機制，不滿此制者遂成為台灣文學內部分裂的表徵，戰火也就以此燃燒至今。

從論爭的發生和論題的設定來看，這場始於提倡台灣鄉土文學而後集中於台灣話文的建設問題的論爭，可以說是一九二七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後，左翼文化運動和文學思想的延續，也是二、三〇年代世界性的普羅文藝思潮在殖民地台灣的特殊表現型態。<sup>186</sup>

從施淑先生的觀察中可以得知，黃石輝的發言位置與其擔任改組後的文協高雄支部負責人的角色有絕對性的關連，<sup>187</sup>因而全力推動文協「助長台灣文化大眾化」為最高指導原則，使得普羅文學與鄉土文學劃上最直接地等號，執行

<sup>186</sup> 引自施淑：〈台灣話文論戰與中華文化意識——郭秋生、黃石輝論述〉，收入《八·一五：記憶和歷史》（台北：人間，2005）頁172~173。

<sup>187</sup> 根據黃文車的《黃石輝研究》中所指出，黃石輝在新文協中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無論是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文協左右分裂，或者是一九二九年文協第二次左與極左的分裂，都能名列中央常務委員的名單。雖然在《黃石輝研究》中，不願指出黃石輝為極左的一份子，但在以鬥爭始存在的文協中，可見黃石輝的思想路線是吻合左翼的需求，並且以此作為發言位置。黃石輝生平及思想研究可參見黃文車：《黃石輝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論【民】90）

普羅文藝的訴求並發文於《伍人報》；一份與《洪水報》、《明日》、《台灣戰線》、《赤道報》同被視為「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簡稱「納普」）同路人的左翼刊物。<sup>188</sup>於此並可以觀察到被台共接掌後的文協運動路數，而黃石輝則將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學一併打入「貴族式」文學，希望讓「台灣」與之劃清界限。

以廣大的群眾作為閱讀階層的要求，那勢必要使得文藝形式在文字的要求上定下一個最低的識別門檻。結合了普羅文藝的指導原則，黃石輝由鄉土文學著手，確立鄉土文學的必要性與必然性。因此，普羅文藝的左翼文學觀是黃石輝建構鄉土文學論述的核心價值，確認了這一點，再經由文字的血肉雕塑出鄉土文學的雛形，並且以鄉土認同作為檢視文學價值的標準。

為了進一步確立鄉土文學的必要性，黃石輝以對文學的判斷直指「台灣」的在地認同。除了與固有舊文學做一對立的區分外，並且攻擊了台灣新文學陣營中重要旗手張我軍對鄉土文學的不認同，這一步無非是要將中國白話文視之為貴族文學的攻擊目標的鋪陳。因為張我軍承襲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精神，並以之攻擊台灣舊文壇，而作為以階級鬥爭為絕對目標的左翼文協幹部黃石輝，勢必要將霸佔台灣文壇的新舊勢力一網打盡。因此，白話文學與白話小說相比，同是換湯不換藥的貴族文學，因為中文對於廣大的台灣民眾而言仍然是無法輕易理解的階級文學。

相對於二〇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所承襲的是五四以來白話文的推行，攻擊的對象是佔據台灣文壇的舊詩社，反思的是殖民地台灣被視為落後的、非現代的下層位階，意欲與血緣祖國做一緊密的連結，有一齊抵拒殖民地國霸權的意味。

中國將民國的建立視為維新的必要途徑，而白話文的推動成為重新建立民族自尊、追求現代的手段，因此二〇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則將中國當成仿效的對象，期許「台灣雖是孤島、也有大陸的氣概」<sup>189</sup>。但是三〇年代台灣歷經

---

<sup>188</sup> 這些刊物「或為臺共份子所發行，如《伍人報》、《臺灣戰線》、《新臺灣戰線》；或為無政府主義者所創，如《明日》；或標榜喚醒無產階級意識，如《赤道報》等，均屬左翼陣營的刊物。」參見黃琪椿：《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潮之關係初探》（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論，【民】83）頁12。

<sup>189</sup> 參見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台灣》（4：1，1923年1月，漢文之部）頁21。

新舊文學論戰、文化啓蒙運動、社會主義思想散播等影響，台籍菁英對於殖民地台灣的處境或國際情勢已經都有更為確切的概念，而階級鬥爭也在文協分裂的實際操作中更為熟練。根據黃琪椿從日治時期發行刊物的書籍廣告統計，「二七年後書籍廣告大略可分為二類，一類為文學書籍，另一類為社會經濟書籍。」<sup>190</sup>但文學類書籍廣告不若社經書籍類多，且呈現較複雜的學說系統，但以馬克思主義書籍佔較大的比例。<sup>191</sup>

參照台灣社會社群分立的現象，確實可以對應出 1927 年後受台共控制的文協運動方向。由此尚可觀察到一個現象是，在更早二〇年代之初的台灣，所有的資訊來源都依靠留外的學生團體做為媒介，但進入三〇年代的台灣已可藉由成立本地社團，做第一手的資訊傳播。並因為這些社團的內部鬥爭，而自我分化了成立之初欲意團結島內人民的力量。分裂之後的文協由左派黃石輝率先發表建構台灣鄉土文學的可能，於是一個建構台灣話文的工程就在打倒貴族文學的旗幟下開始進行。首先，黃石輝提出三點作為建構台灣文學的初始步驟：

- 一，用台灣話寫成各種文藝
- 二，增讀台灣音
- 三，描寫台灣的事物

做為台灣文學建構工程的第一步，語言的使用被界定為台灣話文，「悲哀的是，要重複集體的套語實在是再容易不過了，因為只要是使用一種國語（國語是無可取代的），就會使人接納手邊最現成的事物，把人趨向有關『我們』和『他們』的那些陳腐用語和流行比喻，而這些是許許多多的機構，包括新聞業、學術專業等，為了方便大家理解而使之流行的。所有這些都是維持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一部份。」<sup>192</sup>知識份子在追求自我認同之時，擅用

<sup>190</sup> 參見黃琪椿：《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潮之關係初探》（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論，【民】83）頁 83。

<sup>191</sup> 參見黃琪椿：《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潮之關係初探》（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論，【民】83）頁 85。。

<sup>192</sup> 參見愛德華·W·薩義德，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北京：三聯，2002）頁 32~33。

知識的力量傳播訊息營造共同的想像，做為殖民地台灣的知識份子肩負開化殖民地人民的重責大任，當然意識到殖民地台灣並沒有堅強的民族認同。這個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被殖民之前唯一的血緣臍帶中國給不起絲毫作為祖國的期待，而以殖民統治者高傲的政策下，受迫的殖民地人民很難在初始就承認被殖民的事實，並心悅臣服於殖民政權之下，於是在地的意識則被凸顯出其獨特性，藉由此獨特性而強調其重要性。

而語言恰是一種獨特的表徵，雖然在學理上可能仍有被中國方言一支所收編的疑慮，但三〇年代當時提出「台灣話文」的獨特，想必是拋棄學理的繼承，而強調在地的差異。在殖民地台灣，時程尚未進入絕對的皇民化政策時期，對於語言，殖民統治者只需要殖民地人民聽懂命令，不需要大量知識。至於原本就不被看重的殖民地，所使用的語言或許在殖民者眼中只是另一種土著語言，根本不到需要禁止的階段，除非這樣的語言成了「土著」們密謀的暗號，並且威脅到統治權，那時才需要壓抑「土著」們的語言吧。沒有「國語」的統一訊息傳遞的力量，台灣其時最普遍被使用所謂的台灣話文成了類國語媒介，而被期許為圈住「我們」與「他們」的界線。於是郭秋生在〈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中便指出語言是一種「民族集團的自然產物，民族精神的體現」，用以「反擊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教育和文化壟斷所造成的知識貧困及認同危機」<sup>193</sup>。

郭秋生提出建設台灣話文一案在抵拒日本殖民強權外，是否也一併把中國摒除在「我們」之外？還是如施淑所言這造成郭秋生「理論內部無法克服的矛盾和分裂」<sup>194</sup>？這也是本文所要提醒的一點，當台灣話文背負其必要性的意識型態時，它必然拋棄中文的學理繼承，而在拋棄繼承的過程中，是不是也反映出台灣話文本身的焦慮？

無論提倡台灣話文者是不是對中國有其自身無法割捨的情感，或者以第三國際的世界觀檢視階級鬥爭，在台灣被宣告割讓的一刻起，台灣人民便背負著

---

<sup>193</sup> 參見施淑：〈台灣話文論戰與中華文化意識——郭秋生、黃石輝論述〉，收入《八·一五：記憶和歷史》（台北：人間，2005）頁172~196。

<sup>194</sup> 施淑：〈台灣話文論戰與中華文化意識——郭秋生、黃石輝論述〉，收入《八·一五：記憶和歷史》（台北：人間，2005）頁172~196。

被割讓的印記，這個印記成了一種集體隱藏式的焦慮。從來沒有想像自身的主權所有，在被宣告的剎那同時也宣告台灣從來就不是自主的國家，而只是中國再邊疆不過的蕞爾小島，失去了台灣雖然換不著中國永久的和平，但是至少可以擺脫許多不必要的外交談判。而在當下的中國，或者根本還沒有思考台灣是不是要拋棄語文的學理繼承，因為中國本身在簽訂割讓條約之時就已經先宣告了台灣話文已經失去了繼承權。當今關於中國與台灣的「統」或「獨」則是後話了。

而台灣話文提倡者或許不自知自身所顯露的認同危機源自於台灣失去宗主國依靠的焦慮，但是從台灣話文被刻意提起的當下，就已經確定這必然是成爲一種他者的辨識度。於是與語言並行的內容則要反應當地語言使用的當地了。理所當然地「台灣」文學的內容則是「台灣的事物」，用以提醒台灣的人民「我們」是「台灣人」，「他們」是「中國人」、「日本人」、「別人」。但必須注意地是此處「別人」包括所有有產階級，而作爲第三國際領導下的台灣支部在尋求殖民地獨立的行動綱領下與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結盟，「我們」則點出台灣殖民地處境，兩者之間始不衝突。

若作爲追求殖民地台灣人民自我認同之時，塑造出同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成了唯一目標的策略，豎立一個明確的指導方針確實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戰鬥方向，但若從黃石輝所欲建構的台灣鄉土文學一案仔細探究，將有助於理解台灣話文建構一案何以引發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

根據中島利郎所彙編的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sup>195</sup>以及陳淑容的研究<sup>196</sup>所蒐羅列舉鄉土文學論戰相關七十餘篇章中，可以得知在黃石輝發表了〈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之後，時隔近一年之後才有郭秋生針對台灣話文題旨於《台灣新聞》發表〈建設「台灣話文」〉一文回應。<sup>197</sup>黃石輝隨即亦於《台灣新聞》發表〈在談鄉土文學〉回應郭秋生，於此揭開戰線爲期四年之久

<sup>195</sup> 即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

<sup>196</sup> 參見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師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論，【民】90）

<sup>197</sup> 原刊於《台灣新聞》（1931年七月七日，連載三十三回）現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7~52。

時至一九三四年台灣史上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sup>198</sup>

雖然〈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發表近一年之後才有郭秋生發文回應，但可以確定的是黃文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確實起了關鍵的作用。且在郭文之後隨即引起文壇一波密集發文討論，黃石輝亦以〈再談鄉土文學〉<sup>199</sup>重申其提倡台灣該確立鄉土文學地位的主張。至於何以在黃文發表一年後才見回應，其中緣由或因未得《伍人報》全貌不見論者有斷，但依照黃石輝〈再談鄉土文學〉中的自陳與毓文、克夫、點人等人回應文中可推論這與《伍人報》當時就被停刊有重大關連。<sup>200</sup>因此雖然號稱創刊號即達三千部，<sup>201</sup>但究竟其流通程度為何？尚難斷定。

另外黃石輝也自陳其時於《伍人報》上關於「鄉土文學」討論並未全文刊完，直至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黃石輝〈再談鄉土文學〉接續發表，引起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讀黃石輝君的高論〉<sup>202</sup>等人質疑「鄉土文學」認定的篇章，而黃石輝亦接續點名毓文、克夫發文回應。總計在一九三一年內便多達三十餘篇文討論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等相關議題，<sup>203</sup>為三〇年代自一九三〇持續至一九三二年的「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

---

<sup>198</sup> 原本論者皆斷定以為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結束於一九三二年，臻於史料出土之故而將戰線延長至一九三四年，參見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序》（高雄：春暉，2003）頁2。

<sup>199</sup> 參見黃石輝：〈再談鄉土文學〉原刊於《台灣新聞》（1931年七月廿四日，連載八回）現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52~64。

<sup>200</sup> 如毓文即表示「寄上伍人報社，意想把它發表以扣先生的高教。沒奈言論被封，伍人報連續遭了發禁，終於休刊了。」參見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原刊《昭和新報》一四〇、一四一號，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八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65~68。

<sup>201</sup> 《伍人報》創刊號印發三千份，雖屢遭停刊處分，但仍發行至十五號，十五號則改以《工農先鋒》名義發行，後來因為資金困難無法經營，後來則與楊克培所計畫的《台灣戰線》社合併，亦維持至昭和五年（1931）十二月止。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292。

<sup>202</sup> 參見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讀黃石輝君的高論〉，《台灣新民報》，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

<sup>203</sup> 根據陳淑容所蒐錄，鄉土文學論戰相關篇章一年內（一九三一年）便達三十篇，其中八篇存目，一九三二年亦有二十三篇，兩篇未見。參見陳淑容：〈附錄一：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關係文獻目錄（1930~1934）〉，《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師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論，【民】九十）頁167~169。

## 第二節 鄉土文學論戰的幾個命題核心

鄉土文學論戰基本上是圍繞著幾則命題論辯著，一為文學內容究竟該表示什麼？一為文學語言的使用，即透露出文學內容的呈現關係著文學形式的取決。而文學的內容與形式則顯示鄉土文學提倡者的藝術評價，一旦建立起鄉土文學的審美標準，將影響了台灣文壇的價值取向。而提倡鄉土文學的必要性則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中的第一段開宗明義揭示，表面上看起來鄉土文學的提倡是對台灣這塊土地的認同，生活於其中必然表達其中生活滋味，並且打著反對「台灣話是沒有文學價值」的大纛。但是追根究底，左翼的文藝思想指導原則或許是最直接導致鄉土文學一派的提倡，這從黃石輝的發言位置可以檢視一二。尤其以反抗「台灣話是沒有文學價值」的立論出發，確實是很煽動廣大說台灣話的民眾，這一點恐怕是文協改組後以階級鬥爭見長的積極作為影響下的靈機。

況且我們做文做詩，都是要給台灣人看的，尤其是要給廣大的勞苦群眾看的。這廣大的勞苦群眾都是沒有高深的學問的，所以我們的文藝只求極淺白，極容易給群眾了解之外，也就顧不得其他了呀！<sup>204</sup>

文協的分裂象徵台灣菁英階層的內部自我鬥爭，而將殖民地台灣引領至無以終結的認同分歧。鄉土文學論戰的引燃只是菁英們無法在殖民統治政權中展現進步的政治實力，轉而訴諸台灣在地的力量，企圖整合出在地最大派系以進行政治理念的執行。借用福柯的話說，這是一種「知識型」，被閉鎖在殖民地背景下的台灣人，被控管著接收資訊的來源，諸如以教育制度做最直接的知識給予、刊物發行的思想檢查等實際行動，在經濟上則以大量生產供給殖民母國所

<sup>204</sup> 引自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伍人報》9，1930年8月16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2。

需為最要考量，迫使殖民地生產方式進入資本主義的量產，卻得不到實際的收益，而汲汲營營於基本生活的維持，形成一種閉鎖性的殖民地空間。

在地的知識份子便在這一種空間下成爲一種類型，闡述其經驗結構建立自我類同的秩序，而且因爲特定的知識條件而獲得發言的管道，成爲此類型的權力表徵。但在論戰的過程中，究竟誰可取得或代表從屬階級的發言權，或許是論戰底層未能直接驗證的一層權力鬥爭。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sup>205</sup>

馬克思的階級概念在《共產黨宣言》中是以資產者與無產者作爲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陳述，根據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對馬克思階級理論的詮釋，「社會階級只有當它具有自我意識時才真正存在，但倘若不承認階級鬥爭就不可能有階級意識。一個階級只有當它發現它要對其他階級進行鬥爭的時候，它才具有自我意識。」<sup>206</sup>從黃琪椿的論文研究中發現馬克思主義在日治時期已引起廣泛知識青年的注意，並將思考的對象從知識階層轉移至無產大眾，並做出「臺灣知識青年並非純然出於階級立場而吸收社會主義思潮，故對無產大眾的態度亦有平行對等與俯視同情的不同」的結論。<sup>207</sup>從黃石輝提倡台灣鄉土文學的立論看來，其立場確實是對無產大眾採以平行的態度，另外可以觀察到黃石輝執意採取台灣話文的強勢不無是以打倒對立的貴族文學爲目標，恰亦印證了文協改組後受共產黨指導下的作戰方針。

黃石輝藉由鄉土文學的提倡建立台灣話文使用的必要性與正確性，從其提出的三點大綱可以想見台灣話文在客觀滿足廣大群眾需求的同時，也揭露殖民地台灣已與中國失去直接的關連性，這與二〇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推動者顯然是不同的立場。因此，台灣話文是否必然使用也成爲論戰中主要討論的議題。

---

<sup>205</sup> 引自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共產黨宣言》（北京：人民，1997）頁 27。

<sup>206</sup> 參見雷蒙·阿隆，周以光譯：《階級鬥爭——工業社會新講》（南京：譯林，2003）

<sup>207</sup> 參見黃琪椿：《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潮之關係初探》（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論，【民】83）頁 101。

郭秋生則意欲進一步落實台灣話文的提案，發文〈建設「台灣話文」〉從語言與文字的關連性談起，細數中國歷代言文乖離所導致的文字難解、誤解之途，時至民國的自我清算，「儒教的封建君權思想第一遭決定死刑……那末和儒教相表裡的貴族的形式的古語文學也當然條件了革命的必要了」<sup>208</sup>用以陳述在台灣人被殖民的特殊環境下，更不可能達到文教普及的狀況，而助長民眾的知識是降低與世界差異的唯一可能，這一點和二〇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訴求是一致的，但是差別在於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派所強調使用的語言，是摒除中國白話文而欲建立台灣話文。

當語言成爲一種權力中心象徵，方言也就不再只是方言，台灣話文的建設顯然欲顛覆邊緣而躍居發言位階，雖然就十數篇的報章雜論尚不能就此斷定黃石輝是否是以確保台灣話文權力地位目的下發言，但是就黃文的立論來解讀，台灣話文取代中文或日文成爲台灣人的書寫語言是肯定的。

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政治上的關係不能用中國的普通話；在民族上的關係（歷史上的經驗）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國語）來支配，這是顯然的事實，誰叫你去分別五州十八省？<sup>209</sup>

因此，黃石輝等鄉土文學提倡者將語言交付台灣話文執行，建立台灣話文派的原因首先是台灣話文是廣大台灣民眾使用的語言，遠比中文（文言文或白話文或其他方言）及日文使用者爲多。台灣話文原本就是一種普及的語言，不需要另行做推廣的工作，因此是台灣話文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優勢。而可歸納其用意：凸顯台灣殖民地與中國或日本的差異處境，如果要解放台灣就必須啓蒙民眾，而欲啓蒙民眾就必須使用民眾可以理解的語文當作傳播的媒介，而台

<sup>208</sup> 參見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原刊《台灣新聞》，1931年7月7日，連載三十三回，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7~52。

<sup>209</sup> 引自黃石輝：〈我的幾句答辯〉，原刊《昭和新報》142~144號，1931年8月15、22、29日，連載三回，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73~69。

灣話文成了首要的選擇；其次，選擇台灣話文有打倒文言文與中國白話文兩者貴族語言的正當性，白話文之所以亦歸為貴族語言是因「嚴密的白話文決不是只將文言文的之呼也改做的、麼、啦便能了事，其作文法即中華語法也有另一種的規律。這在中華的人看來雖然沒有什麼為難的所在，但在不解中華國語的人看來，不減讀文言文一樣費力。」<sup>210</sup>因而打倒貴族語言對普遍為下層階級的民眾成爲一種被期望的戰鬥。

但作為存在的實體則必須以文字的形式表現，於是台灣話文提倡必須自我克服書寫的問題，郭秋生認為既然台灣話文可以被言語就不會無文字，其實這點和「我手寫我口」的立意不謀而合，但台灣話文不如中文白話文已有完整的記號系統，於是台灣話文的記號性問題便成了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繼選取使用語言後的另一項論爭重點。

台灣既然有固有的漢字，而這漢字任是什麼樣沒有氣息，也依舊是漢民族性的定型，也依舊是漢民族言語的記號，所以理論上或可以簡便易寫的拼音字替代難解難寫的漢字，但實際上這恐怕不是容易的工作，所以我要主張台灣人使不得放棄固有文字的漢字，又不可將固有的漢字來記號台灣語寫成台灣話文。<sup>211</sup>

以是否提倡鄉土文學的立場觀察，郭秋生是被歸納為支持的陣營，但是在台灣話文的記號使用上，卻陷入意識的認同矛盾。台灣話文成了鄉土文學論戰中另一戰場，尤其是同為支持鄉土文學論戰者陣營亦對台灣話文有不同的見解，究竟支持鄉土文學是否與支持台灣話文劃上等號？如克夫所言：

---

<sup>210</sup> 參見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原刊《台灣新聞》，1931年7月7日，連載三十三回，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7~52。

<sup>211</sup>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原刊《台灣新聞》，1931年7月7日，連載三十三回，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7~52。

我不是說不可提倡「鄉土文學」的，我是很贊成提倡「鄉土文學」的一人，譬如各國都有它的「鄉土文學」，所以這「鄉土文學」是很切要，而是必然的。但是我所要說的「鄉土文學」卻並不是像黃先生所提倡的「鄉土文學」……<sup>212</sup>

雖然這也亦可看成論戰的語言技巧，因為以克夫的立論而言說是支持「鄉土文學」，卻是以中國地方的鄉土文學看待台灣的「鄉土文學」。但是不容否認，確實在「鄉土文學」的定義上會存在許多歧義的各自判讀，如，究竟台灣的鄉土可不可以被視為中國各地的鄉土之一？對這樣的疑問，黃得時則直接劃出鄉土文學的範圍：

然則台灣的鄉土文學是甚麼？據我一個人的見解現在所有的，就是左記的三種；(1) 先住民族（生番）的跳舞，和那時所唱的歌。(2) 台灣人（廣東人，福建人）的歌仔（山歌，小唱，兒歌……）(3) 歌仔戲<sup>213</sup>

雖然黃得時大膽地劃出台灣文學的範圍，雖然比較起籠統稱之的鄉土文學顯然較為明確。但是這樣的劃分還是無能解決究竟這些台灣「鄉土的」文學系統可否被收編於中國的某一部份的地方文學？而這亦正是論戰何以無法休止的原因之一，甚至成為宿命的可能。

即使在那些以生產者優先的政治權利而可能重建了從生產意識型態關係的因果級別的社會理人們也沒有創造出一種新語言，這種語言與社會主義現實的關係可以從根本上排除任何文學形式的可能性。

---

<sup>212</sup> 引自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讀黃石輝君的高論〉，原刊《台灣新民報》，1931年8月15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76。

<sup>213</sup> 引自黃得時：〈談談台灣的鄉土文學〉，未見原稿，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322。

在拉康的這段話裡，恰說明了鄉土文學在論辯中所象徵的意義。由於語言在出現之前其結構便已然存在，從語言不是上層建築的觀點觀看，鄉土文學的強調必然在左翼的理念中成爲一種正確的選擇。但問題就出現在更大的能指範圍，作爲現實主義文學下的鄉土文學，究竟是殖民地台灣的鄉土文學還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鄉土文學？鄉土文學的論戰儼然開闢出兩個戰場，並且強力執行鄉土文學所欲闡述的重點。即，儘管鄉土文學在不同的詮釋下，有不同的解讀，文學卻在其中不惜犧牲了其他形式存在的可能，而台灣話文則在論戰中，企圖成爲一種新的語言，並且被賦予新的意義。

然支持台灣話文的同時，則必須面對台灣話文記號的問題，使得鄉土文學論戰中再闢出台灣話文的子戰場。且語言系統的複雜性更甚於文學中心理念的陳述，而在這個子戰場中，又不必然與支持鄉土文學的立場相等。因此，如果沒有龐大的意識型態作爲立論支撐則必顯得疲於應戰。參見無論是就鄉土文學提倡的支持或反對，再加入了語言的因素之後，各家論點顯得紛雜，這或許也揭示了身爲殖民地的台灣人在面對祖國與殖民地現實認同分裂的焦慮。<sup>215</sup>

但是出人意料地是雙方陣營皆主張以「大眾文藝」爲共同追求的理念，卻在詮釋上竟是產生相當大的差異，而這樣的詮釋焦慮其實在二〇年代的新舊文學論爭就可見端倪，可以說是一種論爭的典型。如新、舊文學論戰其間，舊文人不見得就全然是顛預無知的冬烘先生，但是接受了世界思潮洗禮的文學青年，回台之後當然找舊文人開刀，發生了第一次殖民地內部的論爭。以階級的

---

<sup>214</sup> 引自拉康，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商務，2001）頁425。

<sup>215</sup> 如由陳淑容的研究中便提醒了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研究者需注意到如黃石輝、鄭坤五等鄉土文學支持者是「舊文人」出身，而以無產大眾支持者廖毓文、朱點人等卻反對台灣話文的有力者。這的確是值得觀照的一個面向，但是陳淑容的研究似乎忽略了以所謂集團性格區分的同時，集團內部甚至是單就個人也可能呈現的分裂，如以黃石輝早期參與詩社的經歷，似乎理所當然可被規劃爲舊文人此一區塊，但舊文人本是社會較爲上層階級，具有接受新知的機會，且在左翼刊物的傳播下，當然有接觸到左翼思想的可能性，況且黃石輝日後身居文協分裂後的要職，因此，鄉土文學論戰的產生也象徵著殖民地台灣內部因爲認同的焦慮而呈現分裂的現象，這也是本文所欲釐清的觀察重點。

觀點解讀，鄉土文學論戰引發的可以說是知識份子走出文協外的另一波鬥爭。

在面對黃石輝與郭秋生對鄉土文學提倡之時，隨後發文的毓文、點人或許是因為過於急切表達立場，論述則相對顯得陷入主觀的意識之辯。如企圖以中國地方文學收編顯然是與支持台灣人寫台灣文學的立論相悖，但是亦如上文所言及，如果以意識型態作為發言的立場，立論或許有獲得一致的可能，但若把語言置於雅俗之辨的主觀意識中，又容易淪為意氣之戰，然而，這又或是每一場論戰無可避免的交戰、觀戰位置。雖然毓文在〈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中強調其「所要反對先生用台灣話文做文寫詩者，並不是俗與不俗、雅與不雅」<sup>216</sup>，但是其文刻意舉出台灣話文粗鄙字眼為例，其暗示性則不言可喻。

而先生所在指的價值也不知道是在指什麼價值？若說言語能夠完就言語的職能就是價值，那末〈老太婆〉裡的「大人呵！索子來解開啦！要活活縛死麼？不解？好！我就來哭哭出氣。我苦喂！我苦喂！……」……先生，爾也說這有價值麼？<sup>217</sup>

但是黃石輝毓文的回應也出現了急躁地反駁，認為即使是粗話也是有文學價值的可能。

毓文先生引出伍人報的〈老太婆〉裡的一段話……以為這是鄙俗沒有價值的，其實這是他的錯誤。原來無論什麼言語，一經上了文學家的筆鋒便有發生文學的價值的可能。……若要一味把鄙俚的言語刪掉，那還成得什麼文藝呢？<sup>218</sup>

<sup>216</sup> 參見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原刊《昭和新報》140、141號，1931年8月1日、8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65～68。

<sup>217</sup> 引自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原刊《昭和新報》140、141號，1931年8月1日、8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67～68。

<sup>218</sup> 引自黃石輝：〈我的幾句答辯〉，原刊《昭和新報》1931年8月15日、22日、29日，連載

雖然這在文學理論上確實可能存在，但是一味把粗話放入相互回文的內文中，則顯出雙方較為情緒化的一面，而且〈我的幾句答辯〉一文尚只是黃石輝針對反對者陣營的第一篇回文。<sup>219</sup>因為對方欲以中國文學收編台灣文學的立場明顯不同，於是黃石輝在對毓文所學的台灣粗話之例，則以諸如《水滸傳》中的粗話回應。針對〈再談鄉土文學〉一文的回應除了毓文外，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讀黃石輝君的高論〉、點人〈檢討「再談鄉土文學」〉、〈檢一檢「鄉土文學」〉基本上不脫毓文觀點，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的前半段便是陷入個例與通例互駁的循環中。詳見下表：

表格 2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伍人報》，1930，8.16~9.01			
↑ 回應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台灣新聞》，1931，7.7			
↑ 回應			
黃石輝：〈再談鄉土文學〉，《台灣新聞》，1931，7.24			
↑ 回應	↑ 回應	↑ 回應	↑ 回應 及 ↑ 自我回應
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昭和新報》，1931，	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讀黃石輝君的高論〉，《台灣新民	點人：〈檢討「再談鄉土文學」〉，《台灣新聞》，1931，8.20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台灣新民報》，1931，8.29、9.27

三回，收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 72。

<sup>219</sup> 在毓文一文於《昭和新報》發表後，黃石輝立即亦於《昭和新報》回文，雖然亦有克夫、點人對黃石輝「鄉土文學」一文回應，黃石輝也一一回應，但在時序上〈我的幾句答辯〉是較為早的一篇。而且在隨後毓文於《昭和新報》發表〈鄉土文學的檢討——再給黃石輝先生〉後，黃石輝立刻也針對毓文發表〈鄉土文學的檢討——再答毓文先生〉回應，就此展開雙方陣營一系列針鋒相對的文章。

新報》，1931， 8.1、8.8	論》，《台灣新民 報》，1931，8.15	點人：〈檢一檢 「鄉土文學」〉， 《昭和新報》， 1931，8.29	
----------------------	--------------------------	---	--

↑ 回應

↑ 回應

↑ 回應

黃石輝：〈我的幾句答 辯〉，《昭和新聞》，1931， 8.15、22、29	黃石輝：〈鄉土文學的再 檢討給克夫先生的商 量〉，發表處不明 <sup>220</sup>	黃石輝：〈和點人先生談 枝葉〉，《台灣新聞》， 1931，9.3
		黃石輝：〈給點人先生一 為鄉土文學問題〉，《昭 新報》，1931

↑ 回應

毓文：〈鄉土文學的檢討一再給黃石輝先生〉，《昭和新報》，刊行日期不詳，  
1931，8.31 完稿

↑ 回應

黃石輝：〈鄉土文學的檢討一再答毓文先生〉，發表處不明<sup>221</sup>

除此，在第一波的鄉土文學論戰中可以關注地是郭秋生對於台灣話文的議題，是較為專注性地討論具體的可行性，相對於黃石輝所引發的連鎖回應，未見指名回擊郭秋生的文章，或許是因為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台灣話文是論戰中的子戰場，但不必然一定要與鄉土文學掛勾？

#### 台灣鄉土文學和台灣話文、原來是截然兩件問題、為什麼偏要掛上

<sup>220</sup> 根據陳陳淑容：〈附錄一：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關係文獻目錄（1930～1934）〉，此篇出自《昭和新報》，收入氏著：《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師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論，【民】九十）頁 167。

<sup>221</sup> 根據陳陳淑容：〈附錄一：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關係文獻目錄（1930～1934）〉，此篇出自《台灣新聞》，收入氏著：《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師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論，【民】九十）頁 167。

鄉土文學的招牌、而打著台灣話文的混仗？<sup>222</sup>

因此，在第一階段的鄉土文學論戰中，毓文、克夫、點人等針對黃石輝的鄉土文學做回應，卻不見對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建設回應，明顯地欲切割這一部份。如克夫所指稱，他支持鄉土文學，但是反對台灣話文。

我的意見不外是反對再建設一種的台灣白話來創造台灣文學，若能夠把中國白話文來普及台灣社會，使大眾也能懂得中國話，中國人也能理解台灣文學，豈不是兩全其美！<sup>223</sup>

在此處看來，克夫的立論沒有攻擊台灣話文，就辯論的策略而言，不算錯誤。但是反對台灣話文的鄉土文學，並不強烈回應郭秋生提台灣話文一案，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台灣話文打著台灣大眾語言的旗幟，若欲挑戰大眾則顯得與大眾為敵，是不智之舉，於是舉出粗鄙的台灣話為例，藉以暗示台灣話文的「俗」，而刻意忽略郭秋生台灣話文提案的具體性，但黃石輝則亟欲與將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劃上等號，則形成鄉土文學論戰的複雜面。

就學理上而言，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絕對可以從定義上分別討論，但放在一起討論，則會回到究竟什麼是文學的大課題。客觀而言，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一則是文學的課題，一則是語言學的課題，皆各成系統，放在一起便是一個政治議題，似乎無法釐清彼此錯綜複雜的連結。

於是再從台灣話文議題的相關面切入鄉土文學論戰，以致力於台灣話文最著名的郭秋生為主要觀察對象，可得知郭秋生推動台灣話文的運動起因於解決台灣人的文盲病，這一點和台灣二〇年代推動新文學運動的主旨是相同的，差異地是郭秋生並不贊同移植中國白話文運動的經驗，而是提倡台灣話文。

---

<sup>222</sup> 引自張深切：〈觀台灣鄉土文學戰後的雜感〉，《台灣新民報》，971，1933年11月3日。

<sup>223</sup> 引自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讀黃石輝君的高論〉，原刊《台灣新民報》，1931年8月15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79。

雖然白話文的較淺白有代替文言文的可能，但其沒有記號台灣語的能力也就是沒有可解決台灣人的文盲病了。<sup>224</sup>

郭秋生洋洋灑灑細說中國歷朝文字的流變，便是爲了指出言文乖離的現象，再導入特殊環境下的台灣人，深受殖民地制度之苦，造成普遍性文盲，爲了解決台灣人的文盲症，首要便是推動最容易讓台灣人理解的台灣話文，這和胡適的「我手寫我口」如出一轍。但是郭秋生反對白話文，認爲的理由便是白話文並不是紀錄台灣話文，而台灣人使用的是台灣話文，於是舉出中國歷朝言文乖離爲例，「終於專門化能越超大眾知識，爲識文字當求目的的。」<sup>225</sup>於是在確認了提倡台灣話文的必然性之後，郭秋生開始建構其台灣話文的工程。

第一步是定義台灣話文，「什麼叫做台灣話文？對這命題捷說一句，就是台灣語的文字化啦！」<sup>226</sup>定義了台灣話文，之後便是書寫的問題，對於台灣話文的書寫，有漢字、新字、拼音等多種派別，郭秋生則主張以漢字作爲台灣話文字化的工具。

台灣既然有固有的漢字，而這漢字任是什麼樣沒有氣息，也依舊是漢民族言語的記號，所以理論上或可簡便易寫的拼音字替代難解的漢字，但實際上這恐怕不是容易的工作，所以我要主張台灣人使不得放棄固有文字的漢字，又不可不將固有的漢字來記號台灣語寫成台灣話文。<sup>227</sup>

<sup>224</sup>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原刊《台灣新聞》，1931年7月7日，連載三十三回。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46。

<sup>225</sup>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原刊《台灣新聞》，1931年7月7日，連載三十三回。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4。

<sup>226</sup> 參見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原刊《台灣新聞》，1931年7月7日，連載三十三回。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47。

<sup>227</sup> 引自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原刊《台灣新聞》，1931年7月7日，連載三十三回。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48。

以推廣台灣話文的文字化運動，普遍化自然是必要的工作，作為語言載體的文字，可以何種形式推動，郭秋生認為「編讀物做公學校的教程自然是無望的」<sup>228</sup>而歌謠是最可行的推廣方式。

所以吾輩說，當面的工作，先要把歌謠及民歌照吾輩所定的原則整理整理，而後再歸還「環境不惠」的大多數的兄弟。<sup>229</sup>

如果中國白話文是向中國文言文下戰帖，那麼台灣話文則是欲樹立台灣本地的白話文地位，強調台灣話文是大眾使用的語言，貼近台灣人民的庶民語言。若是以「雅」「俗」作為反對立場的疑慮，那必然是與台灣最大的語言使用群眾為敵，也可以預見日後的政治正確性。

普羅文學是以勞苦的廣大群眾為對象呢？還是以前衛鬥士為對象呢？如果要以前衛鬥士為對象，勿論是沒有需要到鄉土文學的，而且他們所切要的是戰術上的理論，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民族問題、世界革命情勢的調查、報告等等……於狹義的文學，卻不是切要的。所以我想，普羅文學的對象是在於環繞著我們的勞苦的廣大群眾。這麼著、主張普羅文學的人，就不該反對鄉土文學了。<sup>230</sup>

黃石輝成功的把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掛勾，有成為一種相等式的可能，即從尋求對鄉土的認同中，團結全體的台灣人民。從「鄉土文學」的定義開始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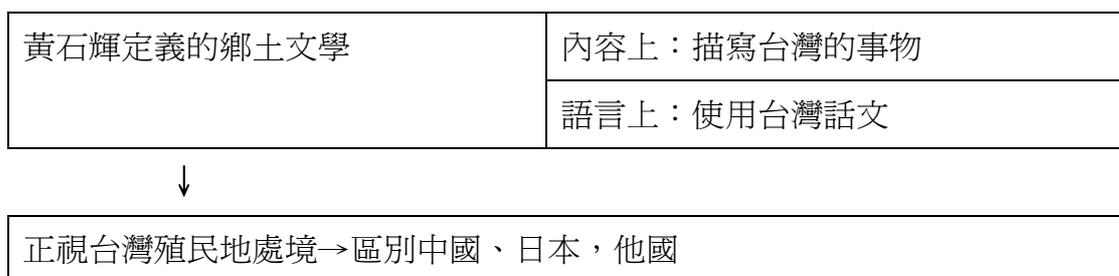
---

<sup>228</sup> 參見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原刊《台灣新民報》，1931年8月29日、9月7日，連載二回。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92。

<sup>229</sup> 引自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原刊《台灣新民報》，1931年8月29日、9月7日，連載二回。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93。

<sup>230</sup> 引自黃石輝：〈鄉土文學的檢討一再答毓文先生〉，發表處不明。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10。

方人馬紛紛就自己的意見提出看法，一如本節前文所言，誰定義的鄉土文學才是「鄉土文學」？而台灣話文究竟能否準確地與鄉土文學劃上等號？在論爭者的操作中，台灣話文與台灣這塊土地顯然是命運共同體，加以鄉土的定義，似乎可以大膽地推論出下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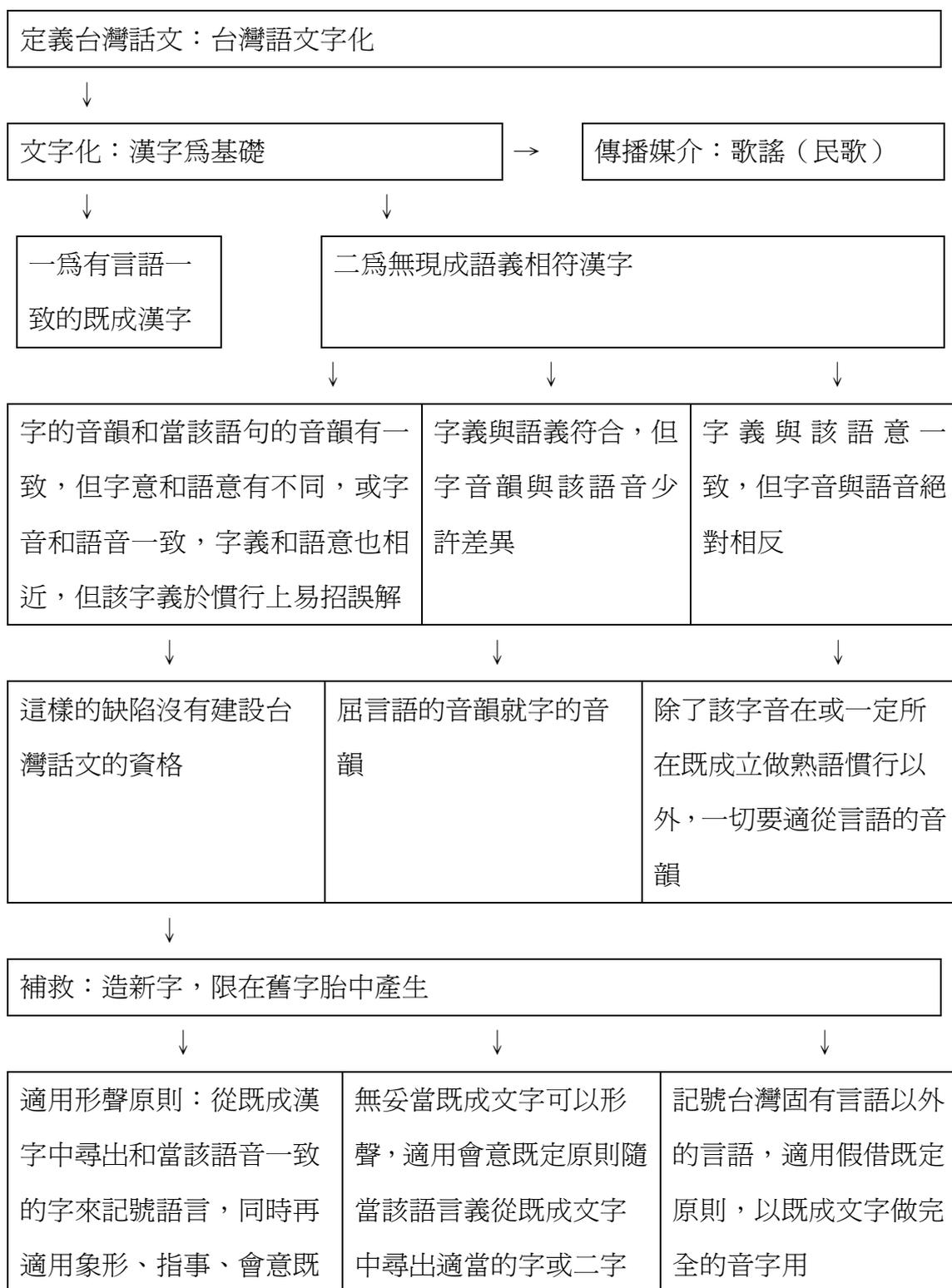
黃石輝企圖以鄉土文學團結台灣人民，同時尋求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於是必須在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中，追求最大的共同點，而這個共同點便是要凸顯作為殖民地台灣人民有別於殖民統治者以及其他國家。因此，台灣的土地、台灣的人民，便是最直接的區別，而使用台灣話文的特徵，區分了同樣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日本人。

然而在論爭的過程中，顯現了其他更複雜的面向。在論爭的過程中，為了穩固自己的立論，很容易以「否定」作為攻擊方式，那麼攻擊變成了辯論中最好的防衛。最常見的攻擊方式，往往是簡化彼方的所有論述，而忽略了自我論述的疏失與缺口。如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單是如何定義鄉土文學，便成了各家論述不一，但卻自認同各自定義的鄉土文學。

而書寫鄉土文學所使用的語言更成了論戰的另一焦點，如克夫所支持的鄉土文學，語言的使用為中國白話文，那麼，這兩者的台灣鄉土文學，究竟是否足以劃上等式？是否使用台灣話文、又該如何使用台灣話文，就足以構成更龐雜的另一論題。在三〇年代這一波鄉土文學論戰中，則各家分別以各地腔口等更為細瑣的議題，作為質疑建立台灣話文統一的可能性，但卻無法有效提出更為健全的台灣話文或其他話文的建構。若檢視贊同台灣話文的支持論者中，郭秋生是較具體的提出執行方式主要論述者，下文試將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論述

整理為表二：

表格 3：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建設結構示意表



定形態偏旁冠腳	或三字來合做別一個會意字，以表現當該語義同時註明當該語音以通行	
---------	---------------------------------	--

台灣話文和鄉土文學即使分別討論，也會出現是否會被收編的可能，就鄉土文學而言，台灣算不算中國的一部份「鄉土」？但是台灣如果拒絕被收編，又是一種討論的方式，雖然各方各派各自堅持。然而，就台灣話文而言，同樣會出現哪一種口音才是「台灣話文」的定義困難。

就郭秋生建構的論述來看，也不是沒有缺口，如，台灣話文本身就具有各地更細微的口音差異問題，於是黃純青則主張以廈門音做標準，從統一言文、統一讀音、講求語法、整理言詞等開始執行；<sup>231</sup>在文字的選取上黃純青則亦同意使用漢文作為台灣話的載體。

台灣話文的語音在黃純青的分析中有五種：泉州、漳州、客話、福州、廣東，而把日語使用者區分為大和族與今稱原住民使用南洋語系的高砂族排除在台灣話文之外，若是在今日看來，這樣直指台灣話文的使用族群未免傷及族群融合的情感。在台灣話文的書寫媒介上，主張漢字表義，於是有「屈話就文」的看法，這一點郭秋生顯然是不贊成的，在郭秋生台灣話文的論述中，是允許在漢字的胚胎中增加新字，這一點郭秋生也以〈讀黃純青先生的「台灣話改造論」〉<sup>232</sup>回應。至此也展開台灣話文的另一波論戰。

<sup>231</sup> 參見黃純青：〈台灣話文改造論〉，原刊《台灣新聞》，1931年10月15日、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6日、27日、28日，十四回連載。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21~143。

<sup>232</sup> 參見郭秋生：〈讀黃純青先生的「台灣話改造論」〉，原刊《台灣新民報》，1931年11月7日、14日，二回連載，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59~167。

### 第三節 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台灣話文論爭與新字問題

黃石輝一篇〈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引起台灣鄉土文學的論爭，接續的郭秋生以〈建設「台灣話文」〉回應之，遂延伸出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彼此牽扯的關係，而直接就台灣話文為主題回應的則是黃純青〈台灣話改造論〉後續才有更多篇章是針對台灣話文作為討論對象。從黃純青的文章看來，其對台灣話文書寫問題整理出兩派的理論：

甲、「取音不取義說」甲說，用羅馬字寫台灣鄉音，非常便利，極其徹底。

乙、「用漢字寫台灣鄉音說」乙說，利用漢字來寫話文，極其妥當。

鄉音雖雜，有話不患無字。假使無字，可以另做新字。<sup>233</sup>

前者顯然是指蔡培火主張羅馬字一說，乙者則是針對郭秋生的建設台灣話文而來。看來黃純青亦不認可此二種說法，對羅馬拼音，黃純青表示多數人會有漢文滅亡的疑慮，對於乙說則表示造新字的不便，「不如屈話就文，利用熟字」。黃純青並且主張應該以廈門音作為標準的台灣話文，為了可以達到統一的效果，且採另做新注音的方式。而注音的方式則有種方案：一，日本的阿伊音、二，中國注音字母、三，羅馬字。至於台灣話文的語法，黃純青亦費了一定的篇幅討論之，目的就是要強調統一台灣話文的可行性。隨後楊碩鵬亦發短文抒發台灣話文爭論的看法，將其歸納為四類，即蔡培火為羅馬拼音一派、黃純青廈門音為標準的言文一致派、黃石輝與郭秋生的鄉土文學派以及毓文、克夫、點人的反對派，<sup>234</sup>大致反應出當時台灣話文論爭的輪廓。

在黃純青發文之後，所獲得的回應顯得較為熱烈，其中包括黃石輝以及郭

<sup>233</sup> 引自黃純青：〈台灣話文改造論〉，原刊《台灣新聞》，1931年10月15日、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6日、27日、28日，十四回連載。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25。

<sup>234</sup> 參見楊碩鵬：〈台灣話改造問題〉，原發表處不明，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45~146。

秋生也發文回應之。黃石輝的立場是與郭秋生一致的，所以對黃純青主張不該另造新字而提出反駁，「若是能夠拒絕新字的產生，言文一致的事業便不能成功了。」<sup>235</sup>對於黃純青標榜以廈門音為台灣話文的標準音也是存疑的態度，「說要用廈門話做標準，我想是不合宜。若是僅僅音腔的關係，卻就不必另外標榜三字『廈門音』了。」<sup>236</sup>可見台灣話文在討論上連選取的研究對象（即台灣話文的使用者）都出現落差，如進一步把問題細微化、個體化。因此若要把台灣話文當成通例的討論對象，往往會出現許多個例的反駁，容易淪為族群勢力的角力。見郭秋生在回應黃文中亦表示台灣漢族人口百分之八十四為福建人，「事實福建人用的言語早既成立，做台灣人的標準語，若單指台灣話，誰也知道那是指福建語而言了。」<sup>237</sup>

在黃純青發文之後引起的迴響，大都止於台灣話文中是否該造新字的問題，另外則是廈門音統一音腔的問題，這兩者正反雙方言語交鋒，但無一定論，而採以新字不宜過多的結論，暫告妥協。但另外需注意地是黃純青提出台灣話文改造論的同時，指出其功效之一是「南進兮國是，可以促進」顯然是受了統治者的大東亞共榮圈思想影響，可以發現政治力對人民思想的影響。

台灣話文的議題本可以與鄉土文學切割討論之，但是黃石輝往往將二者掛勾，使得往後參與討論的論述亦將二者一併討論之，如林鳳岐的〈我的改造台灣鄉土文學的提案〉明顯地出現無法掌握確切的論述，甚至指出鄉土文學有的主張白話，有的主張羅馬字等話語出現，<sup>238</sup>分明是把鄉土文學的載體究竟是中國白話文還是羅馬字放進鄉土文學的命題中討論，陳述顯得粗糙，但或許正呈現一般民眾對於鄉土文學論爭的印象，大致呈現一種模糊地輪廓。

之後對於新字的問題，可以說是在台灣話文中的另一子題，針對台灣話文

<sup>235</sup> 參見黃石輝：〈對「台灣話改造論」的一商榷〉，發表處不明，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47～152。

<sup>236</sup> 參見黃石輝：〈對「台灣話改造論」的一商榷〉，發表處不明，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47～152。

<sup>237</sup> 參見郭秋生：〈讀黃純青先生的「台灣話改造論」〉，原刊《台灣新民報》，1931年11月7日、14日，二回連載，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59～167。

<sup>238</sup> 參見林鳳岐：〈我的改造台灣鄉土文學的提案〉，原刊《台灣新民報》，1931年12月5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85～186。

是否另造新字則出現許多篇章討論新字問題。除了黃純青認為新字不宜過多之外，亦有許多篇章是確切提出新字的疑問作為探討的個案。在郭秋生的部分，一如前文所整理，郭秋生認為推廣台灣話文最佳的策略就是對歌謠進行整理，以歌謠的方式作為傳播的媒介，推廣新字也教育民眾，而歌謠採集之後以最善的方法註明新字的字音。<sup>239</sup>

或許是因為本身是小說家的緣故，對於文字的掌握特別敏感，因此對新字文提首先提出個案與郭秋生討論的是賴和。賴和認為新字創造有必要性，但是是不得以的情況下。

新字的創造，我也是認定一程度有必要，不過總要在既成文字裡尋不出「音」、「意」兩可以通用的時，不得已才創來用，若既成字裡有意通而音不諧的時候，我想還是用既成字，附以旁註較易普通。<sup>240</sup>

其餘如「厚」字，賴和認為此「厚」字即有「彼得其情以厚其欲」之意，不必另造左「糸」右「乎」（讀音「乎」，意「給」）等，對幾個新字表示不同的看法。在同一篇章中（同為《南音》一卷三號）也刊出郭秋生的簡單回應，表示新字不免有不妥的地方，但總是不能放棄嘗試。且在《南音》一卷四號中，郭秋生針對賴和提出的單字問題，便有較為詳細的討論，如郭秋生也同意「厚」字可通，「但和『被』字的內在意義比較，似乎有點不大自然之嫌」<sup>241</sup>。在一卷四號《南音》中黃石輝則亦表示「在可能的範圍內，會得將既成的文字拿來用較好。」<sup>242</sup>但是亦未排除造新字的可能，如「沒會」則認為是一個字，造出上「不」下「能」的一個新字，抑或用「沒」字代理等。

---

<sup>239</sup> 參見郭秋生〈說幾條台灣話文的基礎工作給大家做參考〉，原刊《南音》，1932年1月1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223～225。

<sup>240</sup> 引自賴和：〈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原刊《南音》，1932年2月1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249。

<sup>241</sup> 參見郭秋生：〈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給賴和先生〉，原刊《南音》，1932年2月22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267～268。

<sup>242</sup> 參見黃石輝〈新字問題〉，原刊《南音》，1932年2月22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269～271。

基本上原則是音義相通的漢字為主，若是無法找到音義相通者，黃石輝認為則該造新字，不可屈就漢字，如「挖」的字音為「烏上聲」不符合台灣話文，則以左「手」右「威」取代之，讀音則會似台灣話的「威」，用「手」旁表示字義有「挖」之意。

另有李獻璋發文表示台灣話文的建設也可從中國白話文甚至是文言文中去尋找適合的文字。例如文言的「夫」可以讀做「翁」的台音代、「妻」可以讀做「某」的台音，如此也可免做上「口」下「可」（郭秋生造此字代替「要」字）來放棄「要」字。<sup>243</sup>一向與郭秋生站在同一陣線上的黃石輝，在新字問題上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在可能的範圍內，會得將既成的文字拿來用較好。而中國的白話文中所採用的新代字，咱在可能的範圍內亦是應該儘量採用才好。……不用「个」而用「的」，完全不是悖謬，是給台灣話文和中國話文不致懸隔太遠的用意。最好是將中國人所採用的新代字和固有的有合意義的舊字找來換讀台灣語言。<sup>244</sup>

從文字的選取使用上，可以發現這一群致力於台灣話文的知識份子對於文字有迫切地使用焦慮，儘管都認同台灣話文存在的必要，甚至是願意身體力行地將台灣話文推廣，但是在面臨文字的選取上不免洩漏了其個人可能源自不同的起點但卻同樣顯現的焦慮模式。

我們稱之為文字的，是具體的話語從語言中借用的物質支撐。

這個簡單的定義意味著語言並不與在講話的主體中服務於他的各種身體和心理功能相混淆。<sup>245</sup>

<sup>243</sup> 參見李獻璋：〈新字問題〉，原刊《南音》，1932年3月14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273～274。

<sup>244</sup> 黃石輝：〈新字問題〉，原刊《南音》，1932年2月22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269～271。

<sup>245</sup> 引自拉康，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商務，2001）頁425。

拉康在提及書面語言的時候，認為其特點在於其文本的主導性，不給讀者出口而是入口，藉由佛洛伊德拉康將凸顯了分析者在文學世界中所扮演的一個角色是，建立精神分析的理想地點。<sup>246</sup>在此處不必然使用精神分析，但卻適當提供觀看鄉土文學論戰中，知識份子們對選取語言的相對性，而在賦予台灣話文選取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之後，其承載的媒介—文字更是凸顯了選擇語言（即台灣話文）的意義。因此，就算是同樣認可了台灣話文的正確性，在文字的表意上，卻仍顯得紛亂，這便是因為接受各種資訊下的知識份子要建構出自己的語言書寫系統，並不是一件無中生有的是，而是必須依靠某一種語言所習慣被承受的載體作為一個可替代性的選擇，而這個選擇的多樣貌，恰凸顯了在選取的过程中所必須面對的政治考量。

簡略地說，當知識份子正為台灣話文的載體所困擾的時候，是因為他們意識到失去載體的焦慮，如漢文滅亡論的說法也正興起，於是到底要不要保留漢文？保留了漢文又似乎與鄉土文學相悖？雖然這不應該被放在一起相提並論，但是為了執行的政治正確性，台灣話文顯然已經脫離不了鄉土文學，而台灣話文成了最適合鄉土文學的載體。此時已經不論中國白話文或其他語言是否足已呈現鄉土文學，而是已經選擇了台灣話文作為標準體，於是開始有不同的疑慮出現，如賴和提及幾個用字的個案，到底是自創的左「糸」右「乎」新字好？還是「厚」？還是就用「給」？

這批知識份子在提倡台灣話文的同時，由於一定的程度上已經摒除了中國白話文，所以新字的問題勢必成為另一個角力的戰場。但是文字何其多，每一個個例都可能破壞尚未形成的通例，這也是為什麼討論到新字問題，大家總是一個字一個字的討論，究竟某個音又取那個字，最能精確表示。往往有人提議了某字，確有更多反對的意見，於是又淪為黃純青所擔憂的新字過多的問題，於是郭秋生才在造新字的但書上註明，造新字需要從舊漢字的胚胎中衍生。但往往有人會認為在漢字中已經有足以適當表明台灣話文的字形，這些漢字系統

---

<sup>246</sup> 參見拉康，褚孝泉譯：《拉康選集》，（上海：商務，2001）頁 424。

中不乏白話文甚至是文言文，這樣反倒又回到是不是該使用台灣話文，形成了一個相當複雜的子系統。

從索緒爾的觀點解讀，所謂的新字是爲了打破舊有的能指與所指的關係，企圖成立新一組的能指與所指，如「給」義的能指是「給」，但是提倡台灣話文者，則認爲「給」不能顯示「給」義，至於哪一字可以取代「給」，就成了眾所探討的焦點。如賴和建議以「厚」取代原本的「給」，則「厚」成了「給」的能指，「給」成了「厚」的所指。但如此不必然可以說服所有使用台灣話文的人，於是有其他能指陸續出現，那將會形成一個不符合索緒爾公式的能指與所指，不斷造新字的結果，可能是能指大於所指，而能指之上恐怕會出現更大的能指，結果可能是造成更龐大的失語症。

創造新字，若是符合了台灣話文的音義，但會造成另一個難題，就是在辨識度的困難度增深，這樣反倒失去提倡台灣話文是爲了解決台灣人的文盲病症的初衷了。而回到用字系統，若是摒除漢字，以羅馬字替代，表因不能表義似乎可以增加學習的速度，但是意義呢？這樣純粹記音的方式需要重新學習，而且可能得不到知識傳播的重要關鍵。於是新字的使用在台灣話文提倡中成了另一個難解的習題。因此，在討論台灣話文中，亦出現許多篇章是直指新字問題，試參見下表：

表格 4 討論新字問題主要篇章

黃純青：〈台灣話文改造論〉，《台灣新聞》，1931，10.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十四回連載
--

↑ 回應

↑ 回應

↑ 回應

黃石輝：〈對「台灣話文改造論」的一商榷〉，發表處不明 <sup>247</sup>	郭秋生：〈讀黃純青先生的〈台灣話文改造論〉〉，《台灣新民報》，1931，11.7、14	小野西洲：〈讀台灣語改造論〉（一），《語苑》，二十四卷十一號，1931，11.15
		小野西洲：〈讀台灣語改造論〉（二），《語苑》，二十四卷十二號，1931，12.15

回應 ↑

黃純青：〈與郭秋生先生論台灣話改造論〉，《台灣新民報》，1931，11.21

回應 ↑

郭秋生：〈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謹呈黃純青先生〉，《台灣新民報》，1931，11.28、12.5

郭秋生：〈說幾條台灣話文的基礎工作給大家做參考〉，《南音》，1932，1.1

賴和、秋生：〈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南音》，1932，2.1

回應 ↑

郭秋生：〈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給賴和先生〉，《南音》，1932，2.22

回應 ↑

黃石輝：〈新字問題〉，《南音》，1932，2.22	李獻章：〈新字問題〉，《南音》，1932，3.14 黃純青：〈新字問題〉，《南音》，1932，3.14
---------------------------	--

回應 ↑

<sup>247</sup> 根據陳淑容：〈附錄一：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關係文獻目錄（1930～1934）〉，此篇出自《台灣新聞》，收入氏著：《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師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論，【民】九十）頁167。

黃純青：〈新字問題〉，《南音》，1932，4.2

李獻章：〈新字問題〉，《南音》，1932，4.2

黃石輝：〈言文一致的零星問題〉，《南音》，1932，4.2

從以上篇章可以發現，不單是就台灣話文的建設作為討論的對象，而是同意執行台灣話文建設後，該以怎樣的模式去執行？於是衍生出許多「新字問題」，每一個新字都可能是一個問題，而新字如何來？那是每一個台灣話音要轉載成台灣話文的模式，可以說有多少台灣話音就有多少台灣話文，其中該怎麼轉載，每個字都可能成為討論的對象，重點是缺乏政治力的強迫執行時，就算是創造了一套完整的台灣話文字系統，其流通率又有多少？起初提議建設台灣話文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台灣人民的文盲病，但若是台灣人根本沒有機會接受這套台灣話文字系統的訓練，創造更多言文合一完美的新字也是徒然。

其他的回應則以負人發表於《南音》的〈台灣話文雜駁〉論述較具有完整性，並且可觀照《南音》此時成了台灣話文論戰的主要刊物，從「台灣話文討論欄」的設置看來，《南音》是有企圖把島上各方討論台灣話文的意見集合在同一刊物上討論。

……過去所有一切討論的內容已經是十分複雜，時間又經過四五月日的工夫，那堪得各人的意見又分做三四種的報紙發表…所以除起這個問題特別有關心的篤志家一一搜羅出來研究以外，恐驚一般讀者，或者尚未有徹底明瞭……所以在這個極其薄弱的小雜誌內，也敢大膽來創一角仔「台灣話文討論欄」……互相來討論研究……<sup>248</sup>

因此，在《南音》創刊後，許多討論台灣話文的篇章也集中在《南音》發

<sup>248</sup> 敬：〈新字問題〉，原刊《南音》一號，1932年1月1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89~190。

表，可參見表格 3。在〈台灣話文雜駁〉一文中，首先便指出黃石輝與毓文根本就不是在同一個面向討論「鄉土文學」，前者是「完成台灣話文，建設台灣文學」，後者則從歐洲文學考察「鄉土文學」之意，<sup>249</sup>其他就語言的發聲腔口的問題提出「順它的自然的進化、生長」是較中肯地回應。

用漢字取義寫台灣話，叫做台灣話文。……如果台灣話是中國的方言，台灣話文又當真能夠發達下去的話，還能夠有一些文學的台灣話可以拿去貢獻於中國國語文的大成，略盡其「方言的使命」。<sup>250</sup>

從負人的雜駁中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中立的選項，其間負人也舉了日文吸收漢文為例，佐證其語言進化論，就理論上而言，這樣的說法似乎較為可行。

對於負人的雜駁，黃石輝只有簡略地稍做回應，重點在於反駁明弘提及「大同團結」而反對鄉土文學，宣稱「大同團結」是無產階級的需要而不是要求，並且宣稱自己不為無產陣營所限制發言，<sup>251</sup>對於整個台灣話文論爭並未提出新的觀點。

隨著《台灣新民報》三二年之後的日刊出土，「大家所認定在一九三二年結束的，有關『鄉土文學論爭』的諸家論文，竟然大量地刊載在《新民報》上」<sup>252</sup>提供了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第二波論戰的資料，但是由於資料過於缺乏，以致於這部分的論爭只能大概勾畫出一個輪廓，但卻也延伸了這次鄉土文學論戰的戰線。

三〇年代鄉土文學的第二波論戰，掀起討論的是貂山子在《台灣新民報》

---

<sup>249</sup> 參見負人：〈台灣話文雜駁〉，原刊《南音》，1932年，1月1日、15日，2月1日、22日，5月25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191~221。

<sup>250</sup> 引自負人：〈台灣話文雜駁〉，原刊《南音》，1932年，1月1日、15日，2月1日、22日，5月25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209。

<sup>251</sup> 參見黃石輝：〈答負人〉，原刊《南音》，1932年6月13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299~301。

<sup>252</sup> 語見中島利郎，參見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序》（高雄：春暉，2003）頁2。

所發表〈對建設台灣鄉土文學的形式的芻議〉一文，<sup>253</sup>引起越峰的回應，隨後貂山子又回應之。

從越峰反對的觀點看來，貂山子是欲採用「中國的國音字母，來代替漢字」<sup>254</sup>，估計只要一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學會，但是越峰以自身學習國音字母的經驗對此並不認同。除了學習時間不見得可以速成之外，「最講不通的就是國音字母只有字音而沒有字義」<sup>255</sup>因此，越峰認為如果要推行國音字母，不如推行中國白話文。

中國白話文雖然不是台灣言文一致的文學，但我卻敢相信是和台灣話最親近的文學。尤其是由我們台灣人的手裡出來的作品，在可能的範圍內，還使得其比中國人的作品更近於台灣化。……種種和台灣的語言隔離較遠的字句，我們都可以不用。……中國白話文，是有字義的存在，故無論漳泉、還是粵人寫的文學，我們都皆看得來。

256

可得知越峰是爲了反對貂山子的國音字母而發文。而貂山子也隨後發文回應，以建設價值大的文學爲論述基礎，而價值大的文學便是大眾可賞讀的文學，而大眾可賞讀的文學又建立在台灣的鄉土文學，若因此而建立起各族各派的文學也無不可。至於能否創造出台灣的標準語，貂山子對此是肯定的態度，把台灣話的腔調簡化爲只有漳、泉二腔，所以推翻了台灣是否要有標準語的問題。至於音標字無意義，也被貂山子化缺點爲優點。

<sup>253</sup> 此文未見。

<sup>254</sup> 參見越峰：〈對「建設台灣鄉土文學的形式的芻議」〉，原刊《台灣新民報》，1933年9月5日、9日，二回連載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333~336。

<sup>255</sup> 參見越峰：〈對「建設台灣鄉土文學的形式的芻議」〉，原刊《台灣新民報》，1933年9月5日、9日，二回連載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335。

<sup>256</sup> 引自越峰：〈對「建設台灣鄉土文學的形式的芻議」〉，原刊《台灣新民報》，1933年9月5日、9日，二回連載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335~336。

音標字一個綴音與從來的漢字一個字才同是一個詞。因有這樣的關係不能非難音標文字沒有意義，而且沒有意義才是音標文字的長處，就是能夠以沒有意義的二、三十個字母來表現無限數的言詞，這是從來的漢字完全比不上的。<sup>257</sup>

這樣的說法倒是和主張羅馬拼音字母的主張異曲同工。而回擊的越峰僅以若是國音字母通行，那中國何以不使用國音字母即可，以及國音字母就如五十音寫出的日本文學一般，「不限要讀的時候費手，就是要明白意思的時候也是很費手的。」<sup>258</sup>而是否可以用國音字母完整表達台灣話也是一個存在的問題。

而且若要採用國音字母來代替在來的漢字，就要有統一台灣語言的必要。<sup>259</sup>

如果台灣不能統一字音，那麼表音系統的國音字母對於台灣各地腔口不一的台灣話亦很難讓人一目了然，若是統一，那又該以何種口音為主？像這樣的問題不只是採國音字母的系統問題，而是整個提倡台灣話文時所要面對的一個大課題，無論使用哪一種系統，都必須面對台灣各地腔口不一的台灣話文字化。

因此，台灣話文和鄉土文學依舊是無解之題，各方各派都不能說服對方，其間亦有清葉等人持續對鄉土文學發表意見。

我想廣義上來解釋鄉土文學：固有的解釋是將鄉土文學歸為田園文

---

<sup>257</sup> 引自貂山子：〈就鄉土文學問題答越峰先生的異議〉，原刊《台灣新民報》，1933年9月13日、15日、18日、19日，四回連載，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343。

<sup>258</sup> 參見越峰：〈就鄉土文學問題再談幾句的管見〉，原刊《台灣新民報》，1933年9月23日、25日，二回連載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353~355。

<sup>259</sup> 引自越峰：〈就鄉土文學問題再談幾句的管見〉，原刊《台灣新民報》，1933年9月23日、25日，二回連載，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354。

學、農民文學裡，我卻不這麼認為。我認為田園文學、農民文學是鄉土文學的範圍之一，當然都會文學也是……從這鄉土產生的所有文學，我主張稱為台灣文學。<sup>260</sup>

清葉在此處表達的看法，已經是具有較大範圍的容納鄉土文學，而且進一步把所有的台灣文學與鄉土劃上等號，認為所有的台灣文學都是台灣這塊土地所孕育，當然都是鄉土文學，然而，這樣可能避免中國地域文學的收編嗎？如果鄉土文學的範圍可以寬廣，那麼更大能指的中國文學可否容納台灣地域性的鄉土文學？

基本上第二波的鄉土文學論爭除了國音字母被新提起之外，其他的問題都依然接續前一波的論點，甚至連參與討論的人也是同一批，在越峰與貂山子的國音字母論辯之後，克夫、邱春榮、賴明弘也接續第一波的火力，繼續反對鄉土文學的台灣話文，回應的人依然是黃石輝與郭秋生，討論的議題不脫第一波論戰，至此，鄉土文學論戰可以說是走進了一個循環的命題。

#### 第四節 小結：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自我內耗

將目光鎖定於鄉土文學論戰一脈上，台籍菁英的社群結構可以觀察出各自價值觀交錯的階級所呈現之意識型態。在同一個社群中所追尋的是一種彼此的價值認定，正如台灣的民族運動可被區分為激進的立即革命左派、革命時機尚未成熟的漸進左派、可與資產階級合作的調和左派、中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合作的中間路線、本身為資產階級可與執政統治者維持利益平衡的右派等，使得文化組織啓蒙路線受到殖民統治者的壓迫時，菁英的反對勢力依勢遁入文學的論爭，消耗精力在台灣內部的鬥爭中。

<sup>260</sup> 引自清葉，吳枚芳譯：〈具有獨特性的台灣文學之建設—我的鄉土文學觀〉，原刊《台灣新民報》，1933年9月4日，收入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328～329。

如果可以把鄉土文學看成是台灣文學的焦慮象徵，那麼也許就可以有效理解何以鄉土文學論戰一再重複發生。把鄉土文學論戰看成是一種焦慮象徵，將有助於理解，何以這批知識份子對於鄉土文學的議題可以持續不斷爭辯，甚至無視於陷入無止盡的循環當中。

當文學被訴諸於本土，土地變成了唯一的依靠，爲了是宣示「我們」有別於他者，但是卻也凸顯的被切割爲他者的自我，在茫茫無所措中尋求自我的認同。這也是何以鄉土文學被要求連帶台灣話文一起討論，因爲台灣話文成了「他者」的一種特徵，有別於殖民帝國的語言系統，並且可以進一步企圖排除血緣祖國的收編，先不討論拒絕收編是否可以成功，但卻是一種拒斥祖國的象徵，以解被遺棄被迫成爲殖民地的傷痕。

台灣話文成了驅散焦慮的一帖藥劑，卻也確認了鄉土文學成爲台灣文學的「神經性焦慮」，那麼終其歷史也將無以擺脫焦慮的形式，這可以從台灣文學一再發生鄉土文學論戰史上得到印證。國家意識構成之前，台灣還在爲了「鄉土」意識的紛擾而無停止的時間表，繼續使用土地作爲國家認同的必要前提，而原鄉是必須投向腳下的那個地點，更遠的地方只能放在神主牌上，漸漸被不斷湧出的新世代埋葬在腳下，甚至塵歸塵也沒有尋訪的煩惱。

## 第五章 論爭的中結：政治力介入下的文學行動

日本殖民統治台灣五十年，至今其殖民政權也已離開逾五十年，留給台灣的是什麼？或者應該問的是，殘餘的是什麼？這個在楊克煌眼中「比較脆弱的資本主義國家」<sup>261</sup>已經離開的日本及其人民在二次大戰後，除了極力讓經濟復甦之外，讓日本沒有空去反省這些殖民地所殘餘的是什麼？

日本前殖民地的改造工程直接移交給主要由美國以及稍後的冷戰地緣政治所形塑的盟軍勢力。1945年後的日本因此得以建立一套從戰敗到去軍事化。從復甦到經濟奇蹟的歷史敘述，並規避了相關的殖民問題。<sup>262</sup>

面對二次的世界大戰，日本是不是有足夠的反思能力，這並不是本章欲處理的問題，因為放置眼前的事實是，日本首相小泉依舊不顧輿論的壓力，依然故我去參拜靖國神社，這樣的領袖其反省度令人可議。<sup>263</sup>但是身為曾經是殖民地的台灣，卻不能不去思考被殖民過後的所殘餘的究竟是什麼？而那些殘餘是一種繼承，還是拋不開的幽魂，繼續纏繞著殖民地台灣，儘管台灣已經不是殖民地台灣，也實行民主政治，更以選舉的方式選出自己的總統與國會代表，但那些關於殖民地台灣的殘餘，是不是依然暗示著台灣仍然沒有走出殖民地傷痕？

本論文的主題是台灣鄉土文學論爭的徵狀結構，政治原本不該是討論的核心，但是因為台灣獨特的殖民地經驗，以及一再重演的鄉土文學論戰，使得本論文非得去檢視那些關於殖民地經驗下所造就的文學結果。而本章也將尋求出一種關於論戰所可能的中結，需要特別關照的是本章所提出的論戰中結，並不是一種結束的可能，可是較可能近似於被迫暫時終止的可能。而這個終止來自

<sup>261</sup> 參見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台北：海峽，1999）

<sup>262</sup> 引自荊子馨，鄭力軒譯：《成爲日本人》（台北：麥田，2006）頁30~31。

<sup>263</sup> 根據BBC中文網頁所記載，儘管《朝日新聞》在2005年6月所做的民意調查有52%的受訪者反對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反對的理由則是「要考慮到周邊國家」及「靖國神社有甲級戰犯」等，但小泉自2001年就任以來，每年都前往參拜。參見：[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620000/newsid\\_4629000/4629075.stm](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620000/newsid_4629000/4629075.stm)

於政治力的介入，一旦政治力的影響消退或者轉換，則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勢必又起，則將不斷重演一切的論戰，直到不能收拾的廝殺，僅能再以政治力強勢或委婉終止論戰，直到有人願意再提出問題思考，而論戰將永遠持續，直到台灣內部出現一種絕大多數的民族想像共同體，而不再討論分化的可能，使得鄉土成為唯一的政治正確。或者是唯一的認同，或者是找到比台灣鄉土更大範圍的認同，諸如政治勢力的強行同化，在遺民不世襲的狀況下，強力斷絕任何思考的可能下，取代另一次的同化運動。

試想，如果台灣始終由日本統治，而皇民化運動也持續進行，到了廿一世紀的今日，台灣人也不會出現認同的危機，較大的可能是就以血換血，理所當然認同內地（按指日本），本島人也無須再去思考關於鄉土的議題。因為政治力的影響下，也不會出現更樂觀的可能，抑或者是台灣將由某一政權長期統治下的結果，所謂鄉土便是執政當局所認可的鄉土，也無須斤斤計較哪裡的鄉土，哪裡的文學。政治正確下，就是好的文學，所謂的文學審美觀留在政治議題下，悄悄浮動吧，若要影響，恐怕也是難以撼動政治力這棵大樹，過個幾十年，政治正確也成了根本正確，那時論爭也將有終止的可能。

## 第一節 遁逃的政治運動

從日本佔領台灣開始，台灣內部便經由成立「台灣民主國」等形式<sup>264</sup>企圖自救，避免被日本統治，當然一個毫無準備獨立的行政系統，是無法與邁進現代化行列的日本相抗衡。

「台灣民主國」成立後……義軍四起，火藥局及軍裝、機器局每天動工者八 00 餘人，但因沿海沒有海軍協守，僅海岸炮台十四座，陸軍僅百營，

---

<sup>264</sup> 雖然楊克煌認為「台灣民主國」的成立是基於「雖對清政府出賣國土和人民的罪行極為憤慨，但對祖國的熱愛毫未減少或動搖。台灣被清廷割讓既已成為事實，台灣人民自己不得不宣布自主，這種自主並不是離開祖國的懷抱，因此聲明『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這種表現了當時台灣人民的極其矛盾的痛苦心情和極其堅定的衛國決心」，參見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台北：海峽，1999）頁 37。這一派的說法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本文傾向於社會學的解讀，純粹就一個社會結構遭受到瓦解之時，所產生的恐懼心態，而藉由一個或多重組織來維持既有的秩序，與結構。

兵員總數不到 35000 人，且民兵及新兵占多數，形式孤單，防禦力量顯得較薄弱。<sup>265</sup>

於是短暫的「台灣民主國」失去了存在的空間，<sup>266</sup>台灣人民依然沒有放棄自救的行動，於是展開另一波武力的反抗，直到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的發生，台灣人民的武力抗爭才暫告一段落。

為期二十年的武裝抗日運動，一般多以一九〇二年台灣總督府派軍突襲已「歸順」日本的林少貓，並消滅雲林地區的抗日義民為界限，再劃分兩個階段。<sup>267</sup>

而這兩個階段，分別是以「台灣民主國」作為第一階段，<sup>268</sup>第二階段則是以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五年的民眾起義為主。<sup>269</sup>台灣人民會抵抗初來乍到的日本人，這是可想而知的，因為當一個社會結構已經穩定存在之時，若有另一股勢力急於進駐，並且打破舊有的權力結構，那麼原本的社會必定感到恐慌，而意識到原來「自己」本身就是一種「結構」，也就是經由外在勢力的介入，提醒了原本既有存在的勢力結構。

當時參加武力抗日的份子，除了少數逃兵、土匪混雜其中趁火打劫之外，

<sup>265</sup> 引自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台北：海峽，1999）頁 38。

<sup>266</sup> 施家順將「台灣民主國」的潰散原因歸為以下：「一，基層不穩、民心游移。二，軍心不固、軍紀鬆散。三，將帥不和、缺乏鬥志。四，主帥二心、伺機內渡。」等四項。關於更詳細「台灣民主國」潰散的原因可詳參施家順：《台灣民主國的自主與潰散》（高雄：復文，1995）

<sup>267</sup> 引自黃秀政：〈台灣武裝抗日運動〉，收入《台灣史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民】八十一）頁 176。

<sup>268</sup> 根據吳密察先生的考究，對於「台灣民主國」的成立，似乎還可以看做是「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觀念的一個個案」，是「馬關議和交涉的延長」，為的是「訴諸第三國之干涉，企圖改變馬關條約中割讓台灣之規定的構想，是以後成立『台灣民主國』之設計裏一個非常重要的理念。」詳參吳密察：〈1895 年「台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收入《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 11~54。然而，這個成立經過有一個條件是與清廷是否參與其中有關，若單就台灣方面而言，恐怕「民意」的部分並未思考更多更深層的部分，譬如尋求第三國的協助與干涉等，而可能只是較為單純地依靠自己當地的力量，逕行拖延日本領有台灣的事實。

<sup>269</sup> 參見：〈台灣武裝抗日運動〉，收入《台灣史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民】八十一）

主要則為保衛鄉土的「義民」及地方上的富豪私兵。他們所以不計生死地與日本現代化武力抗戰到底，民族意識、戰爭仇恨都是主藥的因素。此外，另有一重要原因則是對於「社會變遷」的不能適應而生抗拒。<sup>270</sup>

所謂「社會變遷」便是前文所言，一個既有的社會權力結構遭受到破壞，於是這個原本的社會結構才會意識到本身即為一個社會結構、社會群體，以自我來區別於他者。顯然地，日本在這個時候是為一個他者的身份，強行介入台灣原有的社會結構，所謂的「台灣」意識，恐怕也是因為社會勢力結構的破壞而產生的吧。尤其是地方仕紳一向與官府維繫著良好的互動，一旦外在的、陌生的統治力量出現，難免會對這突如其來的勢力產生反抗的行動，作為相抗衡的一種表現。而傳統社會中的仕紳，原本就是這既定結構中的中上階層，因此會支持台灣的民族抗日運動也是可以被期待的，因為這些仕紳既有的勢力也將因為未知的新統治力量而可能遭到削減甚至破壞。

當然土制的武力反抗是敵不過接受現代化的日本軍隊，僅軍事武器的火力維持便需要龐大的財力灌注，這對於台灣人民的自力救濟顯得異常困難。而殖民統治者也看見了本地仕紳的疑慮，於是舉辦各種活動，藉以收攏本地仕紳的心，諸如勳章的頒發、揚文會的舉行等，都可以看做是一種統治階層的策略。而隨著本土的武力抗爭失敗，對於民族仇恨心情激動的第一代遺民也漸漸老朽，取而代之的是新興的領導階層，這些接受新式教育的新興領導階層，不再以武力對殖民統治抗爭，於是才會進入另一階段的「非武力抗爭時期」。<sup>271</sup>

成長於二〇年代的台灣新青年，在見識過世界湧動的思潮後，或者可以樂觀地說，台灣這一批新青年開始產生以民族自覺為出發的「台灣」意念。

自新民會與《台灣青年》出現後，在日本各地台灣留學生所組織之學生團體都由過去「高砂青年會」改稱為「台灣青年會」，由日本式的名稱改

<sup>270</sup> 引自張正昌：《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台北：通美印刷，【民】70）頁3。

<sup>271</sup> 亦有一說為「政治抗日運動時期」，參見黃秀政：〈台灣武裝抗日運動〉，收入《台灣史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民】八十一）頁176。

為台灣式，此證明台灣留學生的思想已由同化主義轉變為民族主義……

272

從連溫卿的說法可以想見，當時留學於中、日的台籍留學生確實是意識到本身深為殖民地人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在經由現代化教育的洗禮之後，反思到整個台灣前途。於是《台灣青年》等刊物也隨之出現，而諷刺地是這批殖民地青年在台灣當地無法承辦這樣的刊物，但在殖民母國的內地卻可以，也讓這批青年見識到現代化的重要性，與民主的啓蒙。

隨著二〇年代新世代的青年出現，舊有的台灣仕紳在與殖民地統治者維持著一股曖昧的關係中，也顯示出與這批新青年在思想上的矛盾。前言提及，殖民統治者爲了拉攏舊有的勢力階層，以便於更容易管理或者說是維持台灣當地的權力結構，以致於產生許多曖昧的情況。甚至連日本人也參與詩歌的吟哦，以表示對中國舊有文化的素養，藉以拉攏舊文人的情感意向，這對於見識到新世界的台灣新菁英顯得尷尬。於是醞釀出另一股勢力，即爲由張我軍等所發起的二〇年代新文學運動，這個運動本身雖是針對那些舊文人成天吟唱詩歌，不明新世界的指責外，另外有相當大的成分也是對舊文人與統治階層的曖昧關係提出深刻的抗議，藉以建立新的文學價值觀。

當時充斥台灣文壇的舊體詩，集中了舊文學因循守舊、追求形式、束縛思想等弊端，已逐漸成為日本殖民者用以推行懷柔政策的一種媒介。因此，批判舊體詩人就是批判整個舊文學，也是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揭露和抗爭。<sup>273</sup>

大體上而言，支持張我軍的白話文運動者，不外以上支持的言論，因爲舊詩人與亟欲拉攏舊詩人的殖民統治者確實有著曖昧的關係，但是不是「批判舊

<sup>272</sup> 引自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民】77）頁45。

<sup>273</sup> 引自何標（張光正）：〈從白話新詩的崛起看台灣新文學運動〉，收入《蕃薯藤系兩岸情》（北京：台海，2003）頁220～221。

詩人就是批判整個舊文學」等同於「對日本殖民主義的揭露與抗爭」，恐怕還不能直接劃上等號。首先，批判整個舊文學對於新文學運動而言，是確切的，而抗議舊詩沒有新的生命活力也是確實的，但是不是直接就是向殖民統治者抗爭，恐怕還需要更直接的證據，才可能證實新文學運動對殖民統治者造成威脅。但客觀地說，殖民統治者確實是對舊有仕紳釋出善意，而故意忽略新文學運動的發起，採取冷處理的方式，而刻意維繫舊文人的影響力。

因而從啓蒙運動爲己任的新文學運動從此而生，而這個運動恰與《台灣青年》的發刊、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等開啓一連串「非武力抗爭」的運動時期。可以說是日據時期殖民地台灣第一次放棄武力抗爭殖民統治權的第一次轉變，希望從啓蒙爲出發，改變台灣人民的視野，提供更進一步的世界觀，讓殖民地內部自我覺醒的開始，其中「台灣」的民族意識可能也在其中醞釀成形。而其中《台灣民報》的發刊更是成爲島內外，台灣人民互通聲息的一個重要管道。

台灣革命運動團體，如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工友總聯盟、農民組合等，也都受過日政府的無理干涉和壓迫，屢遭拘押，或被強制解散集會結社。……僅有文化協會的機關報「台灣民報」……發行地點又是在東京市，所以，台灣總督府無權干涉……<sup>274</sup>

但是也由於文協的分裂，以致最後形成台共的外圍組織，造成台灣內部追求民族運動路線的分歧。可以說是，自二〇年代新文學運動以來，是企圖藉由文學運動的啓蒙帶動民族運動的思潮，當新文學運動豎立了一塊里程碑之後，隨之而起也是眾所盼望的民族運動應應而起，但也因爲民族運動的萌芽過程，眾人所接收的智識來源不同、出身背景的差異，導致台灣民族運動呈現多頭馬車的狀況，始以自我分裂作爲結束。

就像是一個永遠擺脫不了的循環一樣，當具有攻擊性的力量宣告危機之

---

<sup>274</sup> 引自黃師樵：〈新文學運動與白話字運動〉，原載於《台北文物》（二卷二號），現收入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民】六十八）頁 407。

時，執政當局也把一切看在眼內。新文學運動，並未吸引殖民統治者的收攏，但是引起密切觀察，直到台共的勢力進入文協，殖民統治者也意識到文協不僅只是文化運動，不僅是要台人提升自我意識外，還是一種政治運動，這已經造成統治者的不滿，越過了統治者的忍受底線，也因此發出對台共逮捕的指令。同時一方面被台共視為依附組織的文協，在黃石輝有意識操作下，點燃文壇另一次火花，即為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形成第二次台灣非武力抗爭下，由政治運動遁入文學運動的另一波勢力。<sup>275</sup>一如林瑞明先生所言：

在左翼政治運動遭到總督府當局的全面鎮壓，被迫轉入地下活動，左翼文學適時而具體的反映了台灣人民抵抗的心聲。<sup>276</sup>

雖然不能確定黃石輝所代表的文協，是不是要表達台灣人民抵抗的心聲因而發起「鄉土文學論戰」，但可以確認地是，黃石輝確實是代表了左傾之後的文協組織，並且確實是因為政治力的干擾，而以文協作為台共的外圍組織發聲，企圖避免殖民統治者的直接鎮壓。

## 第二節 鄉土文學論戰間及之後的文學社團發展

三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根據出土資料顯示，可以再區分為兩次，即第一次為黃石輝在《伍人報》所刊〈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為始，引起的論戰年份為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

根據陳淑容的研究主要的論戰發文集中在新聞報紙與雜誌，新聞報紙則是：《台灣新聞》、《昭和新報》、《台灣新民報》、《新高新報》、《台南新報》、《南瀛新報》；雜誌則集中在《伍人報》、《語苑》、《南音》、《台灣文學》等。第二次則以貂山子的〈對建設台灣鄉土文學的形式的雜議〉一文開啓另一波的鄉土文學論戰，年份則以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止，主要論戰園地為《台灣新民報》、

<sup>275</sup> 關於此波鄉土文學論戰請參本論文第四章。

<sup>276</sup> 引自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收入《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203。

《新高日報》，以及雜誌《福爾摩沙》（フオルモサ）等。<sup>277</sup>至於終結的方式陳淑容下了結論：

可以說，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乃是透過新聞紙、雜誌的提供版面而得以成為輿論。亦即，隨著媒體議論的形成，問題被提出討論；也隨著不同立場的媒體之間對立的微妙關係，論爭被擴大；甚至，因為議論媒體遭禁、或是言論的被封鎖、而使論爭不得不告終。<sup>278</sup>

從以上可得知，身為殖民地台灣的人民在言論上是受到監視與箝制，因此，也可看做一個中結，即鄉土文學論戰除了媒體各自闡述堅持的立場外，對於政治力的可能介入，卻無法大方表示抗議，而靜悄悄選擇中斷。

同時也可以觀察到，在文協分化之前，幾乎是島內知識份子所聚集的一個場域，然而至文協分裂之後，也可以顯見殖民地台灣內部的一種分化，而至鄉土文學的各自闡述，都可以觀察到各自背景知識養成的差異，所造成將鄉土放入對文學詮釋差異的意識型態。對於這一時期的文學與政治關係，許俊雅剖析：

一九三一年是一個重要的分界點。溯及一九二一年以還，幾乎所有作者皆參與台灣文化協會，他們視文學創作為社會啟蒙與抵抗殖民之利器，其參與政治、社會活動遠比文學創作積極。<sup>279</sup>

對此一現象，可以解釋為新文學運動自二〇年代開始，發展了十年也許是進入成熟期的階段，另外一種可能，也是本文所要強調的，即是政治力與文學的相互作用與牽制。在二〇年代初期，台灣青年為了肩負啟蒙的重責大任，而以知識的傳遞作為首要任務，刊物的發行成了傳播的最佳媒介，如「作島民言

---

<sup>277</sup> 參見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民】九十）頁 122。

<sup>278</sup> 引自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民】九十）頁 123。

<sup>279</sup> 引自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民】84）頁 68。

論之先聲」<sup>280</sup>的《台灣青年》。也因為刊物的發行，隨之而起的除了政經的言論之外，文學創作也開始萌芽。如張我軍與賴和在新文學開展期所做的努力，各自身體力行去實踐新文學的理念。但對於初期的文學創作，可以說是「作品之思想傳達遠甚於亦是氣氛」<sup>281</sup>，也因此文學創作在這一時期也被劃為「搖籃期」，但隨著媒介的文學作品增加，島內創作的人數也開始增加，從事政治運動者也隨著活動增加而運動漸熱，兩者可以說是齊頭並進。隨著政治活動的加遽，殖民統治者的政治勢力勢必不肯袖手旁觀，而祭出逮捕、停刊等強勢與柔性行動。

另一方面，隨著組織的日益壯大，成員的身份各異，思想也各異，而有了內部分化的可能，一九二七年文協的分裂即是最佳的實例。對此，本論文第三章已詳述，而黃石輝所發文〈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的政治動機也於第四章陳述過，此處便不贅述，只是再一次強調，發文者的背景知識都是影響發文的重要動機。而一九三一年成了一個分界點：

一九三一年，台灣民眾黨橫遭日本統治者解散；而其領袖蔣渭水復於是年病逝，此雙重打擊，對當時台省知識、政治界而言，不可謂不重。未幾，日本統治者全面搜捕台灣共產黨員，台灣左翼分子在這一年內幾乎一一落網，受台共領導的台灣農民組合運動亦銷聲匿跡，左傾之後的台灣文化協會遂一蹶不振。<sup>282</sup>

從此也可以看出政治力影響下的結果，知識份子遂從政治、社會運動又遁逃到文學運動，「鄉土文學」的論爭也可視為一種顯性徵兆，及知識份子在面對統治者龐大的政治勢力下所選擇的戰場。藉由對鄉土的闡述，而投入民族的想像，取代初期啟蒙運動，成為另一種新啟蒙運動。這一波不是針對知識的給予，

<sup>280</sup> 參見《台灣青年》（創刊號）（東京：台灣青年雜誌社，1920）（台北：東方文化書局重刊，【民】62）

<sup>281</sup> 參見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民】84）頁67。

<sup>282</sup> 引自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民】84）頁68。

而是強調民族想像的共同體，企圖藉由民族來圈住島內的人民，但是由於鄉土文學所牽涉的層面複雜，容易模糊焦點。例如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放入同一個討論的子題，顯得過於龐雜，其中又可區分為文學審美與文學形式的認同，加以語言的配合來形塑一個「台灣」，而單是語言的選取就足以讓鄉土文學論戰模糊所有焦點，而成為「雅」、「俗」之辯的另一子題。

而此時期也是文學社團林立的時候，何以此時文學社團得以林立，這與前文所述，知識份子從政治、社會運動遁逃進入文學運動有重大關係。除了加入鄉土文學論戰的報紙、雜誌，如《台灣新民報》、《伍人報》、《南音》、《台灣文學》等之外，其他重要刊物尚有《三六九小報》、《先發部隊》、《台灣文藝》等，可見此期文學運動的發展。

以《台灣新民報》而言，一直以來都是台灣日治文壇佔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份量，《台灣新民報》的前身是《台灣民報》，而《台灣民報》則是《台灣》雜誌所增刊，《台灣》雜誌的前身則是《台灣青年》雜誌。

《台灣青年》是成立於東京「新民會」的機關刊物，是以啓蒙為主要大任的團體組織，創刊十八期之後，更名為《台灣》，訴求不變，依然是尋求台籍知識份子的認同，且發行數僅有三千，影響層面可能侷限於新興知識份子群，爾後「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台灣》亦增刊《台灣民報》與「文協」互通聲息，其發刊動機也陳述如下：

一個大大的台灣，有三百六十萬的同胞，實在沒有一個代表我們的言論機關。……因此即有《台灣》雜誌的發刊。……因為紙數有限，漢和兼寫，人人的趣味，各不相同，像本誌現時的內容，恐怕難得各方面的滿足？所以自四月十五日起，欲發行一種半月刊，名叫《台灣民報》(THE TAIWAN MINPAO)，目的是要普遍，使男婦老少知道。所以平易的漢文，或是通俗白話，介紹世界的事情，批評時事，報導各界動靜……<sup>283</sup>

---

<sup>283</sup> 〈增刊《台灣民報》廣告〉，原載於《台灣》(第四年第三號暨第四號)(一九二三年三月、四月)

剛開始的《台灣民報》是以半月刊的形式發行，發行了七期之後（即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至九月一日）則改以旬刊的形式發行，後以週報方式發行，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始將發行地遷回台北，而至一九三〇年三月廿九日則以《台灣新民報》為名發行週報，至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則以日報形式發行，所影響的範圍更為廣大。因此，鄉土文學論戰也一定幅度在《台灣新民報》上刊載，可見期能見度與影響力。

作為台灣唯一喉舌的《台灣民報》，也是三十年代之前台灣新文學的唯一發表園地，它在艱難的環境中不只維護了民族的傳統精神，也培植了賴和以次一批有才幹的作家……<sup>284</sup>

作為「文協」相通鼻息的機關刊物，對比三〇年代台灣知識份子幾乎全部投入「文協」運作之下，《台灣民報》的影響力可見一斑。但隨著「文協」的分裂，《台灣民報》也轉型為《台灣新民報》，並且在賴和擔任編輯工作下，除了本身不斷發表的新作外，也刊登許多台灣新文學作品，以至一九四一年再度更名為《興南新聞》的日報形式。

在台灣總督府的強迫下，全島六家報紙——台灣日日報、台灣日報（台南新報）、台灣新聞、興南新聞、高雄新報、東台灣新報——統合為「台灣新報」，委由大阪每日新聞社派員經營。

……重要位置均由大阪每日派來的人員充任。當時的報社殆已失去言論機關的機能，既不容報社有一貫的主張，更不容記者有獨自的見解，同是做軍部的擴聲筒而已……<sup>285</sup>

<sup>284</sup> 引自梁明雄：《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台北：文史哲，【民】八十五）頁 340。

<sup>285</sup> 引自葉榮鐘：《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民】六十）頁 570、571。

而陪伴台灣人民度過逾廿五年頭的《台灣民報》系列，在無法自己經營之下，終於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廿七日停刊。

其他同時期伴隨鄉土文學論戰的重要刊物尚有《伍人報》，尤其是《伍人報》是刊出揭開鄉土文學論戰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的重要園地。而《伍人報》也反應了一九二七年「文協」分裂後，普羅文學刊物興起的一個重要關鍵，這也看成是黃石輝特意選擇在《伍人報》發文的重要原因。

伍人報社如此以王萬得的意思成立起來，它雖是以合法雜誌社成立，可是上舉的幹部未必都是共產主義者，如民族主義者黃白成枝，無政府主義林斐芳就是思想色彩比較明顯的人物，從此也可以窺見伍人報社意圖屬於何處……<sup>286</sup>

《伍人報》由王萬得與陳兩家、周合源、江森鈺、張朝基等五人出資合辦，故名《伍人報》，又取「忤人」諧音，有「嘲笑辯論」的言外意。至今則仍未見《伍人報》全貌，但可得知十五號後與「台灣戰線社」發起的《台灣戰線》雜誌合併發行《新台灣戰線》，但發刊期數不明，也因為發行人為楊克培與謝雪紅，期刊內容過於敏感，而遭禁刊。

「台灣戰線」自創刊以來共達四期，嗣因每期都被禁止，以致不得已只好停刊。然而當時共產主義運動正在高揚，發展，尤其是受了日本之普羅列塔利亞文藝運動勃興的刺激，乃致力於更生，計畫與正苦於陷於經營困難的王萬得之伍人報合併，昭和五年十二月遂新行組織「新台灣戰線社」，刊行「新台灣戰線」雜誌，可是仍依然連續被禁止發行……<sup>287</sup>

---

<sup>286</sup> 引自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292。譯文引自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民】77）頁 507。

<sup>287</sup> 引自台灣總督府警察局：《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刷）頁 293。譯文引自王詩琅譯註：《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民】77）頁 510。

因為發行的雜誌全被禁止發行，也就失去生存的空間了，自然「新台灣戰線社」也就自然消滅了。從此也可注意到共產主義在台灣發展的狀況，除了經殖民統治者的強烈取締後，勢力大減之外，其內部持續鬥爭的結果，也使得其組織大傷，自然也就逐漸消失於台灣的社會運動中。

鄉土文學論戰的另一重要園地則是《南音》，是由「南音社」所發刊。葉榮鐘提到發刊動機雖以「伶俐不足以忸舞昇平、志氣不足以運動，膽量不足以實行自殺」<sup>288</sup>玩笑之，但也點明此期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困頓。當然葉榮鐘隨後也表示期待《南音》作為一個「思想知識的交換機關」、「添一點文藝的潤澤」<sup>289</sup>等發刊動機，使得文藝思想更為普及化的功能性刊物，而秉持無私的精神發掘新文藝的作品與精神。

因此，《南音》也成為三〇年代台灣相當重要的刊物之一，創刊號即刊出屬名「敬」的〈台灣話文討論欄〉、「負人」的〈台灣話文雜駁〉以及郭秋生的〈說幾條台灣話文的基礎工作給大家作參考〉<sup>290</sup>。而《南音》也真如其發刊詞所言的無私精神，除了刊出〈台灣話文雜駁〉外，於第二期亦刊出「點人」、「毓文」、「克夫」的發刊祝詞，並且持續提供了一個鄉土文學論戰的發表園地，如黃石輝便於《南音》回文〈答負人〉以回應。整體而言，還是可以看出《南音》的走向是以提倡「台灣話文」為主體，一來是其創辦人之一為郭秋生，也在其中發表不少建議台灣話文的相關篇章，再則所謂「無產青年」也不選擇在「反動」雜誌上回應。根據黃邨城的回憶，《南音》才刊兩期就被指責為「專門唱高調的，毫無特點，是資本階級的娛樂刊物，是霧峰派的小嘍嘍」<sup>291</sup>這也是何以會有明弘在《台灣文學》發文〈兩個駁論〉中直指《南音》為「反動雜誌」<sup>292</sup>一說了。

<sup>288</sup> 參見奇：〈發刊詞〉，載於《南音》（創刊號）頁1。（台北：東方書局復刻本，「新文學雜誌叢刊」）

<sup>289</sup> 參見奇：〈發刊詞〉，載於《南音》（創刊號）頁1。（台北：東方書局復刻本，「新文學雜誌叢刊」）

<sup>290</sup> 以上篇章皆見《南音》（創刊號），頁9、10、14。

<sup>291</sup> 參見黃邨城：〈談談「南音」〉，原載於《台北文物》（三卷二期），現收入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民】68）頁341。

<sup>292</sup> 參見明弘：〈兩個駁論〉，原載於《台灣文學》（六月號，一九三二年六月廿五日），現收入中島利郎：《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303。

觀察《南音》發刊其間，雖號稱以無私精神發刊，但普遍上而言，多是以支持台灣話文爲主的文章爲大宗，而發刊內容也因爲刊出製糖會社剝削農民的詩，受到當局的「要注意」的警告，<sup>293</sup>第九、十、十二號被查禁，而十一號也成了休刊之作。整體觀察之：

《南音》並非在完全與台灣社會運動疏遠下創刊，應該可說是在與台灣地方自治同盟配合、而且接二連三被刪除與查禁的辛苦中，依然在台灣語文運動和創作上獲得相當成就的一本刊物……<sup>294</sup>

從河原功對《南音》的評價中可以發現其創刊立場，而從其支持台灣話文的立場，再與無產青年經由台灣話文的議題產生衝突外，也可以觀察到台灣社會運動在遁入文學運動下，也擋不住從「文協」分裂以來的集團鬥爭，顯示台灣知識份子自內部無從停止的不斷分化。

其他尚有一份雜誌也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提供了發表的園地，即爲發行三期即告夭折的《福爾摩沙》(フオルモサ)。河原功形容此雜誌是在立足於「中國白話文潮流的《台灣新民報》」與立足於「台灣話文潮流的《南音》」兩系統之外的新動向。<sup>295</sup>《福爾摩沙》是「台灣藝術研究會」所創辦的機關刊物，從施學習的〈台灣藝術研究會成立與福爾摩沙〉一文中可得知《福爾摩沙》創刊的目的之一是以「文藝改進事業為自許」、「重新創作台灣人的文藝」，後來也因爲資金的關係而宣告停刊。

除了提供鄉土文學論戰另一塊園地外，《福爾摩沙》也確實如其發刊宣言所指稱，促進了台灣文藝的發展。在維期三期的出刊下，便刊出了下列多篇小說，其中巫永福的作品〈首與體〉至今仍是一指標性作品，而吳希聖的〈豚〉更引起廣泛的討論，《台灣新民報》亦刊出許多評論的稿件，吳希聖後來也獲得台灣

---

<sup>293</sup> 參見黃邨城：〈談談「南音」〉，原載於《台北文物》(三卷二期)，現收入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民】68)

<sup>294</sup> 引自河原功，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北：全華科技，【民】93)頁178。

<sup>295</sup> 參見河原功，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北：全華科技，【民】93)頁182。

文藝聯盟獎金。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福爾摩沙》中刊出的作品是以日文為書寫工具，可見此時台灣青年也可以使用流利的日文，甚至使用在論爭及創作上，這也表示台灣在經過殖民統治近四十年左右，至少知識份子對日文已經可以運用自如了。這或許也正是何以河原功會指稱《福爾摩沙》走出有別於《台灣新民報》以及《南音》的路了，使得《福爾摩沙》雜誌在台灣文學史上佔有一座標性意義。

表格一 《福爾摩沙》一至三期所刊出的小說作品

落蕾	張文環	《福爾摩沙》（創刊號，1933年7月15日）
首與體	巫永福	《福爾摩沙》（創刊號，1933年7月15日）
龍	吳天賞	《福爾摩沙》（創刊號，1933年7月15日）
賣家	アルフオンス・ ドオデエ作 曾石火譯	《福爾摩沙》（創刊號，1933年7月15日）
蕾	吳天賞	《福爾摩沙》（第二號，1933年12月30日）
唐璜與加彭	王白淵	《福爾摩沙》（第二號，1933年12月30日）
納妾風波	賴慶	《福爾摩沙》（第二號，1933年12月30日）
豚	吳希聖	《福爾摩沙》（第三期，1934年6月15日）
黑龍	巫永福	《福爾摩沙》（第三期，1934年6月15日）
上弦月	張碧華	《福爾摩沙》（第三期，1934年6月15日）

此期重要的刊物尚有受到《福爾摩沙》創刊而成立的「台灣文藝協會」，這是一個有別於在東京成立的「台灣藝術研究會」，而在台北成立的團體，郭秋生為發起人之一的《先發部隊》。據《先發部隊》發刊宣言：

從散漫而集約、由自然發生期的行動而之本格的建設的一部前進，必是

自然演進的行程，同時是台灣新文學所碰壁以教給我們轉向的示唆。

我們以為唯其如此的行動，始足以約束新的劃期的發展到來，與期望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實際化。

我們已出發了。當不能因障礙多而解消內心的燃燒與信念的。我們敢不以「先發部隊」的精神自勵和使命自許，望目的地勇敢突貫。<sup>296</sup>

從《先發部隊·宣言》中可以發現，《先發部隊》是以台灣新文學的承繼為主要的目標，並且要以文藝創作做為台灣精神的展現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實際化。而且《先發部隊》在封面便標榜是一本「純文藝」雜誌，全部使用白話文，這一點與已停刊的《南音》確實有承繼的脈絡可循。而《先發部隊》有別於以往的印刷方式以橫式印刷，一如其刊名《先發部隊》，似乎是要引領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啓另外一頁。這一點從其闢「台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一欄，可看出其用心。「台灣新文學出路的探究」一欄則刊出黃石輝、周定山、賴慶、守愚、點人、君玉、毓文、秋生等人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見解，作多篇幅、一系列的探討，而《先發部隊》發行兩期之後，便遭到統治者的干涉，更名為《第一線》。

第二期則刊出「台灣民間故事特輯」，都可以看見「台灣文藝協會」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努力，及其意念仍以「民間文學」作為立足點，這與鄉土文學、台灣話文的提倡仍是同樣的要旨。

在台灣文藝協會大致可以看到郭秋生的《南音》潮流與廖漢臣、王詩琅之於普羅文化運動等兩個潮流，並在台灣新文學運動留下比以前更大的足跡。<sup>297</sup>

從鄉土文學論戰以來，郭秋生等台灣話文派念茲在茲的「台灣話文的文字化」，首要便是「採集過去的歌謠及現行的民歌」作為傳播的媒介，而民間故事

---

<sup>296</sup> 引自《先發部隊·宣言》（創刊號）（台北：東方書局，「新文學雜誌叢刊」復刻本）

<sup>297</sup> 引自河原功，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北：全華科技，【民】九十三）頁190。

恰符合了「鄉土文學」的宗旨。另外，更名為《第一線》之後，雜誌也開始刊出日文作品，由此不難看見統治者給的刊文壓力。

同時期，一個全島性組織的文藝聯盟亦在台中成立，即成立於一九三四年五月的「台灣文藝聯盟」。河原功稱其為「日本統治期間具有最大規模的台灣新文學運動」<sup>298</sup>，這樣的說法可根據賴明弘對「台灣文藝聯盟」的回憶，台灣文藝聯盟的誕生來自於台灣文藝大會。

我常常和深切、越峰、守愚諸兄及南北部幾位朋友談起台灣文學如何建立的問題，後來終於獲得一個明確的結論，那就是舉行一次全島文藝界同好的文藝大會。<sup>299</sup>

從賴明弘對「台灣文藝聯盟」的回憶中可發現，「台灣文藝聯盟」的創始大會是一個結合全島文藝青年力量所召開的會議，是由台中的張深切發出請柬，於台中市小西湖酒家召開台灣文藝大會迎接各地趕來參加的文藝青年，人數達八十二人，<sup>300</sup>甚至引起殖民統治者警察系統的注意，並有大批警員到現場戒備。

當日議長則由黃純青擔任，會議當天便通過〈台灣文藝聯盟章程〉，以「聯絡台灣文藝同志互相圖謀親睦以振興台灣文藝」為聯盟宗旨，聯盟的運作則以發刊雜誌、刊行書冊、開文藝講演會、文藝座談會做為推廣的事業，「文聯」成了台灣代表的文學團體，是年十一月「文聯」代表雜誌《台灣文藝》創刊。<sup>301</sup>《台灣文藝》內容則以二部區隔白話文以及和文篇章。

張深切則在日後的自傳《里程碑》中表示，「文聯」的成立「骨子裏是帶有政治性的」意義。

<sup>298</sup> 參見河原功，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北：全華科技，【民】93）頁190。

<sup>299</sup> 引自賴明弘：〈台灣文藝聯盟創立的斷片回憶〉，原載於《台北文物》（三卷三期，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民】43年12月10日）後收入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民】68）頁379。

<sup>300</sup> 參見賴明弘、林越峰、江賜金：〈台灣全島文藝大會記錄〉，《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一號）頁2。

<sup>301</sup> 參見賴明弘：〈台灣文藝聯盟創立的斷片回憶〉，原載於《台北文物》（三卷三期，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民】43年12月10日）後收入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民】68）頁378~391。

民國二十三年，賴明弘和幾位朋友勸我組織一個文藝團體來代替政治活動。我看左翼組織已經被摧毀，自治聯盟也陷於生死浮沈的田地，生怕台灣民眾意氣消沈，不得不決意承擔這個帶有政治性的文藝運動。<sup>302</sup>

而在《台灣文藝》創刊號上並無發刊詞，佐以十四則的「熱語」取代，其中不乏「最荼毒台灣的是台灣人的偽指導們」、「我們以有偽路線不如寧無路線」、「最惡毒的人最怕人議論」、「把台灣的一切路線築向到全世界的心臟去」等口號似的精神喊話，凸顯了《台灣文藝》的積極性。但是同期刊上邱耿光的〈創作動機與表現問題〉卻恰與「我們希望把這本雜誌辦到能夠深入識字階級的大眾裡頭去」的普羅意義相反，而以追求「為文學而文學」的目的上去。

隨即《台灣文藝》則在二卷一號的新年賀詞中表示，「我們的聯盟決不是一個有為的行動團體，同時也絕不是一個無為的無行動團體，我們是無為而有為，無行動而有行動的集團！況且我們的雜誌並不是『為藝術的藝術』的藝術至上派，『我們正是為人生的藝術』的藝術創造派」，<sup>303</sup>顯然《台灣文藝》在盡可能刊出所有投稿篇章的同時，也不斷強調發刊的立場性。

但是隨著發刊的投稿量增多，在刊物的文學作品選取上也有了路線的爭議，張深切在〈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一文中，並主張以「科學的方法研究分析」出台灣固自有讀「氣候、風土、生產、經濟、政治、民情、風俗、歷史」，「自然在於沒有路線之間，而會逐出一有正確的路線」<sup>304</sup>但以現今的眼光重看張深切的主張，以「科學」的方法創作文學，似乎忽略了文學審美的要求，而強調「為人生而文學」的功能上去，但顯然隨著文藝創作技巧日臻成熟，投稿作品的大增，很難要求每一篇作品都是秉持著「為人生而藝術」的主旨。在同篇文章當中張深切亦提到了楊逵，似乎也點出兩人論點不全然一致的看法，而楊逵後來果然也離開了「台灣文藝聯盟」，與葉陶另創《台灣新文學》雜

<sup>302</sup> 張深切：〈冷戰〉，收入《里程碑》（台北：文經社，1998）頁 609～610。

<sup>303</sup> 引自《台灣文藝·恭賀新禧》（第二卷第一號）頁 1。

<sup>304</sup> 參見張深切：〈對台灣新文學路線的一提案〉，《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二號）頁 78～86。

誌。日後張深切也坦承「《台文》為了適應時勢，不得不轉變為純文藝雜誌，從而文稿也由中文中心移轉為中日文並重，再由中日文並重變為日文中心」<sup>305</sup>，走向「純文藝」成了一種趨勢，也宣告儘管是以政治目的成立的「文聯」與《台文》也無可避免文學興潮反噬政治運動的結果。

雖然日據時期的文學雜誌多半不能久長，然《台灣文藝》自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創刊，至一九三六年八月廿八日停刊，共刊行了十五期之多，相較於《福爾摩沙》、《先發部隊》、《第一線》等短命刊物，《台灣文藝》的存在更是可貴。而《台灣文藝》也不負眾望刊出許多重要的文學作品，諸如張深切〈鴨母〉（創刊號）、懶雲〈善訟人的故事〉（二卷二號）、楊華〈薄命〉（二卷三號）、王錦江〈沒落〉（二卷九號）等中文作品，還有翁鬧的現存幾篇的小說〈歌時計〉（中譯：音樂鐘，二卷六號）、〈戇爺さん〉（中譯：戇伯仔，二卷七號）、〈殘雪〉（二卷八號）、〈哀れなルイ婆さん〉（中譯：可憐的阿蕊婆，三卷六號）等。

同時也可發現，在此時期雖然《台灣文藝》以創作語言分為白話文與和文兩部，但是在日文創作的部分上，台灣作者使用日語創作在此時不僅不遜色於中文白話文，甚至在質與量上都有超越中文白話文的趨勢，可見此期的日文作者已漸漸進入成熟的階段。

日文優越的原因，第一是台灣人受日文教育的多，當時的日本文學又比中國優越，文章優美流暢，作家易寫，讀者易讀，所以比較受歡迎。第二是日文已有統一性的語言作標準，中文不但還沒有統一性的白話文，台灣的漢文讀者看不慣白話文，還未達到能夠欣賞白話文學的程度。<sup>306</sup>

此處也點出，早在三〇年代引發的鄉土文學論戰，並不是隨著論戰的戰告一段落，台灣人使用語言文字的問題也一併結束，相反地，隨著日本殖民時間的久長，當日文逐漸取代漢文的使用率，更凸顯了漢文在台灣的「不合時宜」。

<sup>305</sup> 語見張深切：〈冷戰〉，收入《里程碑》（台北：文經社，1998）頁622。

<sup>306</sup> 引自張深切：〈冷戰〉，收入《里程碑》（台北：文經社，1998）頁623。

如果堅持使用漢文，那麼中國白話文與台灣話文的使用文字符號將再次產生取代性的問題，論爭又將回到原本的循環，直到論爭者精力消耗的輿論自然消失，或因強勢的政治力主導，將語言導入另一種政治取向的「國語政策」，而迫使舊有的文字或語言中止其使用性，論爭也就無從爭論起。

以「文聯」為例，機關刊物《台灣文藝》不負眾望吸引了大批的文藝作者投稿，然而也呈現了在新文學運動提倡之下，將近十餘年的努力與培養，台灣已經有朝純文藝寫作的成熟度，縱使「文聯」骨子裡是帶著政治性，也終避免不了這樣個趨勢。但也由於文學創作的成熟，也使得文學的功用論起了爭執，加上對於主導性的爭取，編輯群各自有所堅持，使得「編輯權」成為彼此爭奪的意念延伸的象徵。

《台文》的編輯偏重日文之後，便有一部分的民族主義作家不滿意張星建的編輯方針，有一個進入日本文壇的作家某生，為爭取編輯權，趁這機會，對星建加以猛烈的攻擊，進而標榜主義問題向我和編輯委員會挑戰。<sup>307</sup>

此某生應該就是後來離開「文聯」另創《台灣新文學》的楊逵。張深切自述為了不要讓日本當局有機會干擾刊物的發行，而堅拒把思想主義問題放入雜誌中，此舉也表示因為政治強勢而遁入文學活動的政治、社會運動，在統治者的勢力依然龐大的同時，文學運動很難與之抗衡，也因為政治的現實層面，文學創作便成了苦悶的象徵，追求純文學的創作似乎是文藝作家較為可行的道路。這恰將日據時期文藝刊物的發行壽命長短作了一個註解，除了經濟因素之外，最大的干預恐怕還是源自於政治力量的影響。

而「文聯」也在「日本政府更加壓迫」與「某作家故態復萌，策動離間」下，呈現解體的狀態。並在「州當局以強化報社，擴大協會組織為名」<sup>308</sup>取走

<sup>307</sup> 引自張深切：〈冷戰〉，收入《里程碑》（台北：文經社，1998）頁 623。

<sup>308</sup> 參見張深切：〈冷戰〉，收入《里程碑》（台北：文經社，1998）頁 628。

了出版權，致使「文聯」與其機關刊物瓦解與停刊。

離開「文聯」之後的楊逵便於一九三五年年底創刊《台灣新文學》，王錦江認為在《台新》的創刊詞中已經表達了對「文聯」和《台文》的主持人不滿之意：

我經過了千思萬慮，而所獲的結論是為了台灣的作家，為了讀書家，迫切需要著適應台灣的現實底文學機關。只是似乎誰也不願意給他們，作家以及讀者，到了這樣的田地，於是只有「積少成多」，集了自己們零碎的錢，來建設培養一個園地，而自勵自勉，自己鼓舞下去。這也就是『台灣新文學』的創成記。<sup>309</sup>

《台灣新文學》是楊逵脫離「文聯」之後所創辦，也因為楊逵在「文聯」其間無法達到講思想問題放入雜誌中，因此選擇脫離「文聯」，另創《台灣新文學》以實現自己的想法，用現實文學的路線鋪陳左翼的思想，藉以達到文學為人生而藝術的目的。然而觀看《台新》的編輯成員，有賴和、楊守愚、黃病夫、吳新榮、郭水潭、王登山、賴明弘、賴慶、李貞祥、高橋正雄、葉榮鐘、楊逵、田中保男，這樣的陣容與《台文》相差無幾，除了與楊逵有爭執的張深切、張星建外，劉捷亦未加入《台新》。

王錦江曾表示，之所以在資源如此困頓下，還要以幾乎相同的工作者，主持另一本刊物，就是要以實際行動強調對《台文》主持人的不滿。而楊逵確實也是以寫實主義精神創作文學作品，而此期也因為日文創作作品大增，相對之下，漢文的創作對於創作者而言，顯得較為陌生，不比日文的使用流利。因此，楊逵並曾經於《台新》第一卷第十期（十二月號）編輯一本「漢文創作特輯」，提倡漸趨於弱勢書寫的漢文創作，但遭以統治當局以「內容不妥當，全體空氣

<sup>309</sup> 《台灣新文學·創刊の言葉》，中譯引自王錦江：〈台灣新文學雜誌始末〉，原載《台北文物》（三卷三號，台北文獻委員會），收入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民】六十八）頁402。

不好」予以禁止發行。<sup>310</sup>

整體而言《台新》刊載了許多優秀的日文作品，如楊逵、張文環、吳濁流、呂赫若、翁鬧等都曾於其中發表作品，這些作家日後也都成爲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作家的成熟期代表。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出版六、七月的合刊號號，在經濟上已無法繼續負擔，共發行十五期的《台灣新文學》至此宣告停刊。

其他未參與鄉土文學論戰但也具一定程度影響的刊物尙有如《三六九小報》等刊物，《小報》在一九三〇創刊，其發行形式則是以每月的三、六、九日發行。其發行則以台南地區爲大本營的「南社」同人爲主。

《小報》的編輯群與襄贊者，主要是以台南府城的人士，其中包含傳統文人與新興知識份子，向周邊地區輻射開來，其中南社成員是《小報》支撐的骨幹……<sup>311</sup>

「南社」是南部最大的古典詩社，由傳統文人所組成，一如新舊文學論爭時所爭辯的，舊詩人究竟只是沈醉在吟哦的唱和中，還是真爲了保存傳統漢文的一絲血脈？但畢竟在二〇年代初，還是舊詩人爲主佔據了文壇的位置，那時台灣根本沒有新文學，因此新文學運動也帶給台灣文壇新的氣象，對於舊文人而言，不是不明白世界思潮的轉變，直至三〇年代所成立的《三六九小報》其內容豐富，而不侷限於「報」所必刊的新聞，相反地是多刊載或長或短的連篇小說，且不只有古典文學，其中還有「新知識」、「新笑林」等專欄，使用的語言則古典、白話兼有之。對於白話的使用，柯喬文則引用施懿琳先生的「府城人士社群」解釋爲「土著化」的過程。

南社早期，是由傳統文人所組成，到了春鶯詩社(1915)、桐侶吟社(1923)

<sup>310</sup> 該期作品篇目則是：賴賢穎〈稻熟病〉、尙未央〈老雞母〉、馬木歷〈西北雨〉、朱點人〈脫穎〉、洋〈鴛鴦〉、廢人〈三更半暝〉、王詩琅〈十字路〉、周定山〈旋風〉等八篇。另有兩篇日文小說，分別是黃有才〈淒慘譜〉、佐賀久男〈出奔〉等。

<sup>311</sup> 引自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2）頁51。

相繼成立時，「南社」，做為南部台灣最大詩社，其實已經含納接受清代書房與日治新式教育下的人士，然而，這群人追求漢文重振、堅持傳統性的原則，大抵是相同的，遂可以用學者施懿琳的「府城文人社群」一詞涵括，其具有特色鮮明的「區域意識」，是奠基於台灣從早期移民社會，逐步「土著化」(indigenization)的過程……<sup>312</sup>

可以理解地是，當傳統文人遇上的新興知識份子，除了新與舊的文學論爭所併發的火花，當新興知識份子不再為了佔據文壇的位置而向舊文人討檄，舊文人也是知識份子，當他們開始理解連他們孺慕的中國都早已開啓新文學運動，他們還該苦苦守舊、當永遠的遺老嗎？以《三六九小報》為例，也可看見舊文人在面對新文學所帶來衝擊下，對新知的認識與瞭解，雖然形式依然不以新聞時事做為評論焦點，但是文言、白話兼具的使用狀態，以及對「新知」的傳達，都代表了這一批舊文人在與新興知識份子融合下的所產生的新視域。或許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具舊文人身份者，如鄭坤五、黃純青甚至連橫都是相對支持鄉土文學的這一方。

他（指連橫）甚至認為台灣鄉土語言是實踐鄉土文學的根基，因此整理台灣語言是必需的工作。實際上，在黃石輝、郭秋生倡議台灣話文運動前，連橫早已著手整理台灣語言，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十一月、十二月連續發表於《台灣民報》上的〈台語整理之頭緒〉、〈台語整理之責任〉二文，清楚呈顯連橫藉此維繫民族精神於不墜，進以避免日語漸興、台語就消滅的危機。<sup>313</sup>

或者這也是今人該以另一種眼光觀看舊文人的時刻，而不再著重以舊文人

<sup>312</sup> 引自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2）頁 51。

<sup>313</sup> 引自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2004）頁 111～112。

與日人的曖昧作為唯一的批判考量，當然也不可遺忘日本據台初期與傳統文人間的唱和風潮。

日本領有台灣初期漢詩興盛，此與首批來台的日本官員有關。這批官員多擁有深厚的漢學素養，善於漢詩文寫作，經常又能寫得一手好書法；亦即具有中國慣稱為「儒」（或儒官）的教養。他們以北京語或漢字的筆談，與台灣紳商交驩酬唱。……領台以來日本來台官員、文士等，與台灣紳商學子們的詩文交流，於是被總督府全面性地運用來當作懷柔政治的手段，而且推進至空前的狀況。<sup>314</sup>

而當今更需要觀照地是新舊文學論爭有其時代背景，以及文壇勢力轉換等各種不同的考量因素，今人且不該再以偏概全討論舊文人，如稱指「舊文人」實乃新文學運動的影響，或者「傳統文人」更不帶有評價的色彩。在張深切自述中就曾經表示，為了「文聯」的機關刊物《台灣文藝》的發行，不得不四處請求募捐，而道：「所乞求的對象，居然多是我文藝大會所要打倒的所謂封建遺孽的和詩人和地方仕紳。就中使我最感動的是霧峰林幼春，這位被稱為老學究詩人，他不僅不念舊惡，而且表示十分誠懇地支持我們，約定每月可以有一定的金額資助雜誌的出版。」<sup>315</sup>可發現傳統文人並非一味迂腐，而只求與當權者保持友好關係，成日書寫風花雪月的不明時事，傳統文人在某一部份也呈現其原始保持漢文存在的價值核心，與對新思潮的認知與體驗。

另外，轉變從《小報》的稿源也可看出傳統文人企圖引新的端倪，《小報》的稿源大致來自五類：一為記者採訪，二為編輯員編輯，三為接受投稿，四為轉引他報，五為翻譯外電、外文。<sup>316</sup>其中記者採訪似乎較符合「報」的型態，而其餘各項也都有轉引新知的可能性，這也表示雖然是傳統文人，但是在面對

<sup>314</sup> 引自楊永彬：〈日本領台初期官紳詩文唱和〉，收入若林正文、吳密察：《台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台北：播種者，2000）頁110~111、162。

<sup>315</sup> 語出張深切：〈冷戰〉，收入《里程碑》（台北：文經社，1998）頁614。

<sup>316</sup> 詳參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2）頁53。

殖民地台灣新文學運動已逾十年的狀態下，傳統文人也展現其不畏新知潮流的心態，正面地觀看新文學所帶來的效應。雖然其「刊載的小說和新知識分子創作之小說，其精神顯然不同」<sup>317</sup>，這亦不難理解，以《小報》的風格存在於市場，就可從其市場性討論存在的可能，而「娛樂價值」勢必為市場考量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小報》的娛樂性使然，其小說則偏向純娛樂，或保留傳統章回小說的模式，已維持其市場取向，這與新文學運動以來的社會、文化運動取向當然不同。

而《小報》發行先後逾五年，在當時亦可說是長壽刊物，「因無帶有任何色彩，日人比較不嚴壓牠」<sup>318</sup>，而因經濟的因素<sup>319</sup>始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停刊，其長壽亦可見此期此類以娛樂為重的「小報」活躍狀態。

《小報》的停刊也預告台灣其時發行刊物的不易，《小報》停刊後，台灣文壇基本上就由新文學一派所接管。由前文所提之《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接踵而起所取代，這一時期，日文創作者也日漸達到一個水準，甚至漸漸也覆蓋了漢文的創作，也可見日文在台灣實際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看見新文學運動有成，已經不再是附庸於社會運動之下的工具，對於文學認知也臻於成熟，不再停留於啓蒙社會大眾的任務。

但因為經濟因素與殖民統治者政治力的介入，新文學刊物也一一停刊，緊接著七七事變的發生，使得台灣也被強迫進入戰爭的戒備期。而為了應付戰爭的需要，殖民地台灣需要培養對殖民母國一定程度的忠誠，藉以投入無預期結束的戰爭需求。皇民化運動肇因於此，台灣文學遂進入其殖民地的宿命，而與戰時體制掛勾，直接面對政治勢力侵入的壓力，文學此刻必須面對是否成為明示忠誠宣傳品的抉擇，下文將直視台灣文學在戰時體制下所引起的騷動。

---

<sup>317</sup> 詳參許俊雅：《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台北：文史哲，【民】84）頁77。

<sup>318</sup> 語見黃邨城：〈談談「南音」〉，原載於《台北文物》（三卷二期），現收入李南衡：《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民】68）頁339。

<sup>319</sup> 《小報》資本的收入以報費、廣告費為主，捐贈、潤筆為輔。詳參柯喬文：《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九十二）頁53、54。

### 第三節 決戰體制下的皇民化文學

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台灣總督府宣布禁用漢文，而《台灣新文學》也在一九三七年的六月十五發行六、七月合刊號宣布停刊。此時，除了《風月報》之外，台灣新文學以來的重要刊物都已一一停刊。而《風月報》是以通俗為主要基調的一本漢、和文並刊的雜誌，一如其刊名，是一本吟風弄月的大眾刊物，主編為吳漫沙，直至一九四一年改刊名為《南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隨即被日本殖民的台灣也進入戰時的戒備期，而歷經統治初期前七任武官總督：華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東貞美、明石元二郎等出身陸軍與海軍大將或中將後，第八任始出現文官總督田健治郎起，又一波文官總督：內田嘉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塚英藏、太田政宏、南弘、中川健藏之後，繼任者為海軍大將出身的小林躋造，且恢復武官總督制（接續者有長谷川清、安藤利吉）。一九三六年接任台灣總督的小林躋造則為了使殖民地台灣更易投入戰場的補給，始提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三口號，為其施政挈領，並以此進行台灣人皇民化的改造過程。

台灣新文學運動至此呈現停頓的狀態，而藉由文學運動掩飾的社會運動更是無可發揮。除了一個溫和組織「台灣自治聯盟」，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間也遭到《台灣日日新報》的攻訐。

由於這一年日本政局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軍閥的勢力凌駕一切，台灣也陷於一片惶恐之中，因此在八月十五日，自治聯盟召開了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的全島會議，大會結束後楊肇嘉只得宣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解散。<sup>320</sup>

可見其時，日本軍國主義大漲，在龐大的政治壓力下，任何殖民地的運動都不被允許。而相對的統治當局則是加強「國語」政策的推行，進行皇民化的

---

<sup>320</sup> 引自周明：《楊肇嘉傳》（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89）頁123。

龐大工程，以近代化的現代文明包裝，凸顯殖民地的必然改造，如「國民精神總動員計畫實施要綱」的發表，也加速了皇民化運動的推行。一九四一年成立「皇民奉公會」，藉以達到要求殖民地人民成爲一個日本人，而且是一個「好」的日本人，如何判斷爲「好」的日本人，即是「爲日本人而死」的終極目的。

日本統治者對於「皇民化」的期待實際上不是台灣人要「作爲日本人而活」，而是「要作爲日本人而死」。「成爲一個好的日本人」的意思是要明白「作爲日本人而死」的方向，並向這一方向奮進。在「皇民化」的美名下，隱藏著特別志願兵制度、徵兵制等一系列包藏著使台灣成爲軍事要塞的實戰動員計畫。在這種體制下，作家們也就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被允許避開這個主題而從事其他創作。<sup>321</sup>

確實，一如尾崎秀樹所言，此期的台灣作家已經不能迴避皇民化的議題，而文學社團的組織也在政策下爭取存在的可能。一九三九年在台的日本作家西川滿與北原政吉、濱田隼雄、中山侑、池田敏雄等人籌組了「台灣詩人協會」，並發行機關刊物《華麗島》，但僅發行一期之後，「台灣詩人協會」便改組爲「台灣文藝家協會」，由西川滿擔任主編發行《文藝台灣》爲機關刊物。

「台灣文藝家協會」在這個時期成立，自是有其宣示的意義，正如《文藝台灣》創刊號的〈後記〉所言，「台灣文藝家協會」是蒙台灣政府與民間相關人士，及《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新民報》兩社文藝部積極支持下得以成立，並且選在天皇即位 2600 紀年之際成立，意義自是意表言外。「台灣文藝家協會」也成了繼「台灣文藝聯盟」之後再一次有大規模作家參與的一團體組織。

而「台灣文藝家協會」也配合戰時體制在一九四一年二月進行改組，發展成爲一個全島性組織，《文藝台灣》也改由「文藝台灣社」發行，並且從第七期開始由雙月刊改爲月刊。同時卻傳出同爲「文藝台灣社」的同人不滿，在一九

<sup>321</sup> 引自尾崎秀樹，陸平舟、間ふさ子譯：〈決戰下的台灣文學〉收入《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台北：人間，2004）頁 182。

四一年五月之際，張文環、黃得時等人出走「文藝台灣社」另組織「啓文社」，並創刊《台灣文學》季刊。關於張文環等人的出走，有一說是《文藝台灣》的編輯走向與台灣既來的新文學運動方向不一，而不僅只以反對西川滿相應「皇民化」運動的立場，另立《台灣文學》要凸顯民族主義立場的說法闡述。

「台灣文藝家協會」的組成，原本就包含各路人馬，台人日人的區分只是其中之一，最大的矛盾應存在於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參與者接受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薰陶，強調文學的社會性，和部份在台日人主導的追求消遣性、技巧性的文學創作態度極不一致，因此很難合作。<sup>322</sup>

正如垂水千惠所引用張文環的自述，表示張文環認為《文藝台灣》過渡落入西川滿的個人趣味，與其說忍不住西川滿的獨裁作風，還寧可說是其像「不事生產的有錢太太辦家家酒一樣的作風。」<sup>323</sup>表現在文學的取捨上，便是對「外地文學」的歧異性看法，島田謹二一派認為殖民地文學提供了與殖民母國不同的文化情趣，而《文藝台灣》正是有此功能性，可以寫出具有異國情調的新文學作品。而中村哲一派則認為文學應該追求其社會性，相對也成為《台灣文學》的支持者。<sup>324</sup>

這些也都可以概括看成是《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可能相對立的原因，從西川滿的自述看來，確實呈現這樣的事實：《文藝台灣》日本人多，作品既浪漫又藝術；《台灣文學》台灣人多，作品多半很寫實；<sup>325</sup>但是不能忽略地是，兩者在戰時體制下，無論何種文學風格都免不了要面對統治者的思想檢查，以確保文學在戰時體制下亦有非常時期的戒備，除了避免出現引起人民對戰爭有負面討論的社論外，還不能只限於文學的世界，還必須適度地配合戰備的需要，

---

<sup>322</sup> 引自王昭文：《日治末期台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頁38。

<sup>323</sup> 參見垂水千惠，葉石濤譯：〈戰前的台灣文學——與日本的糾葛中透視〉，收入葉石濤：《台灣文學集》（高雄：春暉，1996）頁3。

<sup>324</sup> 參見王昭文：《日治末期台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sup>325</sup> 參見垂水千惠：《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1998）頁25。

提供人民戰爭的精神糧食。

《文藝台灣》初期以雙月刊形式刊行，改組後則以月刊發行，共發行三十八期。並曾於第二卷第六號的《文藝台灣》刊出「戰爭詩特輯」，可見此雜誌響應戰爭的立場，迫不急待以文學表明心意，這也無怪乎何以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召開「台灣文學決戰會議」的時候，西川滿會毫無遲疑建議「將文藝雜誌納入戰鬥配置」，將文學面對政治力的影響時徹底表態的行徑表露無遺。

而《文藝台灣》也確實一路走來除了懷有殖民者的異國情調外，把文學作為戰爭的支持性工具，也是特徵之一。不僅出刊「戰爭詩特輯」也刊出多篇著名皇民文學作品，如敘述志願兵制度的〈志願兵〉以及以描述台灣人皇民修練過程的〈道〉都是轉載自《文藝台灣》。從垂水千惠的觀察中，也確實發現《文藝台灣》在一九四一年九月發行的第二卷第六號所刊出周金波與川合三良志願兵題材的小說，即是標榜了《文藝台灣》日後的走向。作為脫離《文藝台灣》另立門戶的《台灣文學》則於同期都未見戰爭特輯與題材。

由張文環擔任主要編輯職務的《台灣文學》成員則有黃得時、王井泉、陳逸松、簡國賢等台籍人士，以及中村哲、中山侑等日籍人士。隨著《台灣文學》的發刊，台灣新文學運動在經歷《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的停刊後，似乎又找到一個可以聚集的創作空間，也繼承了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的血脈。

而《台灣文學》也不負期待地刊出許多傑出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在與《文藝台灣》有著某種程度的競爭之下，提倡「寫實主義」的《台灣文學》確實有較多關懷台灣人民實境的作品，不至於淪為全盤異國情調與謳歌戰爭的浪漫刊物，《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各自成了彼時台灣文學特殊的景象。

雖然最後《台灣文學》也在「台灣文學奉公會」的編制之下，為了避免遭受停刊的處分，不得不向政治勢力屈服刊登「大東亞戰爭勝利」的口號，卻也再一次顯示出，當文學遭遇政治力是多麼脆弱的一環。但該刊所刊出多篇呂赫若諸如〈財子壽〉、〈風水〉、〈月夜〉，王昶雄的〈奔流〉等重要的小說作品，也使得該刊成為日治末期台籍人士小說創作的一個座標。

由於戰況的激烈，殖民地台灣必須被迫去接受同為戰爭的一份子，於是一

九四二年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一九四三年西川滿便在「台灣文學決戰會議」提議文學應該進入戰備位置。而文藝雜誌應該獻上的說法，使得楊逵與黃得時雙雙反彈，也引起日本籍議員的強硬回應，<sup>326</sup>爲了穩住場面，身爲《台灣文學》的主編張文環不得不說出：「台灣沒有非皇民文學。假如有任何人寫出非皇民文學，一律槍殺」這樣強烈的話，總算避免了台籍文藝人士與日本當局正面衝突。

但也因爲皇民化的強行介入，會中做出《文藝台灣》與《台灣文學》各自再發行一期而廢刊的決定。一九四四年五月，雙方則共同由「台灣文學奉公會」統一發刊爲《台灣文藝》，從此台灣民間中止了自辦刊物，而全員進入戰鬥戒備期，文學一再被政治所用，此刻達到了極致。

也因此，究竟台灣文學在日治末期，也就是戰爭期，是否爲日本政府所用，書寫皆爲皇民文學，失去台灣主體價值？也成爲一再被討論的議題。

#### 第四節 小結：文學與政治力的消長

從新文學運動開始，揭開的是殖民地台灣被迫成爲殖民地的悲哀。身爲殖民地人民，在世界思潮湧動的時刻，卻因爲殖民地的政治氣氛，而不得新知的吸收，鎮日爲著生存的方式而汲汲營營。除了本地的仕紳可以遊走在政權更替的權力分配的利益上，暫時獲得喘息，多數的人民依然生存在整個社會的最底層，更是以此終結人生。

二〇年代的台灣，有新興的知識份子產生，遊歷於外，由外部反思殖民地的困頓而積極欲以革新，始有政治活動的醞釀，配合著另一股新文學運動的力量。於此，殖民地台灣展開社會與文學兩股革新力量的合流，初期彼此相互協助，共同爲了啓蒙台灣人民而努力，爾後，雙方各自成形，使出現集團的分立，再經過統治者的施壓，迫使反動的力量各竄，未及氣候。

三〇年代的台灣，則意識到社會運動的不可行，回過頭來往文學運動經營，這一點是和新文學運動剛發展的時候，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兩者皆知政治運動

---

<sup>326</sup> 參見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收入《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6）頁205。

的暫不可行，尤其是統治高壓控管的當下，於是將力量遁入於文學，藉由文學的包裝持續殖民地人民力量的聚集。這一點從三〇年代各文學雜誌林立的狀態可見端倪，但也因為社會運動的力量遁入於文學中，所以也產生文學被社會運動所用的狀況，而寫實文學也成為日後觀察日治台灣文學的傳統之一。

其間，除了表示殖民地人民受的壓迫之外，也不乏利用文學將自身政治理念蘊藏其中的論述，如鄉土文學論戰的展開，也是民族運動滲入的力量，企圖經營一個屬於台灣自主性的民族。然而殖民地內部實際的狀況遠比論述的鄉土更為複雜，成為複合式的鄉土呈現，使得鄉土文學論戰有各自論述的狀況，台灣話文也在多系統文字的不相容下各自堅持，加上殖民統治者並不樂見殖民地人民有任何自主的意識呈現，論爭也就隨著時間的過往而精疲力盡。

既然論爭不可行，而對殖民地台灣依然抱有一絲熱情與希望的有志之士便透過文學雜誌持續發送自己的信念與意志，如《南音》、《福爾摩沙》、《先發部隊》等雜誌的創刊，都是殖民地人民對整個社會的持續投入的熱情與關懷。隨著文學運動的活絡，殖民地人民也學會將文學視為個人情緒的表達，文學創作經過十餘年來，來自世界各地文學作品介紹的薰陶，也逐漸呈現成熟的技巧，可以將語言視為文學表達的形式。

此刻，台灣文學作品也逐漸邁向蓬勃的狀態，創作的人數也逐年上升，在三〇年代中後期已經出現像呂赫若這等優秀的創作者，並且可以成熟地使用日文做為創作工具，且作品的水準足以與日本出身的作者相提並論，這都是台灣文學發展至成熟度的象徵。

但是隨著戰爭的進行，殖民地台灣也被迫投入戰爭，文學的區域也已經不能再為社會運動所用。甚至在日人如西川滿等的矯情附和下，文學甚至失去獨立存在的空間，一併投入戰爭體制，而有皇民化文學的產生。此期的台灣文學甚至不能自由選擇創作的語言，而統一使用日語，內容也被嚴格檢查，然而作品總在一定程度下，表現了作者的內心的取捨。

於是台籍知識份子的苦悶也隱藏於文學創作中，與新文學運動發展初期相較，初期有成為日治時期經典的〈一桿稱仔〉，對警察系統視百姓於無物的抗議，

〈榮歸〉等篇章表達對於日本統治的迷惘，處於一個新與舊交接的曖昧，價值觀還未能轉變的尷尬。中期則有〈殘雪〉中對於未來呈現無知、蒼白的知識份子，〈牛車〉裡為生活所苦的平民，面對賴以維生的工具將無所可用的窘境，〈送報伙〉中尋求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團結，藉以抵抗上層階級的壓迫。

概括而言，在進入皇民化運動之前，台籍創作者所呈現的文學作品有一種新與舊的價值觀衝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高低位階衝突。而到了皇民化時期，則是對是否身為皇民而有更多精神上的困頓，反抗殖民者統治的悲情轉化為恨不得身為皇民的苦悶，或者是對自身非出身皇民的焦慮。如〈道〉、〈志願兵〉等，而讓此期得以面世的文學作品表達出身為殖民地人民的深層悲哀，其他如〈奔流〉也將人民在戰爭中所欲面對的人性呈現扭曲的狀態表露無遺。

總之，日治末期的台灣，在遭受投入戰爭體制的壓迫之下，台籍菁英依然對統治者有各種不同的想像。有的甚至就屈服於統治力量，尋求以血換血的皇民之道，企圖沈淨困頓的思緒，有的則是不改反抗本色，持續尋求抵拒統治的可能。多數的人民則是一無所知地面對未來，只求得以生存的機率。

台灣人民在面對中日戰爭，還是存在著迷惘，究竟台灣人民屬於何國？被統治了近五十年的台灣人民在被要求對天皇效忠的同時，也許也會懷疑，殖民地人民究竟是不是天皇的子民？或者該不該就此成為天皇的子民？而所有的文學行動，則是一幅浮世繪，將在戰爭底下尋求存活的臉孔投入於作品，而社會運動則是終戰以後的抗爭了。

## 第六章 結論

一八九五年，一紙馬關條約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從此台灣被迫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台灣人民此後也陷入無從開始也無從終止的民族想像。

成為殖民地以前，台灣人幾乎不曾出現過對於自身隸屬問題的疑問。從唐山渡海來台，莫不是都是開墾而始，或者宦宦遊台，對於世界新勢力的興起，倒也無所聞問而獨自存在，但是一旦這樣的社會體制遭受到改變，慣於其中的人民自然會興起無所適從的困惑。

因此，始有台灣民主國的成立，但未曾建立獨立的國家體制，因突如其來的外部衝擊，而匆忙而立的國家體制，根本不堪一擊。況且遊歷於台灣的清廷官吏，根本不曾想過自己是台灣的一份子，更不需要台灣民主國的官銜，離開台灣的急迫性恐怕還是較多。在這樣時不利己的環境底下，台灣民主國自然潰散，徒留無法遷移的台灣人民，克難的武裝抵抗成了另一波抵拒殖民統治的宣告。然而失去國家機器組裝的武力抗衡，只能流竄於民間作游擊似的突襲，面對經過現代化的日本皇軍，先天不足的軍備還能持續至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始宣告台灣人民大規模武裝抗日的終結，可以說是相當不易。

台灣因為被迫成為殖民地的緣故，使得殖民地的歷史經驗成為一種歷史的傷痕，這個歷史的傷痕並未因為時間的沖刷而趨近消失，反而成了一種無所言語的痛楚。似乎這個傷痕會因為一再地觸及而凸顯台灣處於被遺棄者的角色，是而呈現一歷史的孤兒意象，因此，台灣人民始終未能正視這個傷痕，而抽象地懸置在歷史的夾縫中，讓傷痕也讓自己自生自滅。

第一次台灣人民面對殖民統治，下意識選擇武裝反擊，但是失敗。而這個武裝反擊的源頭，並不是因為台灣人民自主權的被剝奪，而是因為一個社會體制突如其來被破壞。長期處於平衡底下的人民，因此產生對外力破壞平衡的抗拒，於是嘗試用自己的力量抵抗，但也因為這股力量太過於薄弱，在宣告失敗的同時，台灣人民也開始想像，自我的生存位置。所謂的非武裝抗日，即是在面對克難武裝的不可行性之外，所走的另一策略，而這個策略的發起，遠較於克難的武裝抗日更存在精神層面的思考。

台籍人士的上層階級無非是延續舊時體制而來的仕紳，這些仕紳爲了保持自己的影響力，試著進入殖民者的國家體系，企圖延續自身的利益鞏固。於是有了溫和路線的民族主義行動，如林獻堂一派尋求議會制度的推動，其時也發生同化運動的推行，但是在兩者雙雙宣告失敗的情況下，顯示溫和的路線並不能成功，但卻開啓了台灣人民對民族的想像。例如對同化運動的反省，究竟台灣人該不該被同化爲日本人？而日本人又是否真能接受台灣人爲皇民的一份子，這個疑問一直到日本統治結束都未能有一個明確的解答。

出現了林獻堂的溫和議會自治路線，在武裝抗日的行動徹底失敗後，溫和路線確實是避免統治者高壓取締的行動。於此，二〇年代的台灣，先是出現了以啓蒙運動爲主要任務的新興知識份子，其運動內容不外以啓蒙台灣民眾作爲深層覺醒的目的，採取的行動則以智識的傳遞作爲最大的考量，而同時選擇淺顯的文字作爲推廣的媒介，加上中國五四運動等思潮的影響，台灣也興起新文學運動，分別抵制舊文人，以及更高的權力掌握者。

但是這也宣告了台灣人民並無統一的信仰核心，其價值觀的養成是爲一種分裂。如台灣內部並不呈現一整體，而是呈現集團的區塊分裂，因爲台灣自始就沒有一個權力核心統一人民的信仰，這個信仰即爲民族想像的共同體，台灣人民並沒有擁有過這樣的共同體，於是在面對日本殖民的同時，台灣人民不僅攻擊上層的殖民統治者，也攻擊經由殖民統治者下放權力而獲益的台籍仕紳。

台灣舊有的領導階層便處於殖民統治者與新興領導階層興起的威脅中，由此也看出殖民地台灣一種裂解的原因。雖然全世界的國家體制必然有上層與下層階層構成，但是台灣卻是以一個殖民地的處境被統治著，而追尋台灣的民族認同，成了知識份子必然的任務。

例如社會運動的推行，若非有共同的信仰，否則將難以執行信念的推廣，以致從殖民者的高壓統治中解脫。於是本論文在第二章〈論爭前兆：分歧的朝聖之道〉便欲提出此一問題，作爲反思殖民地台灣的一個起源，而在第三章〈拓殖土地而佔領創傷：二〇年代殖民政權下民族運動中（非）集體想像「民族」〉中則提出台灣企圖建立一個民族想像共同體的可能，但是這個想像的可能結果

相對而言是悲觀的，於是鄉土文學論戰成爲民族主義另一波主打的議題，也成爲民族想像的神主牌，那便是本論文亟欲強調的論爭結構。

台灣的民族主義在「愛台灣」神主牌下，反而引起更爲極端的內部分裂，而失去客觀判斷的自覺，而讓鄉土文學論戰成爲一共時結構，不斷重複循環。因此，本論文也以政治力的介入作爲論爭中止的一個可能，如第五章〈論爭的中結：政治力介入下的文學行動〉中所欲表達的。而事實上，重複發生於台灣的鄉土論爭，莫不以政治力的介入作爲停止論爭的方式，或許這樣的看法過於消極，但卻無法否認台灣確實存在這樣的歷史事實。

台灣自新文學運動以來，關於「鄉土」在文壇上的爭執，可以歸納出三次較具集團性與議題性的論戰。下表將試整理出三次論爭：

表格一 台灣文學史上三次鄉土文學論戰簡表

論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時間	19030~1932、 1933~1934	1949	1977
前史	台灣新文學運動	終戰，國民政府來台	「回歸鄉土」潮流
引爆點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1930，8/12~9/1《伍人報》)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台灣新聞》)	「橋」副刊創刊(三日或間日出刊) 維持二十個月之久，共出刊二百二十三期 「新現實主義」主張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仙人掌》)

	貂山子〈對建設台灣鄉土文學的形式的芻議〉(1933, 8/29《台灣新民報》906)	「橋」副刊舉辦茶會，揭開討論台灣文學序幕 歌雷：「台灣新文學要經過揚棄過程」	何回歸？)(《仙人掌》1977, 四月號) 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聯合報》，七七年八月七日~十九日) 余光中〈狼來了〉(《聯合報》七七年八月二十日))
內容概要	1、「鄉土文學」的定義 2、「台灣話文」與「中國話文」論爭 3、「台灣話文」的建設與實踐	1、「新現實主義」與台灣文學的自主性 (大致算是各自表述的過程)	1、「鄉土文學」乃台灣話文一致的大眾語文 2、「鄉土文學」乃相對於佔住文壇以書寫外省籍作家的回憶性文學
參與論戰主要成員	黃石輝、郭秋生、毓文、克夫、點人、賴明弘	歐陽明、揚風、駱駝英、楊達	王拓、余光中、朱西寧、陳映真

而恰巧這三次的論爭，都被更強的政治議題所掩蓋或取代。對於「鄉土」這樣的議題，竟不斷出現於台灣史上，並且都引起相當的關注，這也是本論文所欲尋求解釋此種現象的研究動機。經過對三〇年代所引起的鄉土文學論戰，本論文把此次鄉土文學引發的原因，歸納為殖民地台灣為尋求對自我的認同，而避於殖民統治者的政治壓迫，而以文學作為政治、社會、民族運動的變形。並希冀從這樣的變形理論，作為尋找其他各次鄉土文學論戰成因的可能。

若以歷史背景作為分析的必要條件，此三次引起鄉土文學的論戰，都有一

定程度是與其時執政當局所支持的論述有對立傾向。三〇年代的日本殖民時期，總督府不可能支持殖民地的各種運動，對於可能威脅到其政權穩固性的運動，更是嚴格取締。

相對於政治與民族運動的敏感，台籍菁英則選擇以文學作為意識型態的包裝，以尋求對鄉土認同加以強化殖民地台灣人民對自我的認同。隨後則因為參與論爭者達不到共識，且討論議題愈見龐雜，而讓原該是對話的狀況陷入各說各話。隨著日本在世界各地的戰況吃緊，而不得向忠誠度值得懷疑的殖民地調動更大量的人力與物資。為了要加強殖民地人民的忠誠度，皇民化的議題很快地取代殖民地內部所自發的鄉土議題。

終戰之後，台灣對於政治情勢毫無應變的權力，再一次被迫面對一個新政權的國民政府統治。對以中文為官方語言的國民政府，已經被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台灣人民是相當陌生的，台灣人民再一次陷入對未知的焦慮之中。活躍於日本殖民末期的台灣人民，多數已相當慣於使用日語，對於這樣的狀況，國民政府顯然未能深刻理解，來台第二年的一九四六年便下令查禁日文，輕易地廢止報刊的日文欄。

一九四七年更爆發二二八事件，這對於剛脫離殖民政權的台灣而言，國民政府顯然無法帶給台灣人民太多的安慰，反而是更多與台灣人民無法理解的爭端與仇恨，那是至此難解的情結。同時，以歌雷為首的《新生報》〈橋〉副刊開始討論關於「如何建設台灣文學」的文章，也引發了楊逵等日治時期即參與台灣文學創作活動的作家回應。

基本上這次的論爭並未擴及太大的範圍，更嚴謹一點的分析，或許這一次的論爭規模並不能與三〇年代、甚至之後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相提並論。其時可說是當時的省外作家與省內作家對於「台灣文學」內容的意見紛歧，而這個意見紛歧雖來自於雙方對彼此的互不瞭解，但是國民政府輕率地禁止日文的作法，卻是形成日後統稱此一世代台灣作家為跨越語言的一代，也顯示中國與台灣因為五十年的歷史背景差異，造成至今無法解開的情結。

時至七〇年代，文壇上歷經了西化的現代主義洗禮、現代詩論戰，政壇上

也因為退出聯合國等事件，經濟也進入轉型期，而得以邁入經濟起飛的黃金時期，台灣人民也逐漸意識到可談論社會議題的氣氛。

隸屬於台灣鄉土文學陣營大將的葉石濤，則於一九七七年發表了〈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王拓、黃春明等人也著力於鄉土文學的書寫，彭歌則以〈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對鄉土文學論者提出批判，余光中更一篇〈狼來了〉以工農兵文藝的大帽子扣住鄉土文學，朱西甯甚至以〈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一文，質疑台灣殖民地的歷史經驗對「國家」的忠誠度。王拓以〈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辯駁，陳映真亦以〈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等表達自己做為左翼知識份子的現實文學觀。其時執政當局召開文藝會談，呼籲作家要「堅持反共文學立場」，以官方的介入，中止了這一次的鄉土文學論戰。

此次論戰熱潮後來也因為「美麗島事件」，而引發同屬鄉土文學陣營內部因意識型態的分化，亦造成日後詮釋台灣文學史的立論差異。

台灣如果要扭轉歷史的命運，就要正視自身曾為殖民地這樣的難堪，而成為殖民地的台灣也因為是被動割棄，而無所自我選擇，因此更需要看清自己所處的位置。論爭允許發生，但是論述則不需以攻擊非我思想型態者，強調自身論述存在的正確。「台灣」的主體曾經被否認、被割捨，「台灣」曾經失去證明自我存在的機會，但是台灣人民始終存在，這是一個事實，面對殖民地的經驗，應該被正視、被檢驗。檢視傷口也許很痛，但是卻不得不這麼做，而非一味以承認某國是為祖國作為依靠的期待，台灣人民失去過太多，也承受過太多，鄉土文學的論戰不該只是創傷的病徵，而應該是檢視創傷的契機、治癒創傷的契機。

若要檢視創傷，便要徹底檢視，該治療便治療，該割捨便割捨，而非一再重演攻擊的戲碼，自相殘殺的結果也不會換得樂觀的未來，而是正面探討承認台灣民族存在的可能，若經由想像共同體的建立，台灣成為一新興民族，檢視傷口未必不是件好事，若始終不能建立共同的信仰，那麼各自獨立也未嘗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就是以一個複合式的民族結構存在，同樣隸屬於某國家機器之下，彼此尊重、各自存在，以一個國家機器的制高點運作歷史，人民若能

達到安和樂利，也不再重演歷史悲劇，生存便會顯得較為容易，言論也不至於成為謀殺的工具，若是無能，「愛台灣」也該是自主而非必要；文學也該自我獨立，而非一再成為表態的工具，當人民不再需要被啓蒙，文學卻依然進行，何嘗不是一種救贖。

## 參考書目

### 一、 報刊雜誌

刊名	卷數	出版地	出版者	年代	備註
《台灣青年》	創刊～四卷三期	原：東京 復：台北	原：台灣青年雜誌社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20 ～1922 復：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 刊五十 種；第 12 種
《台灣》	三年一號～五年二號	原：東京 復：台北	原：台灣雜誌社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22 ～1924 復：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 刊五十 種；第 13 種
《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	創刊號～三九五期	原：東京 復：台北	原：台灣新民報社、台灣民報社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23 ～1931 復：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 刊五十 種；第 14 種
《南音》	創刊、一卷二號、一卷三號、一卷四號、一卷五號、一卷六號、一卷七號、一卷八號、一卷九號十號合刊、一卷十一號	原：台北 復：台北	原：文藝雜誌南音社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32 復：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 刊五十 種；第 29 種（新文學雜誌叢刊）
《人人》	（創刊、二號）	原：台北 復：台北	原：人人雜誌	原：1925 復：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

			復：東方文化書局		刊五十種；第 29 種（新文學雜誌叢刊）
《福爾摩沙》	（創刊、二、三號）	原：東京 復：台北	原：台灣藝術研究會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33 ~1934 復：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 刊五十種；第 29 種（新文學雜誌叢刊）
《先發部隊》	（第一號）	原：台北 復：台北	原：台灣文藝協會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34 復：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 刊五十種；第 29 種（新文學雜誌叢刊）
《第一線》	（第一號）	原：台北 復：台北	原：台灣文藝協會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35 復：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 刊五十種；第 29 種（新文學雜誌叢刊）
《台灣文藝》	創刊、二卷一號、二卷二號、二卷三號、二卷四號、二卷五號、二卷六號、二卷七號、二	原：台中 復：台北	原：台灣文藝聯盟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34 ~1936 復：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 刊五十種；第 29 種（新文學

	卷八九號合刊、二卷十號、三卷二號、三卷三號、三卷四五號合刊、三卷六號、三卷七八號合刊				雜誌叢刊)
《台灣新文學》	創刊、一卷二號、一卷三號、一卷四號、一卷五號、一卷六號、一卷七號、一卷八號、一卷九號、一卷十號、二卷一號、二卷二號、二卷四號、二卷五號	原：台中 復：台北	原：台灣新文學社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35 ~1937 復：1973	婁子匡景印中國期刊五十種；第29種（新文學雜誌叢刊）
《台灣新文學》 （月報）	創刊號、二號				
《文藝台灣》	創刊、一卷二號、一卷三號、一卷四號、一卷五號、一卷六號 二卷一號、二卷二號、二卷三號、二卷四號、二卷五號、二卷六號、三	原：台北 復：台北	原：台灣文藝家協會、文藝台灣社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40 ~1944 復：1973	婁子匡景印中國期刊五十種；第29種（新文學雜誌叢刊）

	卷一號、三卷二號、三卷三號、三卷四號、三卷五號、三卷六號、四卷一號、四卷二號、四卷三號、四卷四號、四卷五號、四卷六號、五卷一號、五卷二號、五卷三號、五卷四號、五卷五號、五卷六號、六卷一號、六卷二號、六卷三號、六卷四號、六卷五號、六卷六號、七卷一號、七卷二號				
《華麗島》	一期	原：台北 復：台北	原：台灣詩人協會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39 復：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刊五十種；第 29 種（新文學雜誌叢刊）
《台灣文學》	創刊、一卷二號、二卷一號、二卷二號、二卷三號、二卷四號、三卷一	原：台北 復：台北	原：台北啓文社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41 ~1943 復 1973	婁子匡景 印中國期刊五十種；第 29

	號、三卷二號、三卷三號、三卷四號				種(新文學雜誌叢刊)
《台灣文藝》	創刊、一卷二號、一卷三號、一卷四號、一卷五號、一卷六號、二卷一號	原:台北 復:台北	原:台灣文學奉公會 復:東方文化書局	原:1944 ~1945 復1973	婁子匡景印中國期刊五十種;第29種(新文學雜誌叢刊)

## 二、文學集

作者	書名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呂赫若	呂赫若小說全集	台北：聯合文學，1995
李南衡編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台北：明潭，1979
林瑞明編	賴和全集	台北：前衛，2000
施淑編	日據時代台灣小說選	台北：前衛，1992
張光正編	張我軍全集	北京：台海，2000
張恆豪編	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 ／日據時代	台北：前衛，1991
許俊雅編	日治時期台灣小說選讀	台北：萬卷樓，2003
楊達	鵝媽媽要出嫁	台北：前衛，1985
鍾肇政、葉石濤編	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台北：遠景，1979
王曉波編	蔣渭水全集	台北：海峽，1998

## 三、 專著

作者	書名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E.A. Winckler, S.Greenhalgh，張苾 蕪譯	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	台北：人間，1994
丸山真男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北京：三聯，2000
中島利郎	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 學論戰資料彙編	高雄：春暉，2003
中島利郎	日據時期台灣文學雜誌總 目・人名索引	台北：前衛，1995
中島利郎編	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總合 目錄	東京：綠蔭書房，2000
王詩琅譯註	台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 動	台北：稻鄉，【民】77
王德威	小說中國	北京：三聯，1998
王曉波	台灣的殖民地傷痕	台北：海峽，2002
古繼堂	台灣小說發展史	台北：文史哲，1989
古繼堂主編	簡明台灣文學史	北京：時事，2002
史明	台灣人四百年史	聖荷西：篷島文化，1980
台灣文學研究會編	先人之血・土地之花	台北：前衛，1989
台灣總督府警察局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三)第二編，領台以後の 治安狀況(中卷)	台北：南天，一九九五年二 刷
矢內原忠雄，周憲 文譯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台北：海峽，2003
安然	台灣民眾抗日史	北京：台海，2003
安德森，吳叡人譯	想像的共同體	台北：時報，1999

竹內好，李冬木、 趙京華、孫歌譯	近代的超克	北京：三聯，2005
何標（張光正）	蕃薯藤系兩岸情	北京：台海，2003
吳三連、蔡培火、 葉榮鐘、陳逢源、 林柏壽	台灣民族運動史	台北：自立晚報，【民】79
吳文星	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領導階 層之研究	台北：正中，【民】81
吳密察	台灣近代史研究	台北：稻鄉，【民】80
呂正惠、趙遐秋	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	北京：昆侖，2002
尾崎秀樹，陸平舟、 間ふさ子 共譯	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	台北：人間，2004
李文	武士階級與日本的近代化	石家莊：河北人民，2003
李永熾	日本的近代化與知識份子	台北：水牛，1974
李園會	日據時期台灣之初等教育	高雄：復文，【民】72
李歐梵	現代性的追求	北京：三聯，2000
汪暉	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 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	北京：三聯，2004
周明	楊肇嘉傳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89
周婉窈	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 請願運動	台北：自立晚報，【民】78
周婉窈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 民統治末期台灣史論集	台北：允晨，【民】92
拉康，褚孝泉譯	拉康選集	上海：商務，2001
林明德	日本史	台北：三民，2003

林柏維	台灣文化協會滄桑	台北：台原，1993
林瑞明	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	台北：允晨，1996
林瑞明	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 賴和研究論集	台北：允晨，1993
南博，邱淑雯譯	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	台北：立緒，2004
垂水千惠	台灣的日本語文學	台北：前衛，1998
施家順	台灣民主國的自主與潰散	高雄：復文，1995
施淑	兩岸文學集	台北：新地，1998
柯志明	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 台灣的發展與從屬	台北：群學，2003年
柄谷行人，趙京華 譯	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	北京：三聯，2003
若林正丈、吳密察	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 東亞史的交錯	台北：播種者，2004
原口清，李永熾譯	日本近代國家之形成	台北：水牛，【民】75
孫歌	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 「日本」	台北：巨流，2001
翁佳音	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 (1895~1902)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
翁佳音譯註	台灣社會運動史／勞工運 動／右派運動	台北：稻鄉，1992
荊子馨，鄭力軒譯	成爲日本人	台北：麥田，2006
馬克思、恩格斯， 中共中央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斯 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共產黨宣言	北京：人民，1997

馬泰·卡林內斯 庫，周憲、許鈞譯	現代性的五副面孔	北京：商務，2003
高天生	台灣小說與小說家	台北：前衛，1985
高岱、鄭家馨	殖民主義史·總論卷	北京：北京大學，2003
張正昌	林獻堂與台灣民族運動	台北：通美印刷，【民】70
張深切	里程碑	台北：文經社，1998
梁明雄	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 研究	台北：文史哲，【民】89
梁啓超	戊戌政變記	台北：中華，【民】54
許俊雅	日據時期台灣小說研究	台北：文史哲，【民】84
許俊雅	台灣文學論叢	台北：師大書苑，1997
連溫卿，張炎憲、 翁佳音編校	台灣政治運動史	台北：稻鄉，1988
郭廷以	台灣史事概說	台北：正中，1975
陳芳明	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 運動史論	台北：麥田，1998
陳建忠	日據時期台灣作家論	台北：五南，2004
陳昭瑛	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	台北：正中，1998
陳紹馨	台灣的社會變遷與人口變 遷	台北：聯經，1976
陳嘉明等	現代性與後現代性	北京：人民，2001
彭瑞金	台灣文學探索	台北：前衛，1995
彭瑞金	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	台北：自立晚報，1990
游勝冠	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 發展	台北：前衛，1996
黃武忠	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 小傳	台北：時報，1980

黃昭堂，黃英哲譯	台灣總督府	台北：前衛，1994
黃美娥	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 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 與文學想像	台北：麥田，2004
黃通、張宗漢、李 昌瑾編著	日據時代之台灣財政	台北：聯經，【民】76
黃富三、古偉瀛、 蔡采秀	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 研究	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1997
黃富三、曹永和	台灣史論叢·第一輯	台北：眾文，【69】
愛德華·W·薩義 德，單德興譯	知識分子論	北京：三聯，2002
楊克煌	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 史	台北：海峽，1999
楊肇嘉	楊肇嘉回憶錄	台北：三民，1970
葉石濤	台灣文學史綱	高雄：春暉，1999
葉石濤	台灣文學集	高雄：春暉，1996
葉石濤編譯	台灣文學集：日文作品選集	高雄：春暉，1999
葉石濤	台灣鄉土作家論集	台北：遠景，1979
葉石濤	文學回憶錄	台北：遠景，1983
葉石濤	沒有土地哪有文學	台北：遠景，1985
葉榮鐘	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 史	台中：晨星，2000
葉榮鐘，李南衡、 葉芸芸編註	台灣人物群像	台北：時報，1995
葉榮鐘，葉芸芸補 述	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	台中：晨星，2000
雷蒙·阿隆，周以	階級鬥爭——工業社會新	南京：譯林，2003

光譯	講	
趙建民、劉予葦	日本通史	上海：復旦大學，1989
劉寧顏	日據初期司法制度檔案	台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民】71年
潘乃德（Benedic, R.），黃道琳譯	菊花與劍：日本民族的文化模式	台北：桂冠，2002
鄭樑生	日本史：現代化的東方文明國家	台北：三民，2004
盧修一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	台北：前衛，1989
霍布斯邦，王章輝等譯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台北：麥田，1997
霍布斯邦，李金梅譯	民族與民族主義	台北：麥田，1997
霍布斯邦，賈士蘅譯	帝國的年代：1875-1914	台北：麥田，1997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	我的半生記	台北：楊翠華，1997
藍博洲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	台北：時報，1993

#### 四、單篇論文

作者	篇名	期刊名，出版年
吳密察	一八九五年「台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	《台大歷史學報》（第八期，1981）
李桂芳	意識的偵防與歷史的夢魘—從陳映真與陳芳明的論爭說起，並兼論晚近「台灣文學史」的問題	《中外文學》第32卷第11期（2004年4月）

林載爵	本土之前的鄉土：一談一種思想的可能性的中挫	《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1998）
施淑	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據時代台灣鄉土觀念問題	《聯合文學》第十四卷第二期
施淑	台灣話文論戰與中華文化意識——郭秋生、黃石輝論述	《八・一五：記憶和歷史》（台北：人間，2005）
彭瑞金	葉石濤的台灣文學評論和文學史	《中外文學》，第 27 卷第 6 期（1998）
黃錦樹先生	文之餘？論現代文學系統中之現代散文，其歷史類型及與周邊文類互動，及相應的詩語言問題	《中外文學》第 32 卷・第 7 期，2003 年 12 月
蕭阿勤	1980 年代以來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台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	《台灣社會研究》第三期（1999）
蕭阿勤	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典範	《重理想象共同體——國家、族群、敘述國際學術研討會》（行政院文建會主辦，2003）
蕭阿勤	民族主義與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	《台灣史研究》，第六卷，第二期（【民】八十八）

## 五、學位論文

### ※ 博士論文

藍建春	台灣文學史觀念的歷史考察	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民】90
-----	--------------	------------------------

### ※ 碩士論文

王昭文	日治末期台灣的知識社群（1940~1945）	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0
吳文星	日據時期台灣師範教育之研究	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民】68年
林淑惠	台灣文化協會分裂前的台灣新文學運動（1920—1927）——以《台灣民報為中心》	南投：暨南國暨大學中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2
柯喬文	三六九小報古典小說研究	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2
洪儀真	三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左翼思想及其背景之比較	台北：台灣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民】86
陳明柔先生	日據時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思想風格及其文學表現之研究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1
陳淑容	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	台南：台南師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0
黃文車	黃石輝研究	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90

黃俊豪	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之民族認同	台北：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8
黃琪椿	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與社會主義思潮之關係初探	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83

## 附錄一

### 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相關篇目回應表

(本表係根據中島利郎：《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所製作)

#### ※第一波鄉土文學論戰相關篇章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伍人報》，1930，8.16~9.01

↑回應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台灣新聞》，1931，7.7 (連載三十三回)

↑回應

黃石輝：〈再談鄉土文學〉，《台灣新聞》，1931，7.24 (連載八回)

↑回應

↑回應

↑回應

↑回應 及 ↑自我回應

毓文：〈給黃石輝先生一鄉土文學的吟味〉，《昭和新報》，(140、141號) 1931，8.1、8.8	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一讀黃石輝君的高論〉，《台灣新民報》，1931，8.15	點人：〈檢討「再談鄉土文學」〉，《台灣新聞》，1931，8.20 點人：〈檢一檢「鄉土文學」〉，《昭和新報》，1931，8.29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台灣新民報》，1931，8.29、9.27
--	---	---	--

↑回應

↑回應

↑回應

黃石輝：〈我的幾句答辯〉，《昭和新報》，1931，8.15、22、29	黃石輝：〈鄉土文學的再檢討給克夫先生的商量〉，發表處不明	黃石輝：〈和點人先生談枝葉〉，《台灣新聞》，1931，9.3
-------------------------------------	------------------------------	--------------------------------

		黃石輝：〈給點人先生一為鄉土文學問題〉，《昭和新報》，1931
--	--	---------------------------------

↑ 回應

毓文：〈鄉土文學的檢討一再給黃石輝先生〉，《昭和新報》，刊行日期不詳，1931，8.31 完稿

↑ 回應

黃石輝：〈鄉土文學的檢討一再答毓文先生〉，發表處不明

林鳳崎：〈我的改造台灣鄉土文學的提案〉，《台灣新民報》，1931，12.5

坤五：〈就鄉土文學說幾句〉，《南音》，1932，1.15

賴明弘：〈對最近文壇上的感想〉，《新高日報》，1932，8.26、9.16

黃得時：〈談談台灣的鄉土文學〉，（未見原稿）

※第一波鄉土文學論戰中討論台灣話文的相關篇章

黃純青：〈台灣話文改造論〉，《台灣新聞》，1931，10.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十四回連載	楊碩鵬：〈台灣話改造問題〉（發表處不明）
--	----------------------

↑ 回應

↑ 回應

↑ 回應

黃石輝：〈對「台灣話文改造論」的一商榷〉，發表處不明，四回連載	郭秋生：〈讀黃純青先生的〈台灣話文改造論〉〉，《台灣新民報》，1931，11.7、14	小野西洲：〈讀台灣語改造論〉（一），《語苑》，二十四卷十一號，1931，11.15
		小野西洲：〈讀台灣語改造論〉（二），《語苑》，二十四卷十二號，1931，12.15

回應 ↑

黃純青：〈與郭秋生先生論台灣話改造論〉，《台灣新民報》，1931，11.21

回應 ↑

郭秋生：〈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謹呈黃純青先生〉，《台灣新民報》，1931，11.28、12.5

劉魯：〈幾句鄉土話〉，《台灣新聞》，1931，12.15

郭秋生：〈說幾條台灣話文的基礎工作給大家做參考〉，《南音》，1932，1.1

敬：〈台灣話文討論欄〉，《南音》，1932，1.1

負人：〈台灣話文雜駁〉，《南音》，1932，1.1、1.15、2.1、2.22、5.25

回應 ↑

黃石輝：〈答負人〉，《南音》，1932，6.13

擎雲：〈文藝時評〉，《南音》，1932，1.15

洪耀勳：〈創造台人的言語也算是一大使命〉，《台灣新民報》，1932，1.19

賴和、秋生：〈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南音》，1932，2.1	南：〈愚齋愚話〉，《南音》，1932，2.1
	↑ 回應
	明弘：〈兩個駁論〉，《台灣文學》，1932，6.25
	擎雲：〈文藝時評〉，《南音》，1932，2.1
	城：〈解剖十九童君的華札〉，《南音》，1932，2.1、2.22
奇：〈卷頭言·勿講假話〉，《南音》，1932，2.22	

回應 ↑

郭秋生：〈台灣話文的新字問題——給賴和先生〉，《南音》，1932，2.22

回應 ↑

黃石輝：〈新字問題〉，《南音》，1932，2.22	李獻章：〈新字問題〉，《南音》，1932，3.14
	黃純青：〈新字問題〉，《南音》，1932，3.14

回應 ↑

黃純青：〈新字問題〉，《南音》，1932，4.2

李獻章：〈新字問題〉，《南音》，1932，4.2

黃石輝：〈言文一致的零星問題〉，《南音》，1932，4.2

一吼：〈拍賣民眾〉，《南音》，1932，4.2

天南：〈宣告明弘君之認識不足〉，《南音》，1932，4.2

郭秋生：〈新字問題〉，《南音》，1932，5.25

郭秋生：〈再聽阮一回呼聲〉，《南音》，1932，7.25

郭秋生：〈生活改造的武器〉，《南音》，1932，9.27

※第二波鄉土文學論戰相關篇章

<p>貂山子：〈對建設台灣鄉土文學的形式的芻議〉（未見稿）</p>	<p>清葉：〈具有獨特性的台灣文學之建設——我的鄉土文學觀〉，《台灣新民報》，1933，9.4</p>
-----------------------------------	---

↑回應

↑回應

<p>越峰：〈對「建設台灣鄉土文學的形式的芻議」的異議〉，《台灣新民報》，1933，9.5、9.9</p>	<p>弘：〈文藝春秋〉，《新高新報》，1933，9.8 ←回應 弘：〈文藝春秋〉，《新高新報》，1933，9.15</p>
---	---

↑回應

<p>貂山子：〈就鄉土問題答越峰先生的異議〉，《台灣新民報》，1933，9.13、10.5、10.18、10.19</p>
---

<p>樞馬：〈過去的教訓——呈給台灣文藝作家〉，《台灣新民報》，1933，9.23</p>
<p>越峰：〈就鄉土文學問題再談幾句的管見〉，《台灣新民報》，1933，9.23、9.25</p>

<p>樞馬：〈幾句補足〉，《台灣新民報》，1933，9.26、9.27</p>
<p>逸生：〈對鄉土文學來說幾句〉，《台灣新民報》，1933，9.27</p>

<p>克夫：〈對鄉土文學應有的認識〉，《台灣新民報》，1933，10.2、10.3、10.5、10.6、10.7</p>	<p>邱春榮：〈致鄉土文學運動的諸位先生〉，《台灣新民報》，1933，10.12～15</p>
--	---

↑回應

<p>黃石輝：〈所謂「運動狂」的喊聲——給春榮克夫二先生〉，《台灣新民報》，1933，10.29～31</p>
---

↑ 回應

邱春榮：〈致鄉土文學台灣話文的一一哀的美敦書〉，《台灣新民報》，1933，11.2	點人：〈勸鄉土文學台灣話文早脫出文壇〉，《台灣新民報》，1933，11.27	逸生：〈呈石輝先生〉，《台灣新民報》，1933，11.29
---	--	-------------------------------

賴明弘：〈對鄉土文學台灣話文徹底的反對〉，《台灣新民報》，1933，10.16、10.18~21

↑ 回應

黃石輝：〈解剖明弘君的愚論〉，《台灣新民報》，1933，11.5~9

臥薪生：〈就鄉土文學也來說幾句〉，《台灣新民報》，1933，10.24

毓文：〈鄉土文學雜駁〉，《台灣新民報》，1933，10.25

張深切：〈觀台灣鄉土文學戰後的雜感〉，《台灣新民報》，1933，11.3

郭秋生：〈還在絕對的主張建設「台灣話文」〉，《台灣新民報》，1933，10.29~31

吳坤煌：〈論台灣的鄉土文學〉，《福爾摩沙》，1933，12.~30

劉捷：〈一九三三年的台灣文學界〉，《福爾摩沙》，1933，12.~30

賴明弘：〈絕對反對建設台灣話文摧翻一切邪說〉，《新高新報》，1933，2.2~4.29

## 附錄二

## 日據時期台灣重要新文學作品暨發表刊物

篇名	作者	原出處（日期或卷期）
可怕的沈默	鷗	《台灣文化叢書》（第一號，1922年4月）
她要往何處去	追風	《台灣》（第三年第四號～第七號，1922年7月～10月）
神秘的自制島	無知	《台灣》（第四年第三號，1923年3月10日）
月下	楊雲萍	《台灣民報》（第二卷第十號，1924年6月11日）
罪與罪	楊雲萍	《人人》（創刊號，1925年3月）
鬥熱鬧	賴和	《台灣民報》（八十六號，1926年1月1日）
光臨	楊雲萍	《台灣民報》（八十六號，1926年1月1日）
一桿「稱仔」	賴和	《台灣民報》（九十二、九十三號，1926年2月14日、21日）
到異鄉	楊雲萍	《台灣民報》（一零一號，1926年4月18日）
買彩票	張我軍	《台灣民報》（一零三～五號，1926年9月～10月）
黃鶯	天遊生	《台灣民報》（一零三號，1926年五月二日）
兄弟	楊雲萍	《台灣民報》（一一九號，1926年8月22日）
黃昏的蔗園	楊雲萍	《台灣民報》（一二四號，1926年9月26日）
鄭秀才的客廳	涵虛	《台灣民報》（一三八號，1927年1月2日）
加里飯	楊雲萍	《台灣民報》（一三八號，1927年1月2日）
白太太的哀史	張我軍	《台灣民報》（一五五號，1927年5月1日）
不如意的過年	賴和	《台灣民報》（一八九號，1928年1月1日）
恭喜？	鄭登山	《台灣民報》（一八九號，1928年1月1日）
前進	賴和	不詳可能作於1928年前後
他發財了	一村	《台灣民報》（二零二、三、四號，1928年4月1日、8日15日）

誰害了她	守愚	《台灣民報》(二零四、五號, 1930年3月15日22日)
無處申冤	虛谷	《台灣民報》(二一三~二一六號, 1928年6月7月)
秋菊的半生	楊雲萍	《台灣民報》(二一七號, 1928年7月15日)
夜聲	太平洋	《台灣民報》(二四九號, 1929年2月24日)
誘惑	張我軍	《台灣民報》(1929年4月7、14、21、28)
凶年不免死亡	守愚	《台灣民報》(二五七~二五九號, 1929年4月21日、28、5月5日)
死麼?	秋生	《台灣民報》(二七九~二八三號, 1929年9月22日、29、10月6日、13日、20日)
醉	守愚	《台灣民報》(二九四號, 1930年1月1日)
青年	楊雲萍	《台灣新報》(二九四號, 1930年1月1日)
蛇先生	賴和	《台灣民報》(二九四、二九五、二九六, 1930年1月1日、11日、18日)
十字街頭	靜香軒主人	《台灣新民報》(二零六、零七號, 1930年3月29日、4月5日)
彫古董	賴和	《台灣新民報》(三一二、三一三、三一四號, 1930年5月10日、17日、24日)
榮歸	陳虛谷	《台灣新民報》(三二二、三二三號, 1930年7月16日、26日)
阿凸舍	鐵濤	《台灣新民報》(三三三號, 1930年10月4)
棋盤邊	賴和	《現代生活》(日期不詳, 作於1930年10月) 收錄於李獻章編,《台灣小說選》, 原定1940年12月出版, 印刷中被禁止發行
辱?!	賴和	《台灣新民報》(三四五號, 1931年1月1日) 原定收於李獻章編小說選
放炮	一村	《台灣新民報》(三三六、七、八號, 1930年10月)

		25日、11月1日11月8日)
出走的前一夜	瘦鶴	《台灣新民報》(三四三~三四四號, 1927(1930)年12月13、20日)
女丐	翔(楊守愚)	《台灣新民報》(三四六~四七號, 1931年1月10、17日)
阿牛的苦難	劍濤	《台灣新民報》(三四九號, 1931年1月31)
保正伯	秋洞(蔡秋桐)	《台灣新民報》(三五三號, 1931年2月28日)
一個晚上	村老(楊守愚)	《台灣新民報》(三五四、五五號, 1931年3月7日、14日)
浪漫外記	賴和	《台灣新民報》(三五四、五五、五六號, 1931年3月7日、14日、21日)
元宵	守愚	《台灣新民報》(三五七、三五八號, 1931年3月28日、4月4日)
鬥!	夢華	《台灣新民報》(三五七~三六零號, 1931年3月28日、4月4日、11日18日)
一群失業的人	守愚	《台灣新民報》(三六零~六二號, 1931年4月18日、25日5月2日)
放屎百姓	蔡秋桐	《台灣新民報》(三六一、三六二號, 1931年4月25日、5月2日)
嫌疑	翔(楊守愚)	《台灣新民報》(三六三~六五號, 1931年5月9日、16日、23日)
可憐她死了	賴和	《台灣新民報》(三六三~六六號, 1931年5月9日、16日、23日、30日、6月6日)
開學	慕	《台灣新報》(三六六、七號, 1931年5月30日、6月6日)
流氓	孤峰	《台灣新民報》(三六八~三七零號, 1931年6月13、

		20、27日)
沒有兒子的爸爸	瘦鶴	《台灣新民報》(三六八~三七零號,1931年6月13、20、27日)
可憐的老車夫	SM生	《台灣新民報》(三七零號,1931年6月27日)
升租	洋(楊守愚)	《台灣新民報》(三七一~七三號,1931年7月4日、11日、18日)
奪錦標	蔡秋桐	《台灣新民報》(三七四、三七五、三七六號,1931年7月25日、8月1日、8日)
她!	夢華	《台灣新民報》(三七一~七四號,1931年7月4日、11日、18日、25日)
阿枝的故事	克夫	《台灣新民報》(三八四~八六號,1931年10月3日、10日、17日)
新興的悲哀	愁洞(蔡秋桐)	《台灣新民報》(三八七~八九號,1931年10月24日、31日、11月7日)
歸家	賴和	《南音》(創刊號,1932年1月1日)
老成黨	一吼	《南音》(創刊號第三期,1932年12月~1932年2月1日)
惹事	賴和	《南音》(一卷二號、六號、九、十號合刊,1932年1月17日、4月2日、7月25日)後半段收於李編小說選
啊!稿費?	Y	《台灣新民報》(三九一號,1931年11月21日)
豐作	賴和	《台灣新民報》(三九六、三九七號,1932年1月1日、9日)又楊達譯成日文載東京《文學案內》三卷一號,1936年1月
決裂	守愚	《台灣新民報》(三九六~三九九號,1932年1月1日、9日、16日、23日)
島都	朱點人	《台灣新民報》(四零零~零三號,1932年1月30

		日、2月6日、13日、20日)
擦鞋匠	赤子	《南音》(第一卷第三、四號, 1932年2月1日、22日)
罰	翔(楊守愚)	《台灣新民報》(四零二~零三號, 1932年2月13日、20日)
瑞生	靜香軒主人	《台灣新民報》(四零四~六, 1932年2月27日、3日, 5日、12日)
斷水之後	村老(楊守愚)	《台灣新民報》(四零七、零八號, 1932年3月19日、26日)
其山哥	陳賜文	《台灣新民報》(四零八~十號, 1932年3月26日、4月2日、9日)
失敗	自滔	《南音》(第一卷第十二號, 1932年11月8日)
首與體	巫永福	《福爾摩沙》(創刊號, 1933年7月)
龍	吳天賞	《福爾摩沙》(創刊號, 1933年7月15日)
蕾	吳天賞	《福爾摩沙》(第二號, 1933年12月30日)
唐璜與加彭	王白淵	《福爾摩沙》(第二號, 1933年12月30日)
納妾風波	賴慶	《福爾摩沙》(第二號, 1933年12月30日)
豚	吳希聖	《福爾摩沙》(第三期, 1934年6月15日)
黑龍	巫永福	《福爾摩沙》(第三期, 1934年6月15日)
上弦月	張碧華	《福爾摩沙》(第三期, 1934年6月15日)
紀念樹	朱點人	《先發部隊》(創刊號, 1934年7月15日)
送報伙	楊達	東京《文學評論》(1934年10月中譯文刊於《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 1936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蟬	朱點人	《第一線》(1935年1月6日)
鴨母	張深切	《台灣文藝》(創刊號, 1934年11月5日)
無花果	朱點人	《台灣文藝》(創刊號, 1934年11月5日)
到城市去	林越峰	《台灣文藝》(創刊號, 1934年11月5日)

善訟的人的故事	賴和	《台灣文藝》(二卷一號, 1934年12月18日)
牛車	呂赫若	《文學評論》(1935年1月)
秋兒	繪聲	《台灣文藝》(二卷二號, 1935年2月1日)
一個勞動者的死	楊華	《台灣文藝》(二卷二號, 1935年2月1日)
薄命	楊華	《台灣文藝》(二卷三號, 1935年3月5日)
謀生	徐玉書	《台灣文藝》(二卷三號, 1935年3月5日)
夜雨	王錦江	《第一線》(1935年1月6日)
王都鄉	秋生	《第一線》(1935年1月10日)
興兄	愁洞	《台灣文藝》(二卷四號, 1935年4月)
山茶花	巫永福	《台灣文藝》(二卷四號, 1935年4月)
青春	王錦江	《台灣文藝》(二卷四號, 1935年4月)
寄生蟲	陳清葉	《台灣文藝》(二卷五號, 1935年5月)
理想鄉	愁洞	《台灣文藝》(二卷六號, 1935年6月10日)
廢人黨	楊少民	《台灣文藝》(二卷六號, 1935年6月10日)
五谷王	謝萬安	《台灣文藝》(二卷六號, 1935年6月10日)
音樂鐘	翁鬧	《台灣文藝》(二卷六號, 1935年6月10日)
安息之日	朱點人	《台灣文藝》(二卷七號, 1935年7月1日)
好光年	林越峰	《台灣文藝》(二卷七號, 1935年7月1日)
戇伯仔	翁鬧	《台灣文藝》(二卷七號, 1935年7月1日)
玉兒的悲哀	毓文	《台灣文藝》(二卷八號, 1935年8月4日)
沒落	王錦江	《台灣文藝》(二卷八號, 1935年8月4日)
紅蘿蔔	林越峰	《台灣文藝》(二卷八號、九期合訂本, 1935年10月)
殘雪	翁鬧	《台灣文藝》(二卷八號、九期合訂本, 1935年8月)

牛車	呂赫若	譯自《文學評論》(1935年1月中譯文刊於《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1936年4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沒落	王詩琅	《台灣文藝》(二卷八、九月合併號)
殘雪	翁鬧	《台灣文藝》(第二卷八、九月合刊號，1935年8月1日)
野雲雁	吳天賞	《台灣文藝》(第二卷八、九月合刊號，1935年8月)
補運	蔡德音	《台灣文藝》(第二卷八、九月號，1935年10月)
鮮血	張慶堂	《台灣文藝》(第二卷九號，1935年9月24)
媒婆	蔡秋桐	《台灣文藝》(第二卷十號，1935年9月24)
赤土與鮮血	洋(楊守愚)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一號，1935年12月28日)
商人	曙人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一號，1935年12)
某個男人的手記	郭水潭	《大阪每日新聞》(1935)
一個同志的批信	賴和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一號，1935年12月28日)
羅漢腳	翁鬧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一號，1935年12)
牛話	一明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一號，1935年12)
未來的希望	賴和	不詳
赴會	賴和	不詳
不幸之賣油炸檜的	賴和	不詳
阿四	賴和	不詳
細雨霏霏的一天	李泰國	《台灣文藝》(第三卷四、五合併號，1936年4月20日)
秋信	朱點人	《台灣新文學》(三月號，1936年3月3日)

橄欖	黃得時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二期, 1936年)
乳母	一吼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三號, 1936年4月1日)
王爺豬	匡人也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三號, 1936年)
水月	吳濁流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三號, 1936年3月6日) (1961年7月譯成中文)(處女作)
失蹤	陳瑞榮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三號, 1936年)
年關	張慶堂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四期, 1936年)
榮生	徐玉書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四號, 1936年5)
無錢打和尚	蔡秋桐	李編《台灣民間文學集》(1936年5月)
婚事	徐瓊二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四號, 1936年5)
紳士之道	藍紅綠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五號, 1936年6月5日)
長壽會	朱點人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六號, 1936年7月7日)
老姨頭	王錦江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六號, 1936年7)
王萬之妻	陳華培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六號, 1936年7)
老與死	張慶堂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七號, 1936年8月5日)
可憐的朋友	李泰國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七號, 1936年8)
四兩仔土	愁洞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八號, 1936年9月19)
有一天	柳塘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八號, 1936年9月)
頑童伐鬼記	楊達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九號, 1936年)
大女今婆	邱富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九號, 1936年11月)
鴛鴦	洋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十號, 1936年)
旋風	一吼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十號, 1936年12)
脫穎	朱點人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十號, 1936年12)
十字路	王錦江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十號, 1936年12)
三更半暝	廢人	《台灣新文學》(第一卷第十號, 1936年12)
轉途	柳塘	《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一期, 1936年10)
她是流眼淚了	張慶堂	《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一期, 1936年12月28日)

泥沼中的金鯉魚	吳濁流	《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六號, 1936年6月, 入選該雜誌徵文佳作)
天亮前的戀愛故事	翁鬧	《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二號, 1937年1月31日)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龍瑛宗	日本《改造》(1937年4月號, 入選該雜誌第九回徵文佳作推薦)
豬祭	陳華培	《台灣新文學》(第二卷第三號, 1937年3月6日)
赴了春宴回來	賴和	《東亞新報》(新年號, 1938年1月) 作於1935年12月10日
辣蕪罐	張文環	《台灣藝術》(二號, 1940年4月1日)
水癌	周金波	《文藝台灣》(第二卷第一期, 1941年3月)
藝旦之家	張文環	《台灣文學》(第一卷第一期, 1941年5月)
志願兵	周金波	《文藝台灣》(第二卷第六號, 1941年9月)
慾	巫永福	《台灣文學》(第一卷第二號, 1941年9月1日)
論語與雞	張文環	《台灣文學》(第一卷第二號, 1941年9月1日)
夜猿	張文環	《台灣文學》(第二卷第一期, 1942年2月)
無醫村	楊逵	《台灣文學》(第二卷第一期, 1942年2月)
財子壽	呂赫若	《台灣文學》(第二卷第二號, 1942年)
泥娃娃	楊逵	《台灣時報》(四月號, 1942年4月)
闖雞	張文環	《台灣文學》(第二卷第三號, 1942年7月)
花開時節	楊千鶴	《台灣文學》(第二卷第三號, 1942年7月)
風水	呂赫若	《台灣文學》(第二卷第四號, 1942年10月)
月夜(〈廟庭〉續篇)	呂赫若	《台灣文學》(第三卷第一號, 1943年1月1日)
合家平安	呂赫若	《台灣文學》(第三卷第二號, 1943年)
奔流	王昶雄	《台灣文學》(第三卷第二號, 1943年7月)
林君寄來的信	葉石濤	《文藝台灣》(第五卷第六號, 1943年4月)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癥狀結構

春怨	葉石濤	《文藝台灣》(第六卷第三號, 1943年7月)
廟庭	呂赫若	《台灣時報》(1943年8月)
清秋	呂赫若	《清秋》(1944年3月)
元旦的一場小 風波	張我軍	《藝文》(第三卷第一期, 1945年1月)